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

俞良早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龙润霞

封面设计 翟永莲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于小红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俞良早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7

ISBN 7-5035-3487-7

I. 马… II. 俞… III.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
理论研究-东方国家 IV. 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38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燕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装订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65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俞良早，湖北汉阳人，1951年生，当过农民、军人和工人。1982年9月由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分配至湖北大学工作。1992年6月晋升副教授，1993年6月破格晋升教授。199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选拔为湖北省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1998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2年受聘为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列宁与俄罗斯问题研究所”所长。现学术职务有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长期以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表论文300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有关专题全文转载100多篇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等摘要50多篇次。撰写和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列宁主义研究》、《列宁后期思想探要》、《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史》、《创论“东方列宁学”》、《东方社会主义行进中：共产党执政与党的建设》等等。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重点项目三项和厅局级重点项目六项。当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项。先后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各一项，获湖北省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获厅局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十余项。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总论	(1)
一、关于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1)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定义	(1)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研究对象	(5)
(三) 创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意义	(11)
二、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12)
(一) 关于第一个阶段及其定位	(13)
(二) 关于正确地把握第二个阶段	(16)
(三) 关于第三个阶段的若干重要特点	(20)
三、列宁与邓小平：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成熟	(24)
(一) 20 世纪是东方社会主义的世纪	(24)
(二) 世纪初与世纪末的考验：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成熟	(25)
(三) 何谓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熟”	(29)
四、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	(34)
(一) 深深地扎根于东方社会的土壤里	(34)
(二) 大胆地探索前进的道路	(38)
(三) 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目标	(42)
(四) 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45)
五、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	(48)
(一)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飞跃	(48)

(二) 一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最伟大成果	(52)
(三) 推进新世纪社会主义进程的理论武器	(56)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58)
一、概论	(58)
(一) 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	(58)
(二) 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东方学”的出发点	(65)
(三) 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东方社会理论	(68)
二、恩格斯晚年对东方发展的科学预见	(71)
(一) 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陷入“无出路状态”	(71)
(二) 东西方革命“互相补充”和东方实现社会主义 的可能性	(74)
三、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革命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 革命开端的思想	(78)
(一) 19世纪70—80年代恩格斯的思想	(78)
(二)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的思想	(81)
(三) 对理论界现成观点的评论	(84)
四、《共产党宣言》与科学认识社会主义	(86)
(一) 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	(86)
(二) 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	(89)
第三章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	(94)
一、概论	(94)
(一) 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产生和成熟	(94)
(二) 列宁东方理论的主要内容	(100)
(三) 列宁东方理论的精髓	(106)
(四) 列宁东方理论的历史地位	(115)
二、列宁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的思想	(120)
(一) 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声援中国人民 反侵略的斗争	(120)

(二) 高度评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及他们的事业·····	(124)
(三) 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和展望·····	(127)
三、《怎么办?》与东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	(129)
(一) 驳斥“反对正统”、“批评自由”的口号·····	(130)
(二) 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132)
(三) 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	(135)
(四) 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 革命家组织·····	(138)
四、“渐进发展”的理论·····	(142)
(一) “渐进发展”理论的进程·····	(142)
(二) “渐进发展”的形式或措施·····	(150)
五、发展农村和农业的思想·····	(155)
(一) 建立适合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农村政权组织·····	(155)
(二) 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和推动农村建设·····	(160)
(三) 执政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和关心农民的生活·····	(165)
六、关于苏俄三个时期三种工农联盟的思想·····	(167)
(一) 以工人阶级及其执政党支持对农民平分土地 和农民拥护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工农联盟·····	(168)
(二) 以工人阶级支持贫苦农民同富农作斗争和农 村向城市提供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工农联盟·····	(172)
(三) 以工人阶级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并领导农民建设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工农经济 联盟·····	(175)
七、发展先进文化的尝试与思想·····	(179)
(一) 革命前对先进文化的认识·····	(179)
(二) 革命胜利初期发展先进文化的尝试·····	(181)
(三) 晚年发展先进文化的思想·····	(187)
八、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重要思想·····	(190)
(一) 执政党决不能忽视前进道路上的“危险”·····	(190)
(二) 执政党“领导政治”的当务之急：调整工农 关系·····	(194)

(三) 执政党要善于“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	(196)
(四) 清除党内“最可恶的敌人”——官僚主义者	(199)
第四章 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	(203)
一、概论	(203)
(一) 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	(203)
(二) 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地位	(211)
二、斯大林“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214)
(一) “一国能够建成”论的产生和基本内容	(214)
(二) “一国能够建成”论的历史作用和理论缺陷	(218)
三、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223)
(一) 民主的趋向与“不稳定”的矛盾：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的政治根源和社会根源	(224)
(二) 难得的“稳定”：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与他种社会制度的比较	(228)
第五章 毛泽东的东方理论	(234)
一、概论	(234)
(一) 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出发论述东方观点	(234)
(二) 从中国及东方的社会实际出发论述东方观点	(237)
(三) 对毛泽东东方理论的评论	(243)
二、关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思想	(246)
(一) 关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	(246)
(二) 关于发展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	(249)
(三) 关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252)
三、关于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思想	(256)
(一) 关于文化建设的意义和方向	(256)
(二) 关于文化建设的方法和措施	(261)
第六章 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	(268)
一、20世纪东方发展的三大规律	(268)

(一) 以社会主义方式或者企图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 发展·····	(268)
(二) 在同西方强烈的抗争和反击中实现发展·····	(273)
(三) 主动融入全球化以图发展·····	(275)
二、从经济落后性看俄、中等国社会主义先于西方胜利的 必然性及其发展中的曲折性·····	(279)
(一) 经济相对落后性决定了这些国家先于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279)
(二) 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性根源于这些国家的 经济社会相对落后性·····	(285)
三、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比较·····	(291)
(一)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和低潮·····	(291)
(二)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速度·····	(294)
(三) 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299)
四、全球化的性质与社会主义问题·····	(303)
(一) 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的过程·····	(303)
(二)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	(308)
(三)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313)
五、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东方社会主义 历史的印证·····	(316)
(一) 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316)
(二) 采取有力措施发展生产力·····	(318)
(三) 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关于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 要求的意义的认识·····	(323)
六、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东方社会主义 历史的印证·····	(325)
(一) 何谓“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26)
(二) 采取正确的措施和途径推进先进文化·····	(327)
(三) 抵制和批评错误的文化倾向·····	(333)
七、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东方社会主义	

历史的印证·····	(335)
(一) 采取有力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335)
(二) 兴办社会保险和福利事业以增进人民的利益·····	(338)
(三) 同损害人民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	(341)
(四) 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关于代表人民利益重要性的认识·····	(343)
后 记·····	(346)

序 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重视从东方的视角来研究、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些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论文，还产生一些阐述 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论文，这些论文均公开发表于我国的学术刊物上。现在出版的这部《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是以从前发表的论文为基础撰写而成的。

如果说本著作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的内容的话，那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本著作的第一章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我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学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规律。

本著作第二章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包括下列内容：俄国农民陷入了极其贫困、无法忍受的状况，东方专制制度建立在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及彼此隔绝状态的基础上，俄国的“农村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不排除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即将爆发并且它将改变俄国和世界的面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关于俄国及其他东方国家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观点，关于将“农村公社”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的观

点，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从而使他们的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

本著作第三章论证了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我认为，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期间列宁的文献看，他的东方社会理论已经产生。从他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献看，东方社会理论已经成熟。他的东方社会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等重要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相比较，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将社会主义问题提上了主题的地位，将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视为同一个政治力量体系来研究，同愈益成熟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本著作第四章论证了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我认为，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包括下述观点：东方人民已经从数百年的沉睡中醒来，献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世界的光明来自东方；必须充分认识东方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它们面临任务的多样性；东方一些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重视解决农民问题，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东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建立革命军队和研究军事；应该反对在东方革命问题上的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行为。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表现为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个提法的含义在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此前的发展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和思想预见的特点，到斯大林这里，由于东方的革命实践已经充分展现出来，这个理论则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起着

直接指导实践的作用。

本著作第五章论证了毛泽东的东方理论。我认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出发阐述了关于东方的观点，内容包括加强中国与苏联两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加强中国同东方处于革命斗争之中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他还从中国及东方的社会实际出发论述了东方观点，内容包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过程决不是短暂的；东方国家搞建设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东方国家搞经济建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等。毛泽东的东方理论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这个提法的含义在于，毛泽东的东方理论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东方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特点和要求。

本著作第六章论证了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如关于20世纪东方发展的三规律，从经济落后性看东方一些国家先于西方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比较，全球化的性质与社会主义问题，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东方社会主义历史的印证等等。

这部著作是我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初步探讨，也就是说，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深入，有待于形成更有深度、更系统的研究成果。我当为达到这个目标不断进取。

俞良早

2006年6月

第一章 总 论

一、关于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迄今为止中外辞书中不曾出现的概念，现在被笔者置于拙文的文首，提到学术界和理论界面前。笔者愿意就这个概念的定义以及相关的问题，与学术界、理论界的朋友们交换意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定义

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特别是他们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均提出和形成了关于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

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有关著作中论述了地处东方的俄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提出，俄国现成的“农村公社”——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组织，是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所以俄国可以走一条非西方化的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和以资本主义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将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文献中回答了民粹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就俄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文献主要是：1881年2—3月《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12月—1890年2月《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4年1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尽管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文献的思想及意义存有不同的

看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高度地关注俄国问题和东方社会，思考和阐述了俄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举行之前，列宁为大会准备了一系列文件，如《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等等。在大会上，列宁作了几个报告，如《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等等。从上述文件和报告的内容看，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学说已经产生。1922年底1923年初，即列宁逝世前夕，在《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就东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这些新观点的提出，意味着他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已经成熟。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学说，包括下述内容：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等等。列宁东方社会发展学说的精髓，是列宁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观点。列宁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1918年，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说，十月革命在世界上第一次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来。波斯、中国、印度人民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相应组织的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①。同年，斯大林在《不要忘记东方》一文中说，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东方看成为他们幸福的基础，因为东方各国有他们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沉睡，用革命的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这充分地说明，斯大林已经关注到东方，重视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关会

^①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议上作了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报告中说，就中国革命的性质而言，它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锋芒指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所以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应当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当；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和发展着，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不能不对中国革命起促进作用。就中国革命的军队而言，在中国，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而言，类似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将是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性政权^①。上述内容，是斯大林东方社会发展学说的构成部分。斯大林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内容。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这样提出问题的依据是：其一，毛泽东把东方各国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整体力量。1939年12月，毛泽东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说，苏联人民和斯大林把中国人民当作兄弟看待，没有一个国家废除了它在中国的特权，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的；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真正援助了我们，只有苏联用空军和物质援助了我们^②。这说明，毛泽东把中国和苏联看成为同一个政治体系的力量。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东方各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应当团结起来，以东方十万万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的目标，我们自己的命运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③。这说明，他明确地把东方视为一个整体性革命力量。其二，毛泽东正确地阐述和运用了列宁、斯大林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譬如，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中国共产

①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9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党要实践这一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路线^①。上述列宁的理论，是列宁关于东方社会发展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对此作了正确的阐述和运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援引了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的论断，并且说，中国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早已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同盟军^②。这是他对斯大林东方社会发展学说的正确阐述和运用。由此看，毛泽东的确具有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他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形成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学说。笔者的这个观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求证：其一，邓小平十分重视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包括苏联领导人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研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譬如，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领导人，同他探讨了处理共产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历史经验，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其二，邓小平认真地研讨了列宁理论和列宁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譬如，1985年8月，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9年邓小平又在有关讲话中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其三，邓小平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等于东方社会理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其国情同东方其他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对于东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邓小平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提出和形成了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概念。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672页。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不仅是一个新的学术概念，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如同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样。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规律。

上文简要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意在证明他们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提出和形成了这一学说。如果深入地研究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则可以发现他们已经揭示出东方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规律：

第一，东方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走不同于西方的路，或者说“走自己的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及相关著作中提出，如果俄国立刻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这场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随之取得胜利并且西方无产阶级能够反过来帮助俄国革命，则俄国可以走不同于西方的道路而到达社会主义，即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关于俄国走不同于西方道路的设想虽然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但是他们毕竟有过俄国走不同于西方道路的设想。这是对东方国家走不同于西方道路规律的最初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鉴于当时西方国家没有发生夺取政权的革命而俄国发生革命并取得了胜利的事实，1919年4月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了地处东方的俄国比西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思想，并且详尽地分析了俄国容易发生革命的六点原因^①。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党的十大《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的报告》中说，俄国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的大多数，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些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②。1923年，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这种特殊性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294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为前提的。俄国的发展就体现出这种特殊性，即它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搞社会主义条件比较差，但是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内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先夺取了政权，然后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条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胜利^①。上述列宁的思想，体现了对东方国家走不同于西方道路规律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邓小平的这一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东方国家走不同于西方道路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新的深化。

第二，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③。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东方国家而言的，但它是针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而言的，所以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到目前为止仅仅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直接指导的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对苏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1918年春，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基本得以巩固，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必然要把一个“根本的任务”提到首位，这个根本的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俄国有丰富的资源，如矿石、燃料、森林、水力等等，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④。1921年春，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有关文件中提出：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新经济政策，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运输业^⑤。同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国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和商业，目的就在于完成提高生产力和恢复大工业的任务^⑥。上述列宁的思想，体现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72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了对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规律的自觉的、深刻的认识。1934年1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有关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成^①。这个观点加深了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规律的认识。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复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于它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过程中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发展生产力^②。上述邓小平的观点，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建设先进文化。十月革命以后，建设先进文化的任务提到俄共（布）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面前。列宁1920年10月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③。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经典阐释。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面前有三大问题：一是官僚主义，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文盲者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管理。由此列宁提出：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的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国家管理的状况^④。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受贿行为，本来可以利用苏维埃法律来进行。可是，当时广大工农群众甚至相当多的共产党员因为文化水平低，不懂得利用苏维埃法律去进行斗争，而且正是因为负责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和政治素质低才不断产生官僚主义和贪污受贿行为。由此列宁提出，必须用提高文化水平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方面的斗争，拖

①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①。列宁逝世前夕，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②。因为他认为，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农民人人会读书看报，增长见识，懂得合作社的好处，踊跃参加合作社。这一时期列宁还说：必须由全党重视和努力，发动全体人民积极参与，在城市和农村来一个文化革命，如果这样，苏俄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③。从上述列宁的论断及思想中，可以领悟到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努力建设先进文化的客观规律性。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双百方针”，以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1983年4月，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④。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抵制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论断及思想，有利于加深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先进文化规律的理解。

第四，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逐步地、不断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这一思想只是在东方的若干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在有关文章中深刻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特点：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建立了苏维埃组织，全体劳动群众能够在这个组织中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⑥。可是，在以后的实践中，全体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设想没有得到实现。1919年3月，列宁在党的八大关于党纲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④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⑤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这里有一个文化水平的问题。由于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低，苏维埃变成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即党代表劳动群众实行管理的机关。他还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即全体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才能解决^①。列宁逝世前夕，反复地强调在俄国开展文化革命，并说展开这个革命无论从群众的文化水平基础还是从社会物质基础上看，都是非常困难的^②。他的思想是，只能视社会文化建设的进度逐步地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也要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③。同年12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④。他的这些论断，体现了他关于逐步地、不断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的思想。列宁和邓小平的上述思想给人们以启示，逐步地、不断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之一。

第五，东方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和俄共（布）同内部的官僚主义展开了斗争。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必须借助觉悟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来收拾这种敌人^⑤。列宁逝世前夕高度重视加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建设。他提出，必须增加党中央委员，尤其要从工人党员中选举党中央委员，认为这样做一是可以加强党中央的稳定性，巩固团结，反对分裂；二是可以改善党的工作机关，反对官僚主义；三是可以培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列宁提出，必须从工作上和组织上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结合起来。其具体办法是：增选中央监察委员，使其达到75~100人，这些人从工人党员和农民党员中选出，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同时缩减工农检察院的职员；使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页。

④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检察院联合办公。他还提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应该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而且应该有一定数量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党中央政治局在举行会议以前，应该将会议有关的文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委员阅读，使其了解情况^①。上述列宁和俄共（布）的实践，初步地探索了东方执政的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毛泽东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②。邓小平明确地、反复地提出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他在1983年整党的过程中指出：要通过整党的活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③。1989年政治风波后，他提出，要建立一个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特别是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要明白地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注意培养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领导班子^④。上述事实说明，执政的共产党加强自身的建设，是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一个规律。

第六，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善于处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这个思想正确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演进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善于处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列宁在苏维埃俄国时期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苏俄的自然资源，苏俄则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两者在经济上分不开

① 参见俞良早文：《列宁逝世前夕关于党建的重要思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④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了^①。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苏俄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②。同时列宁指出，要记住苏俄仍被那些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要竭尽所能防止这种灾难发生^③。可见，一方面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上的关系，另一方面防止它们发动侵略战争，是列宁处理苏俄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中国新时期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的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中国应趁机把国内的经济建设搞上去。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邓小平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西方一些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国家的主权，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④。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树立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善于同西方国家处理关系的典范。可以看出，善于同西方国家处理关系，是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规律之一。

（三）创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意义

提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推动此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意义极为重大：

第一，它有利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科学领域，内容博大精深。多少年以来，虽经理论界、学术界不断的研究，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已经发掘出来，为人们所掌握，成为人们社会实践的指南。但还是有一些理论观点尚待人们去发掘，尚待人们去认识和掌握。这些尚待发掘的理论观点，就是所谓理论遗产。由于人们进行理论研究的能力受时代背景的限制，又由于人们理论研究的视角是否得当、方法是否正确、功力是否深厚决定人们是否最大限度地占有理论研究成果，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在某一个时候完完全全地、百分之百地被人们的认识所穷尽，它会留有一些尚待人们继续研究的问题。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新的研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④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究视角和方法的产生，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理论遗产会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体现了理论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产生了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在此前提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然有利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

第二，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支持。我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中国的特色。提出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必然揭示出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特殊规律。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所以中国特色与东方特殊规律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发现东方发展中的特殊规律，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上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所以说，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支持。况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继续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不断地获取思想理论力量。研究“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

第三，它有利于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当前，我党我国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确认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同自然科学的成果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同自然科学的人才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提出新的概念，创立新的学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然而，新的概念、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是在研究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是广大的研究工作者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就是广大的研究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的一个创造。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和新学科，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新拓展。只有提倡和肯定这样的创造，才有利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笔者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关于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成的一个大的理论体系。由于目前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的认识，脉络不甚清楚，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偏差，所以笔者撰此文稿，参与讨论。

(一) 关于第一个阶段及其定位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及其理论。

19世纪50年代前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认为，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发达，二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英、法、德、美具备了这几个条件，所以他们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时，往往限于谈到这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东方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或者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初始阶段，或者没有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无产阶级很弱小，或者没有无产阶级，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谈到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国内发生了革命运动。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胜利。“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组织，具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公有的特点，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的“农村公社”正处于瓦解的过程中。民粹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认为“农村公社”正是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的条件，认为仅仅依靠农民的力量，推翻沙皇政府的统治，就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者提出这个问题后，马克思、恩格斯立即作出反映，并且在作出反映的过程中修正和完善了关于未来革命的设想。也就是说，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未来革命提出了一种新设想和新理论。

关于新设想和新理论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恩格斯晚年在有关文章中说，一旦俄国革命爆发，将对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增强西方无产阶级胜利的信心，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所以，“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① “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② “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 恩格斯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③ 他还说：“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④ 即适用于东方经济落后的其他国家。西方的社会主义将对东方人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⑤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新设想由以下几个环节构成：

第一个环节：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并且成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俄国国内人民群众同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十分尖锐，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 1789 年，革命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满炸药的地雷，差的就是点燃导火线。一旦俄国革命爆发，将产生一种冲击波，波及西方国家，促使西方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俄国革命必然推翻沙皇制度，从而为西方革命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0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0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9 页。

造一个好的环境。沙皇政府是欧洲宪兵，到处镇压革命，只要有沙皇政府，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推翻了沙皇政府，有利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第二个环节：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从而为俄国人民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由于俄国革命的冲击，西方各国人民都会起来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西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后，将为俄国树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社会主义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方案，是西方的产物，东方人民包括俄国人民，不知道或者不能详知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懂得或者不怎么懂得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西方走向社会主义从而为俄国树立榜样，对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意义极为重大。

第三个环节：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由于有西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和样板，由于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俄国将缩短和结束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走向社会主义胜利。

第四个环节：东方其他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和帮助下，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由于有西方的样板，有俄国的样板，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东方其他落后国家有可能跟着走向社会主义。

上述新设想和新理论，包含有东方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人们称它为东方社会理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应该如何定位，笔者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它适时地、率先地探索了东方社会发展的课题。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造成了人们探索东方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适时地提出东方社会理论，探索了东方社会发展的课题。还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具有“率先”的性质。所谓“率先”的性质，指它在社会主义思想上首先论及东方社会问题，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为后来者继续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它尚未摆脱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从近代以来一直到19世纪末，革命的中心地在西方。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均在西方的舞台上得到充分的展示。与此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的理论，是“西方中心论”，即突出地论述西方革命问题的理论。他们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尤其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关于东方

社会的理论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一是体现于这一理论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作用是激发西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二是体现于它强调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将先于俄国，三是体现于它强调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只有在西方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并且在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和帮助下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思想上，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是西方引导东方，西方决定东方。

第三，它尚不能够有力地说明 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东方一些国家如俄国、中国等在西方没有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背景下，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以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以西方社会主义作榜样，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尽管如此，它们的革命和建设都取得了或者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样，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即关于西方先于东方胜利并且为东方树立榜样和提供帮助的理论，则不能够有力地说明 20 世纪以来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深刻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需要随着实践的进展而发展和完善。

（二）关于正确地把握第二个阶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他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理论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样提出问题，不会有不同的意见。可是，在列宁理论和实践的全过程中，哪一个阶段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体现理论发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则需要认真研究和讨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以及它的具体内容，需要正确地把握。

笔者认为，列宁在 1917 年十月革命过程中，在此后的俄国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尚没有改变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①。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战略思想发生转变，进行新的实践，形成新的理论，从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开始于 1920 年底俄国国内

^① 参见俞良早文：《十月革命与列宁战略思想的两次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7 年第 5 期。

战争结束的时候，完成于1922年底1923年初他逝世前夕。

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上看，十月革命后一度蓬勃发展的欧洲革命风暴渐渐落入低潮。芬兰、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革命，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工人运动未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列宁看到了这一事实。当时，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有关报告中，在讲到国际革命运动的形势时一再说：革命虽然在发展，“可是实际上运动并没有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前进。直到目前，在资本主义特别发达的其他大国中，革命还没有到来。”“我们预言过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直线运动。”^①所谓革命不是“直线地前进”，不是“直线运动”，指革命运动有曲折，陷入了低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说明，西方各国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不可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想象的事实——西方先于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俄国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和对俄国人民提供各种帮助——俄国只有先于西方国家单独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从国内看，苏俄军民取得了国内战争的伟大胜利。从1918年夏天起，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把军队开进俄国，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俄国国内的各种反动分子也纷纷发动叛乱，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苏俄军民在党和列宁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国内革命战争。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说明，苏俄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认识到这一点。1920年11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这就说明，“即使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②苏俄靠自己一国的力量能够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意味着苏俄有条件和有力量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正是由于上述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形成和提出了苏俄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反映列宁思想转变的第一篇文献，是1920年11月21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讲到国际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时说：“只要总的看一下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得到了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①“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②显然，他所谓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和“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和机会。在他看来，在西方国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先于它们取得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和机会。他还说，为了战胜资本主义，一是要用革命力量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新政权，二是要“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情的榜样。”“现在我们应当采用组织、建设的办法，来代替用革命方式推翻剥削者和抗击暴力者的办法，我们应当向全世界显示和证明，我们不仅是一种能够抵抗军事扼杀的力量，而且是一种能够树立榜样的力量。”^③在这里，列宁提出“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显然是指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他说俄国无产阶级应当向全世界“树立榜样”，显然是指俄国无产阶级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树立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

上述列宁思想的转变，形成了苏俄在西方没有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即关于西方先于俄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俄国只有在西方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了重大发展。

1922年底1923年初，即列宁逝世前夕，上述列宁思想的转变进一步深化，形成了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所谓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其内容是从战略的高度把俄国革命同东方其他国家的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列宁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的文献，有《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从这些文献的思想内容看，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有下述内容：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9页。

第一，东方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提出，具有东方特点的俄国，能够通过西方不同的道路来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他承认，俄国同西方国家相比较，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差一些，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但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除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①。俄国革命过程，深刻地体现出一种特殊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俄国的阶级矛盾，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因势利导地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取得了创造社会文明的政治前提，此后，他们将在这种政治前提下即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创造物质条件，发展社会文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值得指出的是，在列宁看来，不仅俄国革命有这种特殊性，而且东方其他国家未来的革命过程也将有这种特殊性，而且它们的特殊性会更多一些。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②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的斗争。当时，在确认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难以发生以后，怎样看待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俄国革命的前途，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课题。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深刻地提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③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完全和绝对有保证，是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综合这个时期列宁的一系列论述，这个结论的第一层含义是，苏维埃俄国将从东方获得支持的力量。当时，苏维埃俄国仍然处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中，面临着被侵略、被颠覆的危险。只有东方的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才能够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使苏维埃俄国能够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存在下去。第二层含义是，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决战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

将发起于东方。东方已经卷入了全世界社会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这个力量是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的决定性力量。随着历史的演进，西方对东方的剥削愈益严重，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东方的革命力量一定会掀起世界革命的决战，迎来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列宁 1922 年底 1923 年初形成和提出的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就是列宁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其一，它极大地改变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强调西方先于东方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东方只有在西方树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并得到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才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的实质是西方引导东方，西方决定东方。列宁的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则认为，在西方革命走向低潮和西方社会主义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东方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的斗争。这就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其二，它科学地说明了 20 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的基本事实，是俄国先于西方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并且使这个政权得以巩固，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以及亚洲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或者人民民主政权，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一切都是在西方未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和无所谓西方社会主义的榜样、帮助的条件下实现的。列宁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能够说明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可以印证列宁理论的正确性。

(三) 关于第三个阶段的若干重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邓小平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在提出这个命题时，首先要论证的是邓小平有没有东方社会的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肯定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邓小平十分重视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会见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领导人，同他探讨了处理共产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历

史经验，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1988年6月7日，邓小平会见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领导人，同他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重要经验，强调进行改革必须同人民群众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大，步子要稳，要及时发现问题，改正不妥当的方案，还要在改革中保持生产较好的发展态势。同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同他探讨了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意义，强调总结历史不要过于看重个人功过，而要着眼于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前苏联领导人，同他探讨了各国走自己道路的必要性，强调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教条主义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导致失败。上述事实说明，邓小平十分关心东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改革，力图就建设与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形成共识。由此出发，应该确认邓小平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

二是邓小平十分重视探讨列宁的理论和列宁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1977年7月，在拨乱反正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① 1985年8月，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 1989年邓小平又在有关讲话中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③ 以上援引的材料说明，邓小平总结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经验、经济建设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等等。事实说明，邓小平理论同列宁理论特别是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有着直接的联系，即它们同样面对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在实践中探索改革与发展的途径。既然如此，列宁在实践中形成和提出了东方社会的理论，邓小平不可能没有这个理论。

三是邓小平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等于东方社会理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方国家，其国情同东方其他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对于东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此看来，邓小平理论就是东方社会理论。既然有理由说明邓小平有东方社会的理论，而且邓小平理论就是东方社会理论，那么有可能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邓小平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特点。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试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它从内容上直接延伸了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如前所述，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在西方革命处于低潮和西方社会主义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东方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地处东方的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经济比较落后，物质条件比较差，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还提出，中国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既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分“三步走”，用100年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说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分“三步走”的理论，从内容上直接延伸了列宁关于东方经济比较落后国家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由于西方革命难以走出低潮，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的斗争。可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东方的社会主义进程出现了严重的曲折。能不能正确地说明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信心和力量继续发展社会主义，而且关系到能不能科学地认识上述列宁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斗争的理论，能不能捍卫列宁的这一理论。此时，邓小平针对东方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曲折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①“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②这就是邓小平关于曲折使人民经受锻炼和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的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了如何看待东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方社会主义进程发生曲折的问题，从内容上延伸了列宁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斗争的理论。它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社会主义的形势，科学地认识列宁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斗争的理论。

第二，它同人民的社会实践有着完全直接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虽然与东方人民的社会实践有联系，反映了社会实践对理论的需求，但是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掌握了深厚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获取和研究了东方社会的各种材料，并且就东方问题和西方问题作比较研究，从而形成和提出了他们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同人民社会实践的联系更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当时人民的社会实践处于初始阶段，内容不够丰富，成熟的程度也不足，又由于列宁提出这个理论后不久即离开人世，来不及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完善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他的理论在当时实践中的作用表现得也不够明显和有力。相比较而言，邓小平理论则同人民的社会实践有着完全直接的联系。它是在人民反复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中国从1958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上出现脱离实际的“冒进”现象，60年代初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纠偏，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可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冒进”的失误更为严重。同时对中国所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出现重大偏差，以为我国处于十分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指日可待。经过反反复复的失误和失误后的反思，又经过改革开放的过程以及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理论。从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理论同人民社会实践的前所未有的直接联系。这个理论产生以后，出现在党的有关文件中，成为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党通过思想宣传工作的途径，发挥新闻舆论工具和文学艺术的作用，使这个理论进入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用它来指导人民的行动。这说明，这个理论已经在人民的社会实践中显出巨大的力量。从这个理论产生的情况以及它产生后的作用看，它同人民的社会实践有着完全直接的联系。而它的这个特点和优点，是以往的理论所不及的。

三、列宁与邓小平：20 世纪东方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成熟

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指由列宁理论、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正确指导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20 世纪以来，东方许多国家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艰难曲折、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固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产生的理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称谓。但是由于东方各国的国情有其共性，各国人民的实践特点有其共性，所以科学理论的内容也有其共性。笔者由科学理论的共性出发，将这些理论称作东方社会主义理论。

（一）20 世纪是东方社会主义的世纪

人类历史上的 19 世纪，是西方社会主义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西方，40 年代末，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且把这个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领导和指导了 1848 年欧洲革命。在 1848 年欧洲革命过程中，发生了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即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60 年代以后，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群众的国际性组织——“第一国际”，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法国工人党，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美国劳动人民党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各国社会党和工人党的联合组织，即“第二国际”。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即巴黎公社革命，产生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进行议会斗争的大好局面。

在这个世纪的西方，产生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指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无产阶级是埋葬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这个阶级只有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领导下，通过革命的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

主义生产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正是这些理论，指导了19世纪西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如果说19世纪是西方社会主义的世纪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东方社会主义的世纪。在20世纪的东方，世纪初，产生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了1905年革命，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且领导人民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即“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亚洲的十几个国家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以后，在世界的东方，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域上连成一片，在经济上、生产上相互支持，一度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的的大好形势。虽然80年代末出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目前东方仍然有几个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工人阶级执政党以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仍然在世界的东方飘扬。

在20世纪的东方，产生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东方的经济落后国家由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容易发生革命；由于农民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的攻击力量异常强大；由于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易于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通过许多“中间环节”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一理论认为，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先于西方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并且可以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列宁之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曾经出现过偏差。但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意味着中国人民找到了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途径。这一理论对于东方其他国家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世纪初与世纪末的考验：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成熟

20世纪初，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确切地说，

是俄国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从国际上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落入低潮，使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非常恶劣的国际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是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了俄国的革命形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俄国，开创了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设想，俄国革命的胜利，会激发西方其他国家的革命，推动西方的革命走向胜利，形成俄国和西方许多国家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然而，形势的发展并非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设想的那样。在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一度掀起了高潮，有的国家如芬兰、德国等甚至发生了革命，但是，这些国家的革命未能最终取得胜利。而且，进入 20 年代后，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逐渐沉寂下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社会主义运动的落潮，意味着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摆脱了革命危机，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样，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它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困难百倍。可见，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极为恶劣的国际形势的考验。

从国内来看，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战时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工人阶级执政党面临着如何选择经济建设道路的考验。在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形势和支援战争的需要，党和政府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如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消费品供给制，劳动义务制，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对于战争的胜利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如果说在激烈战争的形势下人民群众能够忍受经济生活中的困苦的话，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则不愿意再接受这种事实了。1921 年初，俄国农民由于余粮收集制而对苏维埃政权不理解、不信任，城市工人因为生活困难而队伍严重不稳定。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民不满情绪的影响，由于白卫分子的反革命煽动，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意味着苏维埃俄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工人阶级执政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即怎样摆脱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的考验，或者说在过去的政策和措施不能够为人民所接受时如何选择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的考验。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经受了上述考验，并且在经受和战胜考验的过程

中提出了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理论。1921年2月8日，列宁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起草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提出党和国家要重视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具体办法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使粮食税的数额低于以往余粮收集制征粮的数额，允许农民将纳税后的余粮自由地投入“地方经济流转”。同年3月，俄共（布）举行十大。十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转变俄国的发展道路，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就这个报告作了总结发言。4月，列宁撰写了著名的《论粮食税》的小册子。在党的十大有关报告和《论粮食税》的小册中，列宁阐述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观点，如关于苏维埃俄国必须发展小农经济的观点，关于通过商业和市场实现城市工业经济同小农经济的结合的观点，关于发展和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作用的观点，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生产力落后的俄国通过“中间环节”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然而，它同俄国国情的实际相适合，同俄国无产阶级当时的实践相适应。因而，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提出和《论粮食税》的发表，标志着列宁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产生。他的这个理论不仅对于俄国当时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东方其他国家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所以列宁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产生，也就是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20世纪末，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方的社会主义又一次经受了考验。这场考验既是要不要进行改革的考验，又是怎样改革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考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未能经受和战胜这场考验，前苏联的执政党也未能经受和战胜这场考验，所以他们的国家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另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经受和战胜了这场考验，既领导人民发展了改革开放事业，又领导人民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党面临着如何确定以后时期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此以前，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和政治体制上照搬了别国的模式。这种体制虽然在建国初期曾经产生过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它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即它在政治上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经

济上不利于调动生产者及生产单位的积极性。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这种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而这场“革命”的进行，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体制。党通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时党必须明确地说明一个问题：以后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要开辟新的道路，还是要坚持原有的做法。党内一部分思想保守的人提出“两个凡是”，要求坚持过去的做法，认为过去的做法不能作丝毫变动，攻击改变过去的做法是“砍旗”。可是，不改变过去的做法，不开辟新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得到发展。这说明，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说明党经受和战胜了上述考验。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始终面临着怎样改革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考验。有的人站在“左”的立场上，对改革开放持抵触情绪，一有机会就“泼冷水”，甚至无理指责。有的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特别是崇拜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力图使中国仿效之。80年代末，这后一种倾向构成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严重干扰，使党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东欧剧变形成的压力，国内的自由化思潮等等，纠合成一种冲击波，妄图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然而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成功地经受了考验，战胜了这场考验。

在20世纪末中国共产党经受考验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搞现代化建设，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进展，邓小平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它认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必须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国家的主权，必须以“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领导。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应中国人民当前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而且是处于东方的一个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如同列宁的理论对于东方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具有这样的意义。可以说，它是当代东方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如前所述，20世纪初列宁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如果确认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认为，本世纪末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所谓“成熟”，指它更深刻、更科学、更全面、更系统了。也就是说，东方人民在20世纪漫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经过高潮与低潮、胜利与失利、成功与挫折的风风雨雨，终于找到了同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相适合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何谓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熟”

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熟”，一是表现为下述理论观点的科学化：

其一，关于各国人民必须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在分析革命形势、革命前景和各国的革命道路时指出，各个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每个民族的走法却不可能完全一样，在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在无产阶级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即认为各国人民应该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俄共（布）十大报告和《论粮食税》等文献中提出，俄国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特殊的办法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必要的。这里，他肯定俄国必须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显然，列宁已经产生了各国走自己的路的理论观点。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观点进一步科学化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在国情方面至

少有两个特点要注意到：一个是底子薄，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时期的破坏，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生产力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问题。由此他提出：搞建设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 这里的意思，就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道路。1982年9月1日，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更明确地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在邓小平的理论里，一是有了关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含义十分直接、明确和清楚的论断，二是全面地、具体地和深刻地分析了必须走自己道路的社会客观原因和历史必然性，所以说它使这个方面的理论观点更加科学化了。

其二，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观点。1918年春，即苏维埃政权基本得以巩固时，列宁提出必须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使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由对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转到管理经济与生产上。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史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初的思想与实践。以后，俄国进入国内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1920年初和同年年底，由于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和与此相联系的“和平喘息时机”的出现，列宁又先后两次提出了转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任务。1921年3月，列宁领导俄国走上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精神。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一系列思想与实践活动，促进了这一理论观点的科学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和党中央制定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并且领导党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移。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正式地提出了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他仍不断地向党和人民提出这个问题。在1992年初南巡过程中，他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是死路一条。”^①显然，邓小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了原来关于转变工作“重心”的提法及思想。而且他强调了与此相联系的“两个基本点”，这就使得这个理论观点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其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观点。列宁在1918年春提出必须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时曾说过：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斗争基本胜利时，应该把一个“根本任务”即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的任务提到首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列宁提出必须吸收旧社会过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借鉴美国的泰罗制，向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学习等等。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主张利用自由贸易和商业的作用等等，目的也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进一步地阐述了这个思想。早在1980年5月5日，他就在有关谈话中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②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显然，邓小平把能否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同能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联系起来，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意义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既强调发展生产力，又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说明在他的思想上，对“效率”的认识和对“公平”的认识是统一的。上述这些方面，深刻地证明了邓小平理论观点的科学性。

其四，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应该从现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出发，支持和发展私有者之间的自由贸易，发展商业，通过自由贸易和商业实现生产者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他还提出，应该把商业原则贯彻到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去，计算成本和利润，讲求经济效益，以一定的物质利益激发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列宁当时在有关文献中明确地提出，要“研究市场”和“发展市场”。可以认为，列宁的思想是利用现成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即苏维埃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家利用当时客观存在着的、旧俄国遗留下来的市场关系发展经济的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科学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他这一理论观点的科学性，突出地体现在它说明了市场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根据邓小平的理论，市场本身不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构成要素，不表示经济制度的性质，只是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市场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利用，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深刻的理论认识，是包括列宁理论在内的过去一切社会主义理论所远远不及的。

其五，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理论观点。20世纪初，列宁通过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革命形势的分析，提出当时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由此出发，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并且通过各国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支持和促进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当前的世界同20世纪初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邓小平从当前世界的实际出发，提出当前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他1985年在有关谈话中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②在他看来，所谓和平问题，指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缓和，大家都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所谓发展问题，指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谋求经济上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加速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得出结论：世界性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善于利用有利时机，解决自己的经济发展问题。1989年东欧剧变以后，邓小平仍然坚持对世界形势的这种认识，并且提出了与此有关的中国在上世界上“不当头”的观点。他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③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观点的科学性，不仅表现为它科学地说明了当前世界形势的性质，而且表现为它提出了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主义国家正确的国际战略与策略。

其六，关于“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的理论观点。从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看，无产阶级能否取得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贯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革命政党来领导。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沿着科学社会主义轨道发展下去，关键也在于能不能建设好执政党并加强执政党的领导。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列宁十分重视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主张经常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全体党员，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严格的纪律，反对派别活动，促进党的团结，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主张健全党内的监察制度，严格治党，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一贯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理论。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邓小平进一步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根本要求之一，是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①显然，同列宁的理论观点相比较，邓小平理论观点的深刻性和科学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在于它从防止“出问题”的角度重视党的领导班子的建设，特别是重视高层领导班子的建设。

上述几个问题，是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人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均遇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列宁初步地提出了正确的理论观点，邓小平进一步地实现了这些理论观点的科学化。不可否认，这些理论观点的产生、成长与科学化，是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成熟的表现。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意味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熟”，还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列宁在20世纪初的实践，一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二是限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很短，所以涉及的问题和从理论上回答的问题不够全面和系统。换言之，他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当时的条件下所遇到的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回答。这固然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应该充分肯定他理论与实践的开拓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末，邓小平形成和提出建设有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一是历史条件有巨大的变化，现今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问题同列宁时期相比更具复杂性和多样性，二是东方已经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有许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和借鉴。所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譬如，它包含有关于正确的思想路线的观点，关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的观点，关于中国目前所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观点，关于外交战略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依靠力量的观点和领导力量的观点等等，深刻地说明了它体系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由此，也可以看出它的理论成熟性。所以说，它的形成意味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

四、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

20 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由列宁理论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就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等重大问题的新观点，发展了列宁理论，从而标志 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熟。20 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下述重要的特点：

（一）深深地扎根于东方社会的土壤里

所谓深深地扎根于东方社会的土壤里，指它强调认清东方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并且主张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标。

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强调认清俄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1918 年春，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基本得以巩固，党和政府决定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时，列宁从俄国小生产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实际出发，主张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即主张在工业领域、农业领域、商业领域保持原来的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实施国家对生产活动的领导、指导、监督和制约。党内有的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攻击以上的主张是“右派布尔什维克倾向”，危言耸听地说苏维埃国家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列宁在批评这些言论时，指出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俄国社会经济的实际

情况。他分析道：俄国目前的经济成分有五种，即宗法式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他正确地指出，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生产自发势力，当时真正的危险在于小生产自发势力和私人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对于这种情况，列宁说：“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①正是从这种特点出发，他认为俄国正确的政策是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去克服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影响。他要求党内所有的人都看到俄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这一实际，说：“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的俘虏。”^②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首次深刻而明确地强调要认清俄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不断地强调了这个问题。他在党的十大上关于新经济政策意义的报告中，讲到俄国因为小农占优势而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指出：“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的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③从这一实际出发，他认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政权同农民达成协议，取得农民的支持，二是俄国革命得到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响应，得到西方国家革命的支持。同一时间，他在《论粮食税》的小册子里，在论及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时，郑重提出“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接着，他指出，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可是，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野蛮状态；在俄国其余的穷乡僻壤，乡村同铁路之间，往往相隔几十俄里，只有羊肠小路可通，甚至无路可通。他认为，由这样的状况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必需的条件是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把电力送到每一个村子。

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不断地强调要认清我国社会经济条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件的现实。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注意到的。”^①他指出，这两个特点一是底子薄，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时期的破坏，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生产力不够发展的情况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980年12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和编制“六五”计划时说：“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②这里，他所谓“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就是指要认清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明确优势和看准不足的地方。1988年5月，他在一次会见东欧某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③他建议各国共产党人认真地分析和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情，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可重蹈过去脱离本国实际搞建设的覆辙。

列宁和邓小平在强调认清本国实际的同时，主张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俄国的国情是小农占人口大多数时说：“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④这说明，列宁认识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同时，他主张探索适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有关文章中，他分析了俄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后提出：“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在列宁看来,通过“中间环节”走向社会主义,是适合俄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理论精神和原则,在邓小平理论里也有深刻的体现。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1984年10月,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中,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走自己的路时指出:“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③可以说,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贯穿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始终的核心的内容之一。

列宁和邓小平由于认清了本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主张从这个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以及政策、措施的理论,符合本国的实际,或者说符合东方国家的实际。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的有关政策和措施,有实行粮食税、支持小农和私人工商企业发展、发展商业和市场、发展对外的租让制和对内的租赁制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质是,在农村鼓励小农经济发展,在城市鼓励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通过商业和市场实现城乡经济的结合,繁荣经济,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显然,列宁关于政策和措施的理论,符合俄国小生产占优势和多年战争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的实际。根据列宁的战略理论,俄国将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逐渐地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一理论说明,俄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缓慢的过程,即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这一理论也是同俄国生产力水平低和经济落后的状况相适应的。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领导党和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发展集市贸易和搞活城乡经济,对外开放和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他主张采取这些政策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和措施，在于他正视了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较低和经济不发达的事实。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理论提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理论的立足点，也是我国目前生产力和经济条件的客观实际。总之，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的理论，以及我国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理论，都是同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相符合、相适应的。

（二）大胆地探索前进的道路

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事业。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由于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也需要开拓前进。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他们的理论具有大胆探索前进道路的特点。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列宁的理论体现出大胆探索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里否定了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它丝毫不能改变资本家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事实。如前所述，在1918年春苏维埃国家转变工作重心时，列宁主张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可是党内有的人反对列宁的主张，攻击这种主张是一种“右派”倾向。列宁在反驳这种言论时说：“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只言片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①“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②在这里，列宁一是说不能利用书本上的词句来反对现实生活，应该从现实出发来衡量政策和措施的得失，二是高度地评价了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它是俄国的“救星”。这一论述，体现了在现实生活中大胆探索前进道路的精神。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进一步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苏俄实行了租让制、租赁制和合作制。这些经营组织形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

式，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党内有的人对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心存疑虑，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报告中就这一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遇到的新问题，“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①。他所谓的“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书本的束缚，到现实生活中去探索前进的道路。

在自由贸易和商业的问题上，列宁的理论也体现出大胆探索的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商品、自由贸易和商业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事物，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自由贸易和商业。可是，在苏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列宁主张让小农和其他小生产者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对于他的这一主张，党内一些同志不理解和难以接受。针对此，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的报告中说，有的人提出，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人怎么可以承认自由贸易？怎么可以实行这种自由？难道这里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吗？他就这些疑问作答道：“如果谁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他就错了。”“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因为播种的季节就要到来了。然后再来发动我们整个机关，运用我们全部的理论力量 and 实践经验，来研究这个工作怎样进行。”^② 这里的意思是说，离开了社会实践，在会议上谈论这个问题，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答案，需要的是大胆实践的勇气，果断地推进工作，然后在实践中探索正确的答案。他还说：“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③ 意思是说，可以确定一种新的理论观点：即走向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可以给小农以贸易自由，可以发展商品交换，而不必担心这样做会危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同年10月，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文章中，进一步地论述了商业问题。他说：看起来商业与社会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① 党内有些干部对于发展商业尤其是对于自己从事商业活动有抵触情绪，说过去在敌人的监狱里没有人教经商的课程。列宁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教革命战争，也没有人教管理国家，但是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都学会了，对于经商，共产党人也要在实践中认真学习，发现和掌握工作的规律性，推进商业工作的进展。

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明确地、直接地提出要大胆探索前进的道路。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我国历史处于向何处去的转折关头。如果按某些人的意见，坚持“两个凡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将不能得到进步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将会走向毁灭。如果结束过去的历史，走新的道路，那么新的道路在哪里？怎样才能够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信心？这时，邓小平向全党提出，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胆探索前进的道路。1978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② 他提出，不仅党中央，而且省委、地委、县委，工厂、机关、学校、商店、生产队，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脑筋想问题；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要鼓励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思考出路问题和前进道路问题。80年代中期，我国的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由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等等。这时，邓小平认真地总结了前一阶段改革的经验，再次提出大胆探索前进道路的问题。1985年3月，他在一次会见日本友人时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③ 他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所以尽管前进的道路有风险，有困难，也要大胆地坚持；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效果如何会影响亿万人民群众的情绪，所以改革的步子要稳，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使前进的方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向更明确。1992年初，我国历史又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即向改革新高潮迈进的关头。这时邓小平又一次提出大胆探索前进道路的问题。他在南巡过程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①在这里，他一是强调要大胆，二是强调要走一条新路。这就十分明确、十分直接地向人民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邓小平的理论看，他关于特区建设的理论体现出大胆探索的特点。1980年开办经济特区时，党内有的同志有畏难情绪，邓小平要求大胆地进行这项试验。1979年4月，他在同广东省委有关同志的谈话中，就创办特区问题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几年以后，特区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1984年2月，他在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时，肯定地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1985年6月，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就特区建设问题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②上述邓小平的一系列论断，强调不囿于书本的限制，勇于实践，大胆试验，探索特区建设的经验，从而使他的理论体现出大胆探索的特点。

邓小平关于先富共富的理论，也体现出大胆探索前进道路的特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工农差别、阶级差别，更无当前人们所说的贫富分化的问题。可是，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处于情况非常特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不能消灭工农差别和阶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方针呢？邓小平经过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中的摸索，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论。但是，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各个劳动者自身的素质及劳动的手段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目前尚不能够立即达到共同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裕。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探索和摸索的过程中，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的劳动先富起来的理论。他在有关谈话中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①邓小平提出共富和先富的问题，以及对达到目标的政策之阐述，都体现出理论上大胆探索的特点。

在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作用的理论观点，关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观点等等，都体现出理论上大胆探索的特点。

（三）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目标

历史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有激进的过渡和渐进的过渡之分。所谓激进的过渡，指通过激烈的手段，快速地推进过渡的过程。所谓渐进的过渡，指采取缓和的办法，逐渐地发展过渡的过程。列宁和邓小平都主张采取缓和的办法，逐渐地发展过渡的过程或者说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所以，主张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目标，是他们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列宁主张渐进地发展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设想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以“计算和监督”为主要特征。其具体内容是：不立即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由工人或工人团体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制约资本家的活动，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通过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改变经济关系及社会生产的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列宁的这种设想遭到了一部分资本家的反对，于是苏维埃政权对这些企业采取了国有化的措施。可是，到1918年3、4月间，当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告一段落时，列宁提出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把“计算和监督”的任务重新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显然，列宁这一阶段所设想的过渡途径，不是迅速的、激进的过渡，而是一种渐进的过渡。

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针对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的、正常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的任务所提出的思想，即通常的、一般意义上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也是主张渐进的过渡，即主张通过较长的时间，逐渐地完成过渡的任务。1918年11月上旬，他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下子就把数量很多的小农户变成大农庄是办不到的。要在短期内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经营的农业变成公共经济，使之具有全国性大生产的形式，由全体劳动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劳动义务，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劳动产品，——要一下子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可能的。”^① 这里所谓“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一下子”是不可能的，指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缓慢的过渡阶段。12月中旬，他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又说：“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指公有制——引者注）的过渡，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深深知道，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② 在这里，他不仅清楚地说这种过渡“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明确地提出，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不可能实现这种过渡。1919年10月，列宁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这里，他在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要求消灭阶级，要求消除工农差别，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经过长期的、逐步的、渐进的过渡，绝对不可以采取急躁轻率的态度。这就是他所说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③ 总之，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在论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自始至终强调不能急躁轻率地行事，不能企图一下子解决问题，要求进行长时期的、渐进的过渡。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主张，更明显地表现其属于渐进的过渡。根据他的思想，俄国由于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生产力水平太低，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作用，主张使其成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显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然，有了这个“中间环节”，或者说既然列宁主张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作用，那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就只能是渐进的过渡。

以上对列宁各个时期过渡观点的阐述，足以说明，列宁的理论具有渐进过渡的特点。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尽管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这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務不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理论体现出渐进的特点。1980年即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过去我国“冒进”的教训，要求以后逐步地、渐进地推进建设的过程。这年4月，他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时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①他认为，过去我国由于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把速度搞得太快，结果越搞越穷，教训非常深刻。同年5月，他在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这个问题又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②鉴于过去的情况，他提出，要解放思想，开展改革，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农村还要解决因地制宜的问题，各个方面都要避免过去把速度搞太快的错误。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立意避免过去“左”的错误，逐步地、稳妥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8月，他在有关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③这一理论说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以后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是不能离开我国已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现实，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二是不能离开我国生产力和经济不发达的现实，不能超越阶段地把速度搞得太快。1992年初，他在有关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① 这里的意思，也是强调不要忘记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坚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同时要有长期建设和发展的思想，通过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不断努力，逐步地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邓小平关于“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也体现了渐进走向目标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正是吸取了过去“左”的教训，所以在制定我国以后的发展目标时不是要求一步到位，而是主张分“三步走”。1984年10月，他在有关讲话中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② 他认为，我国发展的第一步要十年，第二步也要十年，第三步要三十至五十年，这样经过五十年至七十年努力，才能逐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他的这一理论，有利于人们克服发展上的急躁情绪，有利于人们避免“冒进”行为。正如中宣部颁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指出的：这个经济发展战略，既表明我们制定的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又表明中国人民决心用一百年左右时间艰苦奋斗，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

(四) 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所谓原则的坚定性，指在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方向问题上，或者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动摇。所谓策略的灵活性，指在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在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和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可以灵活和通融。列宁的理论和邓小平的理论，均具有这样的特点。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苏俄同德国之间要不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问题上，列宁的理论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当时的情况是，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但是苏维埃国家同德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由于这原本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由于俄国的国力已经不能够继续支持战争，更由于巩固苏维埃政权需要退出战争。所以，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代表团同德国代表团进行谈判，希望签订和约。在谈判过程中，德国代表团提出领土要求。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苏俄将失去大片领土。列宁和俄共（布）从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领导签订了和约。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一是强调坚定地坚持原则，即强调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二是强调灵活地运用策略，即主张接受德国代表团提出的条件，哪怕是屈辱性的条件，以求得到和平。1918年3月，他在党的七大上，在亲自起草的有关决议中指出：“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必须利用一切喘息时机，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时机，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批准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签订的极苛刻和极屈辱的和约。”^① 在大会上的报告中，他还指出：签订和约意味着“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我要让出空间给实际的胜利者，以便赢得时间。全部实质就在于此，也仅仅在于此。”^② 显然，在列宁看来，赢得时间和喘息时机，巩固苏维埃政权，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条件，这是当时最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而批准和约和让出空间，只是一个策略问题，如果确认它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采取这种策略，当然也可以采取其他的策略。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关于利用托拉斯的组织者及旧专家的理论，也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1918年春转变工作重心时的实践中，列宁鉴于国家缺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求吸收过去托拉斯的组织者和旧的技术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委他们以重任，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说：“从前的工业领袖，从前的长官和剥削者，应当担任技术鉴定人、指导人、参谋和顾问的职务。”^③ 他号召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向他们学习，说：“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①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国家实行租让制，让外国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到俄国来经营企业，并且实行租赁制，将一部分国有企业出租给过去的企业主，由他们私人经营。列宁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可以利用国外和国内经营者的管理经验，而且有利于工人群众和共产党人向他们学习做经济工作。在列宁看来，在当时的实践中，促进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必须坚决坚持的原则，而利用托拉斯的组织者和旧的技术专家，让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向他们学习，只是一种可以灵活运用策略手段。

邓小平的理论，也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体现出他理论的原则坚定性。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说：“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党的每个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② 1989年风波结束以后，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错，错就错在近几年坚持得不够一贯，不够有力，没有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的群众，以后必须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可见，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的立场和态度是再坚决和再鲜明不过的了。可是，另一方面，即在改革开放的措施和办法上，邓小平理论认为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1992年初，他在南巡过程中，在同有关同志谈到证券、股市好不好时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③ 这里的意思是说，对于要不要搞证券和股市，应该灵活一些。在国际战略上，邓小平理论也深刻地体现出策略的灵活性。东欧剧变时，邓小平针对变化中的国际局势提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23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① 意思是说，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不定，所以不要表态，免得陷入被动的境地。显然，他是着眼于我党和国家在国际活动中保持灵活和主动的地位而提出上述意见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旧的国际力量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有待于建立。有的国家希望中国站出来“当头”。邓小平就此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② 他提出不“当头”，也是为了使我党和国家在国际上实行灵活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保持斗争中的主动权。

五、20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

20 世纪以来，东方的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由列宁理论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列宁理论，首先面对了东方国家生产力及经济落后的实际，探讨了同东方实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途径。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理论里同东方实际相适应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内容，克服了列宁以后理论上出现的各种偏离客观实际的倾向，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以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飞跃

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不仅是一般的、某些方面的发展，是深刻的、整体性的飞跃。

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到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于 19 世纪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当时，西欧国家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可能性，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为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如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向群众作革命宣传，建立工人群众组织等等。在这个过程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3 页。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面对的正是当时无产阶级准备革命的实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而且只能是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和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在于阐述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必然性，指明革命的力量、领导者以及革命道路。1848年欧洲革命结束后，马克思、恩格斯为总结革命的经验而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工农联盟、不断革命等重要的理论观点，但这些观点所针对的问题仍然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认为必须用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代替被打碎了的国家机器。《哥达纲领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以及这个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恩格斯晚年的一些著作，主要内容在于指明新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和方式，以及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路线。可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看成为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符合实际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开始提到无产阶级的面前。1918年春，俄国的新政权基本得以巩固时，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中阐述了俄国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1921年春天以后，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与途径，以及有关的各种问题。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邓小平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阐述了我国如何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促进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问题，如《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等等。由此可见，认为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是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由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到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一飞跃不仅表现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无产阶级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从而显示出它的科学性和重要历史地位，而且表

现于或者说更主要地表现于后者同前者相比较，在意义和作用上有重要的区别。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相比较，这个阶级巩固政权和建设新社会的斗争，更加困难、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加伟大。列宁在著作中曾经把夺取政权的斗争视为“轻骑兵”行动，把建设新制度的斗争视为“重炮兵”行动，形象地说明了后者超越于前者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有关讲话中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认为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更艰难，也在于说明建设新社会的斗争意义更为重要。由于从实践上看后者比前者意义更为重要，所以在理论上面对后者的理论同面对前者的理论相比较，必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由面对革命的理论到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西方问题为主题的理论到东方问题为主题的理论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说明的问题，主要是西方问题。19世纪前期和中期，东方国家尚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并且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社会主义运动日益壮大。在这种条件下，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面对西方问题，即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文明国家里发生和取得胜利。1848年欧洲革命结束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时所论及的，主要是德国、法国的工人革命斗争。一直到恩格斯的晚年，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法德农民问题》、《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在研究和论述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时，仍然以西欧国家的斗争作为研究的对象。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西方问题的理论。值得指出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革命运动兴起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关注，在有关文章中论及了俄国革命发展的问题。恩格斯晚年甚至提出，未来的俄国革命是全欧洲革命的开端，即认为未来的俄国革命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开始，在它之后而且只有在它的推动下才有其他国家的革命。但是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西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虽然可以先于西欧发生革命，但是它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则有待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即认

为只有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西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俄国革命才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①。这说明，恩格斯在晚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视线仍集中在西欧，思想出发点仍在西欧。

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则是以研究和说明东方问题为主的理论。20世纪以来，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无产阶级成长起来，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革命运动中，这些国家的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研究本国实际和指导本国人民实践的理论，如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等等。

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在于说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在1918年春苏俄转变工作重心过程中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研究了俄国的国情，明确地指出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并探索和基本指明了适合俄国实际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新经济政策的道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1921年以后，在世界革命战略路线的问题上，列宁形成和提出了世界社会主义胜利“东方国家决定”论，把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视线投向了东方。20年代初，国际革命运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在西方，随着德国、匈牙利等国革命的失败，各国的革命形势逐渐消退了。鉴于东、西方革命运动形势的逆向发展，列宁一是提出西方国家因为经济政治发展的特殊条件，未来难以发生革命，甚至根本不会发生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二是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因为阶级矛盾尖锐和革命攻击力量强，比西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容易取得革命的胜利。三是提出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先于西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四是提出未来世界革命的决战，将发起于东方^②。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列宁理论是关于俄国问题和东方问题的理论，或者说是以研究东方问题为主的理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在于说明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途径，建设同中国的国情相

^① 参见俞良早：《恩格斯晚年关于东方发展的科学预见》，《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9页。

^② 参见俞良早：《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章。

适合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理论指明，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一方面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发达阶段，认为这个阶段一直要延续到下个世纪中期。它还指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解决人民的温饱，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的小康生活更为宽裕。上述邓小平理论的内容足以说明，它是以研究和说明中国问题为主的理论。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所以，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研究东方问题为主的理论，也是符合实际的。

由以西方问题为主题的理论，到以东方问题为主题的理论，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由于东西方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东方矛盾的特殊性，到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东方。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需要产生适合东方实际的社会主义理论。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都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显然，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是社会主义实践上的一个飞跃。与此相联系，产生了以东方问题为主的理论，则是理论上的一个飞跃。从理论的内容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地说明了19世纪西方的实际并指明了同西方实际相适应的革命道路的话，那么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则正确地说明了东方生产力和经济条件的实际并指明了适合东方实际的社会主义途径。理论内容和作用的这一变化，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飞跃。

（二）一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最伟大成果

以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世纪以来东方人民社会主义实践的最伟大成果。

20世纪是东方社会主义的世纪，是东方许多国家人民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纪。那么，应该怎样去认识人民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呢？笔者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主义实践一个世纪的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也许只是刚刚开头的一瞬间，即事物萌芽状态的一瞬间。在认识这一阶段人民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时，不应该仅仅关注物质的成果，应该关注精神的成果，甚至应该主要地去看精神的成果。直接地说，在认识这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时，不应该仅仅看建成了多少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

地域有多大，拥有的人口有多少，或者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美程度如何，优越性体现得怎样，如同人们在认识资产阶级革命开头一个世纪的成果时不能看物质的成果并且看不到多少物质的成果一样。正确的认识方法是，看人民有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看有没有形成正确的理论。由列宁理论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说明东方人民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说明已经形成了科学的东方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既是东方人民一个世纪以来努力实践的成果，也是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重大的成果。

之所以说它是“最伟大”的成果，在于它伴随着人民的实践，经历了一次次社会主义低潮的考验。第一次低潮的考验，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欧洲革命风暴过去后的低潮形势对苏俄人民的考验。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中。俄国人民希望欧洲其他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从而减轻国际形势对苏俄新政权的压力。可是，随着 1918 年德国革命和 1919 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欧洲革命风暴很快过去，出现了低潮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更为困难。革命形势走向低潮，意味着各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摆脱了政治危机，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以后，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对苏维埃俄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甚至有可能像 1918 至 1920 年那样再次对苏俄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从国内来看，由于俄国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条件极为困难，以及其他的原因，它不能不通过迂回的途径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从 1921 年起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相对于过去的政策和措施而言，新经济政策支持 and 鼓励小农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允许自由贸易，实行对外的租让制和对内的租赁制等等，是一种战略退却。这种战略退却，给刚刚前进在社会主义征途上的俄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列宁领导俄共（布）和苏俄人民以坚强的意志和奋勇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里展开了艰巨的工作，使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受了形势低潮的考验，保持了世界上的第一块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如关于战略退却的思想、关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于通过“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关于通过商业实现小农经济与城市社会主义经济结合的思想、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等等。

第二次低潮的考验，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后社会主

义低潮的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考验。当时，东欧的几个原来同中国一起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相继偏离正确的改革方向，共产党人丢失政权，投向了西方的怀抱。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新型马列主义政党——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了。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改变颜色，被瓦解了。这就产生了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次低潮。随着低潮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严重的舆论压力。在中国国内，一些人于 1989 年发动学潮和政治风波，大有逼共产党下台的形势，造成了国内极为混乱的政治局势。国外反动势力乘机向中国进行政治渗透，达不到目的时从经济上、贸易上制造种种麻烦和困难，力图迫使中国和平演变。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团结起全国人民，不畏艰险，奋勇斗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经受了这次形势低潮的考验。也就是说，在中国成功地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如增添了关于不断地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的观点、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观点、关于坚决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的观点、关于冷静观察国际局势和中国不当头的观点等等。

革命形势低潮，对理论的科学性是一个严格的检验。因为在这时，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尤其复杂，人民实践中的困难特别多，实践对理论的科学性要求特别高。只有真正科学的理论，才能指导人民制定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正确地展开斗争，成功地走出低潮。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可说是经得起检验的理论。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先后指导人民成功地经受了低潮的考验并走出了低潮，是经得起低潮检验的真正科学的理论，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最伟大成果。说它是“最伟大”的成果，还在于它随着实践的进展，纠正了社会主义实践自身路线和政策的偏差所导致的曲折。列宁的理论纠正了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曲折。1918 年夏至 1920 年底，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俄共（布）领导人民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的形势和支援战争的需要，党和政府在国内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如征收余粮、禁止自由贸易、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劳动义务制等等。这种政策虽然对于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战争结束时，农民因为对余粮收集制不满而不

愿意搞好农业生产，国家因此而收不到粮食。因为没有粮食，城市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无法保障，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更无从谈起。而且由于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发展，加上敌对势力的煽动，苏俄农村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暴动，1921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时，俄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是俄共（布）和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曲折。列宁的理论纠正了这个曲折。1921年3月以后，列宁形成和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指导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了新经济政策，从而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活跃了经济，消除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且逐步地明确了俄国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邓小平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左”的路线和政策导致的曲折。列宁以后，社会主义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左”的倾向的干扰。一种表现是经济建设上的“冒进”，即脱离实际地规定经济发展的高指标，采取非常手段加快经济增长，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进行“穷过渡”。另一种表现是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即在思想认识上夸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阶级敌人进行破坏的严重性，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行动上错误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人民群众。30年代，苏联的进程中，出现了这种曲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新产生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这样的曲折。在中国，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实现后不久即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经济建设上“冒进”的失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名，迫害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经济上以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由，不断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从3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这种“左”的倾向及错误，一直没有引起这些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的自觉的认识。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指导下，我党才深刻地认识了它，进而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这时，我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严重的曲折才得以纠正。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仅是我党和国家发展道路上曲折的纠正，而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曲折的纠正。邓小平理论对于纠正曲折发生了思想指导的作用。在纠正曲折的过程中以及在这以后的实践中，他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直至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能够纠正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曲折

的理论，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社会主义实践发生曲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人阶级执政党思想理论上的偏差。所以，纠正实践道路上的曲折，重要的环节是纠正思想理论上的偏差。纠正这种偏差，要求起纠正作用的理论具有真正的科学性，能够深刻地、正确地、清楚地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本来规律，有说服力地指出过去思想理论上的偏差，从而用自己的科学原理克服过去思想理论上的偏差。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都做到了这一点，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是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最伟大成果。

（三）推进新世纪社会主义进程的理论武器

眼下，世界社会主义将随同人类社会，走出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新的世纪，将仍然是东方社会主义的世纪。因为在东方，导致社会主义先于西方发生和发展的条件依然存在。比如，在东欧一些国家，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左翼政党正在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而且东方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几个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存在着中国和其他几个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方，以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推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新世纪，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有关于各国走自己道路的理论观点。在 20 世纪，列宁于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俄国由于小农经济占优势，生产力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即认为俄国应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则多次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于坚持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世纪，这一理论观点对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仍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东欧一些国家人民群众的斗争，这一观点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或者说借鉴意义。如果各国人民真正认清了自己的国情，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或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定能把革命斗争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在新世纪，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有关于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理论观点。列宁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无产阶级在巩固政权的斗争基本取得胜利时，应把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提上实践

的日程，这个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则更明确地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东方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生产力水平都比较低，发展生产力是他们首要的任务。可见，上述理论观点对于他们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

在新世纪，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有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观点。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东方革命力量同西方反动势力之间已经形成了“均势”，即形成了一种力量平衡，由此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够和不再敢发动对苏俄的战争，俄国人民应该趁机进行经济建设。邓小平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和平问题，即东、西方国家都希望和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二是发展问题，即经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都在谋求经济发展。由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在新世纪，特别是在新世纪的前期，世界形势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和平和发展将仍然是世界的两大问题。所以，上述理论将仍然是人们认识世界形势的武器，将继续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在新世纪，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有关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理论观点。列宁曾经提出，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经济上的连带关系，应该同它们做生意，但是要以苏维埃国家获得利益为前提，绝对不能有损本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则更深刻和更明确地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应该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是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作斗争，坚决地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在新的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还将继续下去，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不会停止。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在这个实践中，上述理论观点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中同东方实际相适合的各个观点，对于新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均具有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在新世纪，人们用以指导实践，必将使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向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 东方社会理论

一、概 论

(一) 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

1875年3月底至4月中旬，恩格斯写作并发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俄国及东方社会问题的第一篇重要著作。1877年10—11月，马克思写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再次就俄国及东方社会问题表达了看法。1881年3月，马克思写作《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该复信包括初稿、二稿、三稿和正式的复信，它是马克思全面地、深刻地论述俄国及东方社会问题、表达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的文献。1882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进一步论述了东方社会理论。1894年1月，恩格斯写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总结和归纳了他们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

研究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包括下列重要内容：

(1) 俄国农民陷入了极其贫困、无法忍受的状况。1861年，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此后，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获得了进行生产和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份地”。可是农民为了从地主手中赎买“份地”，必须从国家或者说政府那里贷款，必须在49年内分期偿还这笔债务。而且获得公民权的农民被列入纳税等级，必须向国家缴纳各种赋税。这样，俄国农民在废除农奴制后名义上获得了“解放”，实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针对此，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指出：“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

状况。”^① 在此著作中，恩格斯历数俄国农民贫困难忍的事实：农民的份地，在当时俄国的耕作条件下，“小得无法赖以糊口”；他们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一大笔钱，由于这笔钱是国家替他们垫付的，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由于俄国地主和贵族几乎完全免税，农民承担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由于新建立了地方管理机关，省和县一级也向农民派下捐税，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来到农民中间，拿现钱放债，农民需要以现钱交税，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每到收获的时节，粮商来到农民中间，散布各种压低粮价的谣言，农民被迫低价出售一部分养家糊口所必需的粮食。恩格斯说：“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挨饿为基础的。”^② 马克思在有关信件中也分析了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剥削农民、农民陷入贫困以及俄国土地贫瘠、地力耗尽、丰年被荒年抵消的状况。

到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的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可是农民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继续强调：“农民负担了赎金，再添上捐税加重，同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和越来越差，自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为富人的债务奴隶。”^③

(2) 东方专制制度建立在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及彼此隔绝状态的基础上。19 世纪的俄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独立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地主和贵族是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他们占据国家政权的各个职务，分享专制制度的权利，支持沙皇的统治。沙皇专制制度依靠反动的军队和警察，镇压一切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行为，特别是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他们实行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禁止议论政府的出版物和言论，并对学校实行严密的控制。这种制度具有东方的特点。东方其他的国家如中国、印度、伊朗等在历史上也实行过这种制度，俄国专制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制度中具有典型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称俄国的制度是“东方专制制度”。

东方专制制度是由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和他们彼此间完全隔绝的状态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4 页。

成的。在西方，由于工业的发展，由于交通与交往的便利，各个生产单位的人们之间，不同城市和地区的人们之间，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容易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和形成行动中的统一，从而形成较强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政治力量面前，不易形成专制制度。在俄国和东方其他的国家，在极为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农民孤立地从事生产和生活，彼此之间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与此相适应的是东方专制制度。俄国农民虽然以“公社”的形式进行生产和生活，但是各个公社的活动是孤立的和彼此隔绝的，由此农民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孤立和隔绝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专制制度正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指出：“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①即是说，由于农民生活在孤立、彼此隔绝的环境中，他们不能实现对社会的管理，这就产生了专制制度并由它来实施社会管理的职能。恩格斯还说，当时的俄国财政混乱，官吏腐败，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下降，“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②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也写道：“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③这里也就是说，由于农民在生活过程中缺乏联系，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容易产生专制制度。

(3) 俄国的“农村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在俄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农村公社。它的特点是：土地公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定期轮换，农民不得放弃土地，不得买卖土地；农民的住房、菜园以及生产工具个人所有；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劳动，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国家通过“农村公社”管理机构向农民征收赋税。“农村公社”的地位和作用在历史上是不稳定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人身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由，“农村公社”制度遭到严重破坏。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它的地位和作用曾有所加强。可是不久，沙皇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村公社”，产生和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排挤“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写道：“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①他还说，沙皇政府帮助和支持资产阶级吮吸“农村公社”的“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由于沙皇政府的帮助，剥削“农村公社”的一切技术手段和经济手段都发展起来，“破坏性影响的这种促进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指由于压迫和剥削‘农村公社’所引发的革命事件及力量——引者），就必然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②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写道，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需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铁路，可是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所谓农民的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③特别是到19世纪90年代，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铁路以及许多行业的大工厂建立起来，已有的银行扩大了并建立了新的银行，农民从农奴的地位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迁徙自由，“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④

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俄国的“农村公社”面临着瓦解的危险，意味着他们对俄国走一条新式道路即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主义革命家提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会真正发展起来，无产阶级在俄国也不可能发展壮大；俄国农民具有社会主义本能，依靠农民的力量，推翻沙皇制度，就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俄国走这条新道路的基本条件，是“农村公社”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证明他们对俄国走新式道路不抱什么希望，或者说持怀疑态度。

(4) 不排除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断言俄国的“农村公社”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对俄国走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新式道路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毕竟只是怀疑它，没有否定它。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上，不排除俄国走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新式道路的可能性。1881年2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写道：“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① 这是马克思关于俄国有可能走新式道路的经典性论断。在此复信初稿中，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或者说同上述引文类似的论断共有5段^②。在正式的复信中，马克思写道：“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③ 这里他说深信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也表示他肯定俄国有走新式道路即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总结和归纳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思想，有三点值得重视：其一，俄国“农村公社”成为新经济制度的出发点，已有的条件或者说自然条件是：土地公有制有利于实行集体耕作；俄国土地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它同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使它有可能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其二，必须再创造的条件是：国家和社会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765、767、769、7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农村公社”予以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财力上的支持和帮助；必须通过俄国革命，才能改变“农村公社”所面临的非常不利的环境。其三，“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①。如果确认上述马克思的三个思想，就应该肯定马克思形成和提出了俄国走新式道路的思想。因为他已经肯定了俄国已有的种种条件，肯定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他所提出的必须再创造的条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必须再创造的条件，形式上看有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进行俄国革命，这是一个有很大可能性的问题。

值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时，总是将这种可能性同西方革命的胜利及西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这里，他们将俄国革命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看成为同一个过程的革命，主张以俄国革命促进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发出“信号”），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反过来支持和促进俄国革命，使俄国同西方一起走向社会主义胜利（即“互相补充”）。

1894年1月，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进一步指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③恩格斯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这不仅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①即适用于东方经济落后的其他国家。西方的社会主义将对东方人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②

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时，是附加有条件的，即西方先于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们提出了何种条件，不管这些条件有无实现的可能，或者说不管他们的这个思想是不是科学的，他们探索和论述了俄国走新式道路的问题，他们希望俄国能够走新式道路，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5) 俄国革命即将爆发，它将改变俄国和世界的面貌。当时的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十分尖锐，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说：“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③“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俄国革命的意义之一，在于它能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除对“农村公社”的破坏性影响，使“农村公社”真正成为社会新生的因素。马克思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⑤俄国革命的意义之二，在于它能够产生一种冲击波，推动西方的革命，加速西方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恩格斯指出：“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俄国革命可以挽救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使俄国沿着新式道路发展成为可能，还可以推动西方的革命，加速西方走向社会主义胜利。这说明，在他们心目中，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451页。

来的俄国革命是改变俄国以及整个欧洲面貌的契机。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包括关于俄国农民的地位和状况、东方专制制度及基础、“农村公社”的命运、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及其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它从俄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可能的发展途径、发展的条件和契机等方面阐述了当前的俄国和俄国的发展。这个理论对于东方同俄国情况相同或大致相同的国家，均具有指导的意义，所以说它是东方社会的理论。当前国内学术界有的学者仅仅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归结为东方社会理论，这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

笔者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一是在于他们的理论处于马克思主义史的“起始”与“出发”的位置，二是在于他们的理论为以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它的基础上才有以后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由关于俄国农民的地位和状况、东方专制制度及基础、“农村公社”的命运、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及其影响等方面的内容所构成。正是由这样的理论体系出发，列宁在以后的实践中形成和提出了他的东方社会理论。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观点、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的观点、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的观点。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虽然同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人民的实践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更具有科学性，可是它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为出发点，由此出发并根据新的实践和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从而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具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中的下述重要观点成为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出发点，促进了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

（1）关于俄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俄国革命会推动西方的革命，加速西方社会主义的胜利，从而会带来俄国以及整个欧洲面貌的改变。列宁以此观点为出发点，确定了俄国革命的路线和战略方针。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关于革命的路线和战略方针是：以俄国革命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使西方无产阶级掀起同资本主义的决战，促进西方走向社会主义胜利，俄国在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向社会主义胜利。他1917年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农民群众能够彻底实行不可避免的、条件已经成熟的土地革命，直到没收地主的广袤无垠的全部土地。”“这种变革本身还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会极有力地推动全世界的工人运动。”“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行决战。”^①在这里，列宁的思想是：俄国无产阶级不会立刻将俄国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俄国革命会激发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下，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列宁的这些思想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及其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为出发点的。

(2) 关于俄国及其他东方国家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如果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成为社会新生支点的话，即俄国能够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同时存在，它可以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将西方的文明成果同自己的优势结合起来。恩格斯甚至说过：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

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落后的国家——俄国及东方其他的国家才能缩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走俄国新式道路可能性的过程中，深刻地阐述了东方国家吸收文明成果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他们东方社会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中，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为出发点，形成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1918年春，列宁在提出将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重心转向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时，主张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他说：“丝毫也不应忘记，泰罗制体现了科学的巨大进步，它系统地分析了生产过程，为大大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开辟了途径。”^①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以为无产阶级所利用，“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任务，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应当在全国实行泰罗制和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科学方法，把这种制度同缩短劳动时间结合起来，同利用新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方法结合起来，而丝毫不损害劳动居民的劳动力。”^②这一时期，列宁还提出，德国有开展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技术，有管理经济和生产的国家组织，即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很有成就和经验。他说：“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③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采取租让制。他说：“没有外国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④“不实行租让，我们就得不到设备精良的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帮助。不利用这种技术，我们就不能在石油开采这种对整个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里为我们的大生产打好基础。”^⑤上述列宁关于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论断及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脉相承，以前者为出发点并光大了前者的精神。

(3) 关于将“农村公社”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农村公社”的命运时说，如果沙皇政府在解放农奴以后将农民的赎金用以支持和扶持“农村公社”，如果政府不支持新兴资产阶级对“农村公社”进行种种剥削，“农村公社”则不会很快面临崩溃的危险。要挽救“农村公社”，必须排除对它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具备正常的发展条件。这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个观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它告诉人们，国家以正确的态度和措施对待农民和农业至关重要。在此问题上，列宁晚年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列宁当时在有关文章中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其中一个任务是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引导农民参加合作社。他这里所说的合作社是消费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合作社。即便是建立这种合作程度较低的合作社，列宁提出：“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钱财上的优待（如银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部门的一样多。”^① 这里的思想是，苏维埃国家从财政上支持合作社，而且支持的数额同重工业一样。他还说：要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目的。”^②

这里的意思是，要达到居民合作化的目的，一是要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二是要有物质保障，防备灾年。这里列宁的思想是，苏维埃国家为农民和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是将农民和农业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可以看出，列宁的思想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为出发点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不仅成为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是列宁以后其他经典作家理论的出发点。如邓小平关于吸收和运用西方科技成果的理论，关于吸收和运用世界上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管理方式的理论，关于支持农村改革和引导农民致富的理论，均导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三）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东方社会理论

当前国内学术界有人发表论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东方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

理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下面发表商榷意见：

有的学者在论文中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写道：“支持马克思这个‘设想’的政治理论框架，是他们一贯持有的世界革命论，而不是什么‘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懂得俄文，“因而愿意在世界革命的理论架构内接纳这个设想并把它设定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一个‘副产品’，全部问题的核心，仍在于他们一如既往地追求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①意思是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西方社会主义胜利的背景下俄国才能走上“跨越”的道路，所以关于俄国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世界革命理论之中的内容，不能认为他们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

这样的看法难以成立。固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走新式道路思想或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同他们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有联系，甚至可以说它受到世界革命理论框架的“支持”，但不能说它不是理论。因为被某个理论“支持”的另一个理论也是理论。例如：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体系的“支持”，不能认为前者不是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支持”，不能认为前者不是理论。况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不仅仅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容。如本文前面所述，它的内容包括俄国农民的地位和状况，东方专制制度及基础，“农村公社”的命运，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及其影响等等。它从俄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可能的发展途径、发展的条件和契机等方面阐述了当前的俄国和俄国的发展。由此看，更不能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

有学者在论文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只是“思想酝酿”，不是“正式主张”，因为马克思只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提到这个问题，在正式复信中却没有表达，这表明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尚在“酝酿之中”。“酝酿之中”的认识不能算作正式主张，不能算作理论，所以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跨越

^① 参见张光明：《关于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真相》，《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或者说东方社会理论^①。

需要指出的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东方社会理论的过程看，不能认为它只是“思想酝酿”或者说处在“酝酿之中”，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反复论述了这样的思想。

恩格斯 1875 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在论及俄国的“农村公社”正在趋于解体时指出：“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态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②意思是说，只要“农村公社”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不排除它发展成为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马克思 1877 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表达了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思想。俄国的某个资产阶级学者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理论说成为普遍规律，认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要走这样的道路，以此来论证俄国必须走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③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将西欧道路看成为普遍规律，不同意关于俄国一定会走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如前所述，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5 次论及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而且复信初稿和正式的复信精神是一致的。上文已经论及，复信中表达了一种思想：如果能够排除对“农村公社”的破坏性影响，使它具备正常发展的条件，那么这种公社就能够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再如前所述，恩格斯 1894 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仍然指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可以以西方社会主义国家为榜样，结合自己的优势，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俄国及东方其他国家可能走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即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一贯的思想，怎么可以说它只是一种“思想酝酿”或处于“酝酿之中”而非正式的主张呢？

^① 参见张明军：《对“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疑》，《甘肃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2 页。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未来发展途径时，指明了两个情况：一方面指明“农村公社”正趋于解体，俄国正在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指明不排除俄国存在着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这能不能够证明他们的思想处于“酝酿之中”或者说成熟呢？能不能证明他们没有东方社会理论呢？不能！！因为人们在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时，总是作两种、三种甚至多种考虑。不能认为作一种考虑的是成熟的思想，作两种、三种或多种考虑的是不成熟的思想。在人们就某事物的发展前途所作的两种或多种预见中，如果有一种预见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则说明它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考或预见正是这样的理论。所以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的认识和思想处于“酝酿之中”，是不成熟的思想，不能认为他们没有东方社会理论。至于这个理论被后来的历史证实的情况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历史上许多理论家的理论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人们不是还称它为某某理论吗？如普鲁东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理论等等。

二、恩格斯晚年对东方发展的科学预见

恩格斯晚年非常关心俄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发展，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著作中，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科学的预见了一些国家未来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一）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陷入“无出路状态”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标志着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后，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迅速的发展。到90年代初，恩格斯看到，俄国已经越来越成为西欧式国家，在农奴制的基础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同时，恩格斯研究和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预见到它将很快陷入无出路状态，并且有可能中断其发展过程。

恩格斯看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市场狭窄。他在1892年9月22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

一问题及其后果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他看来，俄国资本主义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在欧洲而言），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没有国际市场，而且就国内市场而言，其前景也是黯淡的。他说：“当俄国的工业还局限于国内市场时，它的产品只能用于满足国内的消费。而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的增长，而且据我看，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还可能下降。”^①他认为，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俄国农民的购买力极低，二是因为俄国的大批无产者及刚刚由于破产而进入无产者队伍的群众，没有稳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无购买力可言。这就是他所指出的：“农民在遭受破产；他们的购买力降到最低点，而他们作为无产者在还没有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以前，对新出现的工业企业来说，将是极为匮乏的市场。”^②

恩格斯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市场状况的同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资本主义在建立国内市场时，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市场，使自己陷于“无出路状态”之中。他指出：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③

恩格斯看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二，是极其剧烈的社会动荡。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它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几个世纪走完的路程。因此，它的发展造成了极其剧烈的社会动荡。恩格斯发现和研究了这一事实，说：“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④在他看来，这种动荡的一种表现，是俄国农民遭受着极其猛烈的打击。在西欧，特别是法国，个体农民经济生存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是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经济的打击下逐步走向破产的。俄国农民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个体经济从形成之日起就遭受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猛烈打击。恩格斯说：如果说法国农民曾遭受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725页。

业的排挤和打击的话，“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末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①“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它脚下的土地挖掉。”^②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动荡的另一种表现，是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受到严重的破坏。他在1892年3月和6月致尼·弗·丹尼尔逊的几封信中，分析了俄国出现的无林化和地力耗损的问题，认为俄国出现的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地力耗损、无林化等等，比其他国家更为厉害，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带来的后果。恩格斯认为，俄国社会动荡最深刻的表现，就是饥荒的出现。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出现了饥荒。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危机。”^③“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这场社会革命的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④可见，他认为饥荒和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结果。恩格斯相信，俄国的危机一旦加深，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取它的唯一销售市场——国内市场。”^⑤

恩格斯看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三，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即将爆发的革命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怎样，即他们是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能不能在革命胜利后掌握政权，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极大。可是事实上，俄国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未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是在沙皇制度的卵翼下发展起来的，“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仰仗国家；保护关税、津贴、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认可和庇护下对工人进行最残酷的剥削。要指望这个资产阶级……触犯沙皇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⑥另一方面，恩格斯对于俄国成长壮大中的无产阶级给予了很高的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价。1894年年末，他在与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一次谈话中，在谈到俄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说，在德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这是德国的幸运，“俄国也面临这种幸运”。^①他的意思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显然，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必然使革命朝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当时，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的信中说，希望“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在沙皇制度的废墟上胜利地升起自己的旗帜”。^②他这里的“社会革命运动”，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希望在沙皇制度的废墟上举起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旗帜，就是希望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

综上所述，在恩格斯看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是极为不利的。从经济环境上看，它的问题一是市场狭窄，二是造成的社会动荡大，因此它比别国的资本主义更容易陷入“无出路状态”，甚至会中断自己的发展过程。从政治环境上看，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会突破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使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从而结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总之，恩格斯为俄国资本主义描绘的前景，是一幅走投无路的、濒临死亡的图景。历史证明，恩格斯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和科学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中断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这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陷入“无出路状态”的结果。不仅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东方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直接或间接的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东方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同俄国的情况一样，也是起步晚，面临着市场狭窄、社会动荡、资产阶级失去了革命的领导权等等问题（问题比俄国更甚）。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陷入“无出路状态”或者中断了发展过程，可以从恩格斯晚年的思想里找到答案。

（二）东西方革命“互相补充”和东方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民粹派指出，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条件地肯定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俄国立即爆发革命，并且这场革命能够激起西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2页。

的革命，西欧的革命又能够反过来促进俄国的革命，那么俄国就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由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 1882 年他们所指出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到 90 年代，俄国的农村公社已经崩溃或者说正在急剧的崩溃。事实说明，俄国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这时，恩格斯坚持并且进一步地阐述了东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理论和设想。

恩格斯认为，就当时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经济条件而言，它们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在他看来，这些国家尚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上产生的任务。由此他说：“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②

然而恩格斯指出，如果西方国家先于东方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从而为东方树立了榜样并且向东方提供了支持，东方国家就可以“大大缩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且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写道：“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③即是说适用于东方其他的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2—44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3 页。

综上所述，在恩格斯看来，东方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或者说先决条件，是西方先于东方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从而为东方树立榜样和提供支持，那么东方能不能获得这个前提和条件呢？恩格斯的看法是肯定的。

恩格斯预见到，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将爆发。在俄国，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特别是造成了对农民的打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束缚，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和十分尖锐，一场猛烈的革命爆发在即。1875年，恩格斯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① 1885年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② 1895年，恩格斯继续认为：“如果说革命的魔鬼已抓住了什么人的衣领的话，那就是尼古拉二世。”^③ 他认为，即将爆发的革命一定会推翻沙皇的统治。

恩格斯肯定地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将激起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促使其取得胜利。19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多次对外发动反革命战争，干涉和镇压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恩格斯认为，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近旁还有俄罗斯帝国，就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更是这样。一旦俄国革命爆发，将对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增强西方无产阶级胜利的信心，推动西方革命的发生。基于这一点，恩格斯1890年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指出：“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的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④ 这里，他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以及沙皇政权的垮台，将加速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恩格斯断言，在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俄国也能够实现其社会主义改造即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他在论及由于西方社会主义的榜样和支持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4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57页。

方国家可以缩短资本主义的过程时，明确地写道：“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精神，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①显然，所谓“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即指俄国可以同西方同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结论，导源于他关于西方革命反过来促进俄国革命的思想，即西方社会主义为东方树立榜样并提供支持的思想。

可以看出，恩格斯为未来的革命规划的路线和步骤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他看来，上述革命过程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个过程，或者说以上各个步骤之间是依次递进的、没有间隔的关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恩格斯的思想中，第三个步骤的实现，依赖于第一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的进行。换言之，在恩格斯看来，东方缩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并实现社会主义，依赖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依赖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反过来促进东方的革命。

历史证明，上述恩格斯的预见具有科学性。其一，关于俄国革命会激起西方革命的预见是科学的。1917年，俄国先后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两场革命给西方以巨大的影响，推动了西欧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发展。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德国于1918年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匈牙利于1919年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工人罢工斗争也掀起了高潮。虽然这些国家的革命斗争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取得最后胜利，但它的发生足以证明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会激起西方革命的预见是科学的。

其二，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东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证明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前提和条件的思想具有科学性。如上所述，恩格斯认为，东方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和条件是西方先于东方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西方社会主义国家为东方人民树立榜样和提供支持。可是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东方社会主义没有得到这样的前提和条件。由于没有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东方的社会主义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曲折。这些曲折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即发展指标太高，速度太快，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群众的生活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件得不到改善。另一方面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如苏联 30 年代发生的肃反运动和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等等。还表现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东欧和苏联的剧变，即这些国家的发展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试想，如果像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西方先于东方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那么东方的社会主义一是有很好的国际环境，可以免除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和平演变的危险，二是由于有社会主义的榜样和现成的经验，可以减少经济政治建设实践中的许多弯路。在经历了许多曲折之后，反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前提和条件的思想，不能不感到它的科学性。当然，在进行了这种反思之后，不应该因为东方不具备恩格斯所设想的那些前提和条件而灰心和消极。进行这种反思的目的，不在于强调东方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更不在于论证东方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合理性，而在于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条件不足表现在哪些方面，东方的优势和长处是什么，以便于在实践中更具有自觉性，扬长避短，克服不足，创造性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革命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思想

恩格斯晚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即未来的世界社会革命将由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发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推动西欧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同时俄国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也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一）19 世纪 70—80 年代恩格斯的思想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恩格斯看到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正日益成熟，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将爆发。1875 年，恩格斯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① 1885 年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28 页。

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① 1895年，恩格斯继续认为：“如果说革命的魔鬼已抓住了什么人的衣领的话，那就是尼古拉二世。”^②

在恩格斯看来，俄国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要比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先发生。当时，英国工人运动受着改良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法国工人运动由于巴黎公社革命失败而一度处于低潮，德国工人运动则因为统治阶级实行“非常法”而陷于非常艰难的处境。到19世纪80—90年代，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逐渐走向了高潮，但是相比之下，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势比这些国家的革命形势更为成熟。恩格斯看到这一点，并认为这是由于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比其他国家的情况更为复杂和尖锐，由于俄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群众已汇集成为声势浩大的反封建革命大军。如他在谈论欧洲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时曾指出：“整个欧洲都沸腾了，危机到处趋于成熟，特别是俄国。那里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③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最近的将来在彼得堡所要做出的事情，整个欧洲一切有思想、有远见和有观察力的人们的眼光现在都集中到了彼得堡。”^④ 恩格斯认为，尽管俄国爆发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是它的胜利将推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19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多次对外发动反革命战争，干涉和镇压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恩格斯和马克思称之为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和“巨大的后备军”。恩格斯说过：“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现代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⑤ 他认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更是这样，因为沙俄反动军队的矛头针对着西欧各国无产阶级，而首先针对着德国无产阶级。他说：德国同俄国是近邻，“因此俄国反动军队的第一个冲击便会落到德国身上。因而，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⑥ 一旦俄国革命爆发和沙皇俄国灭亡，情况就会发生有利于西欧无产阶级的变化。恩格斯认为，这时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4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2页。

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①同时，恩格斯认为，沙皇俄国的灭亡，也是对欧洲各国反动政府的打击。他说，一旦俄国“这个主要堡垒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陷于惊慌失措，这种局面的出现将有利于各国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②。总之，在恩格斯看来，对于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胜利来说，俄国革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他所说的：俄国革命“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③

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认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会反过来促进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俄国将随着西欧社会主义胜利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在19世纪70—80年代，恩格斯曾认为，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促进下，俄国将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与西欧国家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俄国的民粹派提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与民粹派的观点有原则性分歧，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地否定民粹派提出的这一问题，而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种设想是能够成为现实的。这种条件就是俄国立即爆发革命，从而推动西欧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同时西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俄国树立榜样和提供支持。1882年，他们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④以后，恩格斯曾对这一思想作过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他说：“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

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①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② 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同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完成”，完成的时间就在即将到来的“革命时期”之中。

（二）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的思想

到了90年代，恩格斯则认为，在即将到来的革命过程中，俄国将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革命没有在70—80年代发生，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80年代，俄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并引起了90年代的工业高涨。这时，恩格斯通过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产生了这样一些看法：

第一，俄国正日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在90年代初写成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恩格斯指出：农奴制改革以来，“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③ 几年后，恩格斯又指出，旧的俄国已经进入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④ 他考察了俄国的工人失业、个体生产者破产等事实，认为看不出俄国工业革命的结果“同英国、德国、美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情况有什么区别”^⑤。从这些事实出发，恩格斯得出结论：俄国由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机会正在消失，以后的俄国将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成熟，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担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恩格斯一向对俄国资产阶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沙皇制度在各主要城市的新支柱”，认为要指望这个阶级反对沙皇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⑥ 他关注着俄国无产阶级的成长。1883年，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成立时，恩格斯认为“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9—30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①，认为它表明俄国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②。到了90年代，俄国的无产阶级进一步成熟了，恩格斯预见到他们不久将担负起领导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职责。1894年末，他在与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一次谈话中，在谈到俄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担落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肩上，这是德国的“幸运”；“俄国也面临这种幸运”，“在俄国，工人阶级在读书，在觉醒，因而将自觉地参加政治解放运动。”^③

第三，俄国资本主义将很快地陷于“无出路状态”。在1892年9月22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由于它的发展起步较晚（在欧洲而言），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没有国外市场”；而且就国内市场而言，“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地增长，……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还很可能下降。”^④与此同时，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资本主义在建立国内市场时，摧垮了个体生产者，削弱了社会购买力，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市场，使自己陷于“无出路状态”之中。他认为，英国等西欧国家正在陷入“无出路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⑤这种“无出路状态”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到来。据此，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⑥

第四，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引起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俄国资本主义的灭亡。恩格斯是把俄国资本主义同西欧资本主义作为一整个体系来看待的。1894年，他写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的死亡，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已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⑦这就是说，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可能使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向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1页。

会主义革命转变，从而使俄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和给友人的信件中，这一思想是非常明显的。俄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俄国国内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改变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①。所谓“谁也不能预测”，无非是指革命的进程有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而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同时，他在致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信中，表示希望“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在沙皇制度的废墟上胜利地升起自己的旗帜”^②。这里的“社会革命运动”即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综上所述，恩格斯是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整个过程来看待的。这一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一环节之后，将有西欧、俄国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恩格斯是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来看待的，如他所说：在欧洲战云密布的形势下，“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相反，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的党在德国就会遭到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命运。”^③ 由于恩格斯是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整个过程来看待的，由于他认识到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未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他说，“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倡权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④；“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⑤。

20 世纪初，恩格斯所期望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爆发了。尽管革命的发展进程与恩格斯的预想不完全一致，但恩格斯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却是为历史所证实了的。历史证明，恩格斯关于俄国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发生革命的观点是正确的。20 世纪初，俄国成了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存在着人民群众同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农民同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等等。这样，在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0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8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6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4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6 页。

生革命的形势下。俄国连续爆发了两次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历史证明，恩格斯关于俄国将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缩短资本主义的行程、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俄国无产阶级适时地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样，上述恩格斯的预见就变成了现实。与恩格斯的预见所不同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胜利不是在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榜样的鼓舞下取得的。这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进一步成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又因为以后西欧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走上了修正主义的歧途。这些是恩格斯不曾预见的，也是后人不应该苛求于他的。

（三）对理论界现成观点的评论

理论界比较重视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论著和论文。在恩格斯论俄国革命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然而，人们对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思想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表现之一在于人们在论述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意义的观点时，没有从俄国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样的高度来理解恩格斯的思想。如：有的论著和论文在论及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革命的重要意义的观点时，将恩格斯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概括：俄国革命的胜利将使世界战争的危险消失，将促进西欧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①。如果仅就俄国革命对西欧革命的意义而言，这样来理解恩格斯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述是正确的。但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它没有站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样的高度之上来理解恩格斯的思想。根据恩格斯的思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将促进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更主要地在于它将推动俄国、西欧等都实现社会主义，即它是全欧洲、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开端”。恩格斯之所以这样看问题，在于他坚信俄国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将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只有肯定恩格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0页；《恩格斯晚年论反对沙俄霸权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斯关于俄国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同他关于俄国首先发动革命的观点和俄国革命推动西欧革命胜利的观点联结为一个整体，才有可能站在应有的高度之上，揭示出恩格斯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的思想。

其表现之二在于人们在论述恩格斯晚年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观点时，忽视了他关于俄国革命对西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观点。如有的论著指出：恩格斯晚年探讨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探讨了俄国等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认为在西欧社会主义胜利的榜样鼓舞下和支援下，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俄国可以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即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①。显然，这里只是仅仅说明了恩格斯关于西欧社会主义胜利对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的观点。诚然，如同本文前面所叙述过的，恩格斯确有过这样的观点。如果就这一观点本身而论，这样的阐述是无可非议的。但这样的阐述没有反映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思想，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的思想。根据恩格斯的思想，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俄国革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西欧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同他所说的：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西欧的任何革命都“不能获得彻底胜利”。同时，恩格斯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实现同西欧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在同一革命发展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互相补充”。因此，在理解恩格斯关于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时，也必须把前面所述的恩格斯的一系列观点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既了解到他关于西欧社会主义胜利对俄国革命发展的一定意义的观点，又了解到他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西欧革命发展的决定性意义的观点，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去把握他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思想，从而科学地说明他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观点。否则，对恩格斯观点的理解不可能是全面的。

人们之所以没有对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思想引起重视，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深入地研讨恩格斯关于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长期以来，人们基于最先提出俄国

^① 参见《科学社会主义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观点的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这样的认识，没有对以前恩格斯关于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作深入的研究，未发现和不相信恩格斯有这样的观点。当然更谈不上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同他的其他观点联结在一起，从而揭示出他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思想。

四、《共产党宣言》与科学认识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现在已经 150 多年了。它的基本理论观点，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特别是它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对于人们今天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和认识改革开放，具有直接的、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识与批判，首先运用了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他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当时的生产方式带有“行会经营”的性质，所以他们兼有“行会师傅”的身分。以后，由于美洲的发现和殖民化，以及航海业、商业和工业的高涨，“行会经营”方式被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所代替，“行会师傅”或“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工场手工业主或者说“中间等级”所代替了。由于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工业革命的发生，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由此，《宣言》得出结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①

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当前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启迪。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力。在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改革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因而有的人感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思想陷入了困惑。走出这种困惑的方法，就是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4 页。

地看待资本主义。既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一个历史过程，那末它的发展和灭亡必然是这个过程的延续。换言之，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确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朝以下两个方面看：其一，任何事物在它产生以后，都会有发展和灭亡，因为“发展和灭亡”是它作为一个事物存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节。当然不能把灭亡简单地理解为“死亡”，它可能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质变。所以不能设想，资本主义会永世长存。其二，资本主义在目前仍有一定的生命力，说明它尚未走到自己历史的尽头。在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都有较长的历史过程。封建社会在欧洲有 1000 年的历史，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到目前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可以认为，它目前还比较年轻，尚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但是决不能认为资本主义永远不会灭亡。

《共产党宣言》在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时，运用了辩证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一是指对资本主义“一分为二”，既看到其历史作用，又看到其弊端。它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 例如，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用资本主义社会非常直接、非常明确的关系，代替了封建社会等级的、宗法的、人身依附性的关系。它不断地改变生产工具，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从而使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处于不停的变化中。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封建割据的状态，把以往各自独立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地区，变成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根据这些事实，《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活动“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② 这是对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高度的、形象化的肯定。它还直接地、明确地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 对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它揭露说，资本主义把人与人之间有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资本主义剥削是一种公开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

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它使乡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贸易自由，是一种“没有良心”的活动。

既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又看到其弊端，正是当前人们在改革开放中要掌握的思想方法。在改革过程中，在我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发展。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能够促进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够发展生产，创造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或者说，它能够起到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作用。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正确的认识。同时，也应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消极作用。例如，社会上刮起了“一切向钱看”的歪风，旧中国有过的已经被消灭了的污秽现象也产生了，党组织的建设和国家机关的建设面临着腐败的冲击等等。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这是因为，即使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引进的不一定都是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对于我国发展生产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也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腐朽的、消极的东西，以及同中国的实际不相适应的东西，我们决不能照搬，而必须加以抵制。

所谓辩证的方法，二是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是它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所有的社会形态，都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初，它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它发展到一定的时候，生产关系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就会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共产党宣言》在分析到这个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

鬼了。”^①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② 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起来反对生产关系了。

这一认识方法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众所周知，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够采取干预经济的政策。当经济发展遇到严重的困难时，它们会修正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企业摆脱困难。它们还会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作这样或那样的调整，以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些事实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关系作必要的调整，以缓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调整生产关系呢？这无疑是因为他们那里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不断地发生矛盾，为了避免这种矛盾激化，他们才不得不调整生产关系。

用这一科学方法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发现，它们那里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会走向灭亡不太符合实际的话，那么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它的基本矛盾的思想却是完全科学的。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财富及生产资料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可是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却越来越高。这说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仍然是那里的基本矛盾。当前，这个矛盾之所以没有激化，一是由于以上论及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生产关系作调整，缓和了这个矛盾；二是因为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经济活动的场所扩展到了全世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缓和了国内的基本矛盾。然而，这个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着，运动着，发生着作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情况就不会改变。由于它的作用，资本主义迟早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二）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自始至终贯穿着发展的、变化的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8 页。

点。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共产党宣言》提出，对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要注意到时间和条件的变化，以新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即必须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宣言》的第二章，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如下规定：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等。这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初版里他们提出的措施。到1872年，英法等先进国家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国内生产状况和社会状况很大的改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采取何种措施，需要重新考虑。就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的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① 他们还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② 意思是说，在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过程中和巴黎公社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进行了夺取政权的尝试，积累了夺取政权和组织新生活的经验，应该根据这些经验来考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采取何种措施的问题，不能把思想认识停留在《宣言》有关内容的思想水平上。

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待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在苏俄的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以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推进了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当时，他们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即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发展城市私人工商业企业，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义，发展市场和商业，在国有企业实行经济利益的原则等等。他们采取这些措施，在马克思主义本本里找不到直接的指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或者应不应采取这些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因为过去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没有明确地予以回答。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以及在其他有关著作里，提出了无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即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运用了这种方法。他们从俄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生产力水平低、多年战争破坏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推进了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运用上述方法，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比俄国更为落后。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第一个特点是“底子薄”，即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破坏，中国成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个特点是“人口多”，在目前生产尚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从这样的条件出发，他提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形成，它包括以下重要内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国情；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改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依靠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这些理论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彻底解决的。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地解决了。这样，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有了极大的发展。

第二，《共产党宣言》批判了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及趋向未来的精神实质。在人类历史上，社会

主义理论或思潮的出现，应该是一种进步现象，即社会主义理论或思潮应该崇尚进步，面向未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可是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却有一些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和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败下阵来的封建贵族残余势力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声讨和诅咒资产阶级统治者。但是他们的意图在于使历史后退，复辟封建制度，恢复他们往日的天堂。《宣言》指出：“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①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猛烈地冲击小生产，使小资产阶级生存的条件越来越坏，于是产生了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也是为了使历史后退，以利于恢复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太平盛世。对此，《宣言》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②《宣言》在批判企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思潮的同时，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张进步、主张把世界历史推向前进的精神实质。《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③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走向明天，走向未来。《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要求实现新的生产关系，所以，“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④这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把世界历史推向前进的大趋势的揭示。

《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主张进步、主张发展、主张把历史推向前进的精神实质，在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是因为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体现着黑暗和落后，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不利于中国的富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了新中国，中国的历史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调整和改善了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增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地得到了改善。这些事实，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章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即列宁把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性事物来研究，说明它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特殊性的理论，是列宁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可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很不够，认识很不足，很少见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概 论

(一) 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产生和成熟

较之于西方国家而言，俄罗斯地处世界的东方。列宁走上革命斗争的舞台后，致力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高度关注东方其他国家人民革命运动的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尤其关注俄罗斯的命运，关注东方其他国家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这是列宁东方理论产生的出发点。

1920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前夕，列宁为大会准备了一系列文件，如《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等等。在大会上，列宁作了几个报告，如《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等等。从上述文件和报告的内容看，列宁的东方理论已经产生。

在上述文件和报告中，列宁提出了东方各国苏维埃运动已经打下基础的观点。当时，由于十月革命的推动和影响，由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东方一些国家人民革命斗争的直接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蓬勃高涨。中国1919年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朝鲜同年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三一运动”，印度这一时期则发生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工人罢工运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在这些国家，

革命的先行者正在积极活动，准备建立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俄国人的路”。共产国际二大举行时，中国、朝鲜、印度、伊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东方国家的代表出席大会，向大会报告了本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列宁在大会有关报告中，高度肯定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说：“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①意思是说，通过革命斗争建立人民政权的思想，或者说十月革命的最基本的精神，已经为东方各国人民所了解和接受，这是东方各国苏维埃运动深入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有了这样的条件和基础，东方各国的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进一步发展。当然，列宁认识到，东方国家或者是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这里的苏维埃“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②但是他说，东方国家已经卷进世界历史，卷进了世界革命运动的洪流，非常可喜，应该着眼于世界革命的发展而推进东方各国的苏维埃运动。

在上述文件和报告中，列宁提出了必须使东方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联盟的观点。当时，苏俄正处于国内战争过程中。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造成了苏维埃国家的极大危险。显然，苏俄要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并且持久地巩固这种胜利，必须向国外寻求援助的力量。况且，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和相互援助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胜利。苏俄本可以从西方寻求援助的力量，西方无产阶级也确实以一定的形式援助了苏俄，如他们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反对本国政府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可是西方未发生强大的、有成果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未造成对帝国主义的致命打击。这时，东方各国爆发革命运动，革命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成为打击帝国主义的一支新生力量。由此列宁认识到，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是苏俄可以团结和借助的力量。他说：“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①。这些论断，准确表达了列宁关于东方各国的革命斗争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观点。

在上述文件和报告中，列宁提出了东方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的观点。东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甚至可以说很落后。其中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有的则完全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是否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或者说这些国家由人民掌握政权以后发展前景如何，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列宁的意见是，如果先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东方国家人民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宣传，各苏维埃政府从物质上对东方国家进行大力的援助，东方国家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走向社会主义胜利。这就是他所说的：“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②列宁以这样的思考为出发点，提出了共产国际在东方国家的任务：一是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二是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宣传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以前的条件，帮助建立劳动者苏维埃；三是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③可见，列宁关于东方国家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尽管他强调实现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条件。

在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文件和报告中，列宁提出东方各国苏维埃运动已经打下基础，这是对东方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当前发展水平和以后发展条件的充分肯定。他提出必须使东方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同苏俄结成密切联盟，说明他开始把苏俄和东方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性事物来看待，认识到苏俄和东方其他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则是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也说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23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明他开始把视线转向东方，从东方寻求有利于俄国革命事业发展的援助力量。他提出东方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突破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即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着指明了东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以上各个观点，说明了东方国家发展的条件、意义和前途。这些观点的提出，意味着列宁的东方理论已经产生。

1921年3月，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积极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途径。列宁在这时的实践中认识到，地处东方的比较落后的俄罗斯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办法。如他在党的十大有关报告中说：“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①“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②根据他的思想，苏俄小农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于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小农不会拥护社会主义，从经济条件的角度看，在农民个体经济的基础上难以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必须确认，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应该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东方其他国家也具有小农占人口大多数、农民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国情，所以上述列宁的思想在东方各国具有普遍的意义。列宁的这一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东方理论。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即列宁逝世前夕，在《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就东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这些新观点的提出，意味着东方理论已经成熟。他这时提出的新观点主要是：

关于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符合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观点。当时俄国的孟什维克提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列宁针对此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生产力达到一定的高度，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才能实现由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①在列宁看来，俄国的发展过程就体现出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确实不很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经济前提确实不够好，但是无产阶级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先夺取了政权，此后他们将利用自己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努力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走向社会主义胜利。俄国的这个特殊发展过程，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说，这个特殊性属于东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而且当革命继续向东方转移时，“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②

关于特殊环境决定东方国家的工农群众展开革命和掌握政权的观点。与上述问题相联系，俄国无产阶级要不要进行十月革命和要不要掌握政权，也遭到孟什维克的否定。列宁就此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他认为，十月革命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俄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工人革命发动起来，农民起义也已展开，革命力量已经十倍地增强，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特殊环境下领导人民举行革命并掌握了政权。列宁说，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殊环境，毫无出路的工农群众难道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他还说，马克思 1856 年曾经提出，应该由某种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现在俄国已经出现这种形势，实现了农民战争同工人革命的联合，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能有所作为吗？^③在列宁看来，俄国由于地处东方，具有东方国家发展中的特点，所以才有条件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农民战争同工人革命的联合，才有革命的胜利。上述列宁的观点，既说明了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也说明了东方其他国家革命的必然性。在东方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大多同某种特殊的环境相联系，即世界政治中的某种力量起着促进作用，并且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农民战争同工人革命的联合。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1 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71 页。

关于西方革命被推延下去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观点。在西方国家，19世纪下半叶以来，统治阶级利用从殖民地搜刮来的财富，对内实行“糖饼”政策，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些国家的情况则更是这样。列宁注意到这个事实。他逝世前夕指出：“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引者）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社会和平’的局面。”^①这说明，列宁已经认识到，西方国家未来难以发生革命了。在此以前，包括在十月革命时期、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列宁都寄希望于西方革命的爆发并取得胜利，希望西方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给俄国革命以巨大的援助。现在他说西方未来难以发生革命了，这不能不说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希望何在呢？面临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危险的苏俄能不能坚持到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那一天呢？列宁从东方的事实中求答案。他提出，东方的许多国家如中国、印度等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发展道路，正在按西方资本主义的轨迹前进，同时东方国家已经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动荡，出现了革命运动。他说：“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②他还提出，从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许多国家人民起来革命的事实中，可以预见到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预见到世界社会主义的结局。如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③这说明，列宁已经把世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东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之上了。

列宁逝世前夕所提出的观点，如关于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符合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观点，创造性地说明了东方国家在生产水平比较低和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说明了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及其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页。

政党社会主义战略的正确性。如果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文件和报告中强调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胜利需要一定的条件，即需要取得革命胜利的先进国家帮助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不再强调这种条件了。这是他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和发展。关于特殊环境决定东方国家的工农群众展开革命和掌握政权的观点，深层次地说明了东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和掌握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关于西方革命被推延下去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全新创造，意味着列宁社会主义战略的重大转变，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战略的重大转变，即由西方社会主义战略转变为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综上所述，列宁逝世前夕，他的东方理论已经成熟。

（二）列宁东方理论的主要内容

综合列宁各个时期的有关论断，他的东方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观点。历史事实说明，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难以发生革命，而东方国家则比较容易发生革命。俄国1905年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又连续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十几年后接连发生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朝鲜、越南等国也不断发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1918年1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指西方国家——引者）”“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① 意思说，俄国比西方国家容易开始革命。1922年5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印度和中国在沸腾。这有7亿多人。再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那里的1905年即将到来，而且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愈来愈快地到来”^②。这说明，列宁确认，东方其他的国家也比较容易发生革命。如前所述，他逝世前夕提出，特殊的环境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俄国的矛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如果采取了这些过渡措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能的和绝对必要的了。”^① 这里，列宁强调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先决条件，即必须采取上述本身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逐步创造物质基础。况且这一时期列宁把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同西欧各国实现社会主义看成为相互连结的同一个过程，即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将在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帮助下实现，可是他毕竟提出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921年3月，苏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这意味着苏俄人民在经历许多曲折以后终于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他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革命形势逐渐走向低潮，列宁开始放弃苏俄在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帮助下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那么以上论断意味着他有力地肯定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如前所述，列宁逝世前夕提出，俄国虽然生产力水平不很高，经济条件不够好，但是无产阶级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条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这是俄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发展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当革命发展到东方其他国家时那里会有更多的特殊性。这意味着列宁关于东方国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达到圆满的境界。

第四，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只有在它的故乡，即它的发展达到繁荣昌盛的地方，才会走向灭亡。这样的话，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高，资本主义将先在这里灭亡，或者说这里将先结束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东方国家或者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起步晚，发展水平低，或者尚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上，这样一是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条件，二是人民不能够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进而看到社会主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可能产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和要求。与马克思、恩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格斯同时代的革命家，均持这种观点。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持这种观点。1920年底，苏俄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这时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地处东方的苏俄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成为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列宁产生了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这年11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阐述了这一新的观点。他说：“只要总的看一下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得到了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①“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②显然，他所谓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和“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和机会。在他看来，在西方国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先于它们取得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和机会。他还说，为了战胜资本主义，一是要用革命力量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新政权，二是要“担负起建设任务，先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情的榜样。”“现在我们应当采用组织、建设的办法，来代替用革命方式推翻剥削者和抗击暴力者的办法，我们应当向全世界显示和证明，我们不仅是一种能够抵抗军事扼杀的力量，而且是一种能够树立榜样的力量。”^③在这里，列宁提出“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显然是指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他说俄国无产阶级应当向全世界“树立榜样”，显然是指俄国无产阶级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树立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同年12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电气化及其教育问题时说：“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点，如果俄国布满了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④这一论断，也包含俄国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联系列宁逝世前夕关于东方其他国家未来的革命会有更多特殊性的论断，以及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希望在于俄国、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人民革命发展的论断，可以确认，他关于俄国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适用于说明东方其他国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五，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的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主张在全国各个生产领域采取“计算和监督”措施，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对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制约资本家的活动。这个措施由于不要求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无疑属于渐进发展的措施。1918年春，党和苏维埃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经济上。这时列宁主张苏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形式有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有国家政权对买卖粮食工作的管理和垄断，有国家政权对资产者合作社的干预等等。所有这些形式，都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其运作的前提，即不要求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这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主要的不是指这种或那种管理形式，而是指一种原则，即国家政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苏维埃国家经济的原则。显然，列宁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体现了经济建设中的渐进发展。1921年10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1917年底1918年初的措施时说：“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①还说：1917年国家关于垄断广告的法令“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②这是列宁对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观点的明确阐述。1921年3月开始的新经济政策，主张利用小农经济的作用、私人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自由贸易、市场和货币的作用，恢复和发展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无疑也体现了经济建设中的渐进发展。列宁当时说：“目前的新事物（指新经济政策——引者），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③如前所述，列宁在论及俄国必须采取这些特殊办法时说，这是由俄国小农占人口大多数和小农经济在国民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经济中占优势的情况决定的。由于东方其他国家均具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列宁关于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的观点，对东方其他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六，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的观点。由十月革命开始的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列宁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道：“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开始统治的时代。”^① 鉴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国内外敌人猖狂地颠覆它，但是它们的破坏活动先后都已失败，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苏俄无产阶级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任何敌人也剥夺不去的。对于东方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列宁也予以高度的赞扬。他在共产国际三大有关报告中指出，在未来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东方国家的人民将把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②。他在《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一文中还写道：在拥有 10 亿多人口的东方国家，“革命已经开始，并且发展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了。”^③ 可是，列宁深深地懂得，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会有许多曲折。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权采取许多非常措施，损害了工农群众特别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以至战争结束后不得不以新经济政策来纠正以往的错误，这就是苏维埃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曲折。列宁曾在许多场合明确地指出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一种战略退却，即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过去的进攻中走得太远，离开了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后退，回到自己应该坚持的基地上。可是，他在发生曲折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如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说：“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④ 这一论断，科学地说明了曲折与前进的关系。他还说，虽然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出现了曲折，然而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⑤ 这一著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7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96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5 页。

名的论断，反映了他对待曲折的正确态度。多少年来，这一论断是指导人们正确地对待曲折和动员人们继续向前进的不朽的战斗口号。

（三）列宁东方理论的精髓

列宁东方理论的精髓，是列宁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观点。之所以说这个观点是列宁东方理论的精髓，在于列宁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观点，体现于列宁对俄国革命与经济建设进程的认识上，体现于列宁对俄国未来发展的预见上，还体现于列宁对东方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认识和预见上。

第一，列宁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时，苏俄同帝国主义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希望俄国继续进行战争，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摧毁和推翻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出发，苏俄同德国之间进行谈判，希望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可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德国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如被德军占领的俄国领土必须割让给德国，俄国必须向德国缴付巨额战争赔款。接受这些条件，意味着苏俄遭受到掠夺和屈辱，意味着革命过程中的曲折。列宁和党为了赢得和平喘息时机，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接受了这些条件，同德国之间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也就是说，他们正视了革命过程中的曲折。当时，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就此指出：“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常常会在实际上滚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①

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6页。

再次论述了俄国革命的曲折过程。他指出，1905—1907年，是俄国的革命年代。在这个年代，一切阶级都公开地登上了政治舞台，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武装起义，可是革命走向了失败。1907—1910年，是俄国的反动年代。由于革命失败，消沉、颓废、分裂、涣散、叛变代替了政治和革命。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大有教益的一课，即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使革命政党由此懂得了不仅要学会有力地进攻，而且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1910—1914年，是革命缓慢走向高潮的年代。1914—1917年，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年代。1917年2—10月，是俄国第二次革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革命政党利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条件，进行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准备工作，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他以上述事实证明，俄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他在此书中还写道：“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①这一论断，既是对俄国革命道路曲折性的肯定，也是对俄国革命者认识这个真理的艰难性的说明。他还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使俄国以外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家认识这个真理，“不至于象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②

第二，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的国内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环境和支持战争的需要，国家政权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如强制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对消费品的分配实行供给制等等。这种政策对于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特别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所以，随着战争的结束，从1921年春，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主要是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发展城市私人资本主义，鼓励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商业的原则管理国有企业。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直接进攻的话，那么新经济政策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主义关系上的战略退却。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体现了苏俄恢复和发展国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民经济的过程在曲折中前进。当时列宁肯定地论述了这一点。1921年10月，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道：战时共产主义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以便学会改正这些错误。”^①“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②

同一时期，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用日俄战争时期的一个战例生动地说明了事物曲折前进的意义。1900年，沙俄军队占领中国的旅顺口。1904年发生日俄战争，日本力图从沙俄手中夺取旅顺口，于是派军队对旅顺口发起了进攻。日军攻克旅顺口的战役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采取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第二阶段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围攻，结果攻占了旅顺口。列宁通过分析上述战例，针对苏俄的现实说：“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改为‘围攻’。”^③他还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④显然，在列宁的思想上，由“强攻”转为“围攻”，是事物发展中的曲折和转折，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事物的曲折前进。

第三，从列宁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章看，他对苏维埃俄国以后发展的曲折性有科学的预见。192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度过了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欧洲革命风暴，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在这些国家，短时间内难以发生重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俄国作为单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226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7页。

的国家，被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处境十分艰难。解除了革命威胁的帝国主义国家，会不会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换言之它们会不会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存在下去，是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不思考和警觉的问题。列宁逝世前夕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提出：“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①“我们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现在能不能指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象过去那样，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呢？”^②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他预见到帝国主义国家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预见到苏俄的进程中潜伏着重大的危险。他针对这样的危险提出，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应该是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政权，保持无产阶级在农民中间的威望和对农民的领导，尽快地提高苏俄的文明程度。同时他认识到，苏俄虽然具备了提高文明程度的政治前提，但是由于物质条件差，完成这个任务将十分困难。这说明，他预见到苏俄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会有曲折，这个曲折将由苏俄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引起。

从列宁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章看，他对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性问题十分忧虑，预感到在他逝世以后党的组织建设将出现重大的曲折。列宁在世时，俄共（布）执政的时间不长，党内的许多制度特别是防止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分裂的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可是由于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及凝聚力，党中央能够保持团结和稳定性。他逝世以后，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性能否保持下去，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列宁逝世前夕，为此而感到忧虑。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党的一位领导人脾气粗暴，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另一位领导人虽然是党内最能干的人，但是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党中央的分裂。这就是他所说的：“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

是会突然来临的。”^① 他提出，防止这种分裂的办法是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使中央领导集体的人数较多，自身的力量较强，以强有力的集体的力量克服少数人的不正常关系所造成的分裂危险。他说：“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② 他一再强调分裂的危险，说明他预感到在他逝世以后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设将会有重大的曲折。虽然列宁提出了防止分裂和保持稳定性的办法，即增加党中央委员的人数，但是这只是他逝世前夕的一种建议。这种建议能不能变成事实，则是他无能为力的。而且他对这个建议也没有说深透，没有抓住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建立党的科学的集体领导的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增加党中央委员的人数。这说明，列宁当时并没有找到保持党中央团结和稳定性的办法，盲目性较大。由此看，他不能不意识到他逝世以后党的建设的严重曲折性，不能不为此而忧虑。

列宁逝世前夕预感到，以后苏俄国家机关的改革与建设会有许多曲折。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关，通过它组织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可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这一段时间，由于国内战争的干扰，也由于实践的过程不长，苏维埃国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建立新国家机关的问题。这即是说，虽然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但是从国家机关的状况和运作特点看，它仍然是“旧机关”。这主要表现为当时的国家机关臃肿庞大，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不利于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深刻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说：“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③ 还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他方面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① 他主张根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当时他提出了两项划时代的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改造“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②。他虽然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任务和原则，但是他看到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困难。这种困难一是在于文化因素的制约。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不能通过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手段，或者说，以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手段不能消除官僚主义现象，只能靠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特别是提高管理者的文化素质。可是列宁认识到，由于俄国整体的文化水平低，物质条件差，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将十分困难。另一个困难则来自一些人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和害怕机关改革的心理。列宁说，在苏俄，在变革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是，在机关工作和机关改革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③ 由于列宁看到苏俄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十分困难，看到一些人因循守旧的习气和害怕机关改革的心理，所以他意识到以后苏俄的机关改革与建设会有许多曲折。

第四，列宁预见到东方其他国家以后的社会主义进程中会有曲折。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提出，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已经被东方各国家人民所了解，东方各国已经奠定了苏维埃运动的基础，必须通过努力在东方各国建立苏维埃。可是，东方落后国家由于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或者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它建立的苏维埃只能是农民苏维埃，这些落后国家不能立即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可是列宁认为，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帮助东方落后国家，只要取得革命胜利的先进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提供帮助，东方落后国家就能突破它目前的发展阶段，即由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或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他郑重提出：“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④ 且不说列宁这时关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先进国家对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页。

④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东方落后国家进行帮助的想法不符合后来的实际，仅就他所说的东方国家通过什么手段达到目的现在尚不知道、有待于实际经验给人们启示而言，说明他估计到东方国家以后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会有反复的探索和试验。也就是说，在列宁的思想上，东方国家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一个曲曲折折、不断探索的过程。1923年，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论及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曲折性时说，拿破仑有一句名言：“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进行某一场战斗时，不能畏首畏尾，要大胆地投入战斗，如果有大胆战斗的精神，就会有胜利的结局。列宁说，俄国无产阶级正是根据这种精神进行十月革命，所以才有革命的胜利，尽管以后出现了许多曲折，如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实行新经济政策等等。接着他说：如果说这是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①显然，这个论断的意思包括：如果说俄国革命由于它的特殊性而必然会有这样或那样一些曲折的话，那么东方其他国家以后的革命会有更多的特殊性和曲折性。他还说，过去考茨基编写了一些革命的教科书，这在当时是有益的，但是现在的革命不是按照考茨基教科书的规定进行的，如果现在有人希望按照考茨基教科书的规定进行革命，那末这种人是十足的傻瓜。意思也是说，当前和今后东方国家的革命将具有许多特殊性和曲折性，决非革命的教科书所能说明。

第五，列宁对孙中山思想缺陷的批评，折射出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思想。列宁健在时，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尚未走向高潮，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直接评论不多。但是，列宁对孙中山思想缺陷的批评，折射出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思想。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有关著作如《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等中，提出了某些类似俄国民粹主义的主张。例如，19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会有大规模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俄国依靠农民的力量，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而走向社会主义。民粹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主义者的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和空想的。由于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俄国只能以资本主义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孙中山在自己的著作中则提出，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地租和地价不高，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租和地价会猛长，由此将会出现大垄断资本家。如果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垄断资本则无从产生，中国则容易走向社会主义。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其内容一是对私人资本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进行工厂立法，加强对它的管理和制约。二是把一部分规模巨大的、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收归国有。在他看来，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显然，孙中山关于防止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同民粹主义者关于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列宁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有关文章中说，孙中山虽然不了解俄国，不了解俄国的民粹主义，但是，“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①“在这位中国的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②列宁还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到欧美留学或者展开政治活动，受到了欧美先进思想的影响。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即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③也就是说，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是由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而产生的主观的东西。对于这种社会主义，列宁批评说：“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④列宁就孙中山的思想缺陷所阐述的思想，关系到经济和生产水平低下的中国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根据列宁的思想，在落后的中国，只有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走向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0页。

主义社会，如果不顾客观条件怎样主观地搞社会主义，必然造成革命的失败，造成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列宁东方理论中关于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和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是主张东方落后国家可以马上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认为东方国家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创造社会主义的条件，如同苏俄新经济政策一样）。如果像孙中山这样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尚存在着防止和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中国的发展进程不能不出现曲折。这就是上述列宁思想折射出来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思想。

综上所述，列宁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苏维埃俄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他对苏维埃俄国以后发展的曲折性有科学的预见，预见到东方其他国家以后的社会主义进程中会有曲折，并且他对孙中山思想缺陷的批评折射出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思想。由于列宁关于曲折前进的思想贯穿于他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发展各个问题的认识上，所以说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观点是列宁东方理论的精髓。

值得指出的是，不能因为列宁在东方社会主义发展的许多问题上论述了曲折前进的思想，得出列宁东方理论只看到曲折的结论。因为曲折前进的思想归根到底是关于前进的思想。从事实上看，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报告中说：“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① 1922年5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现在，大多数居民已经觉醒，……而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现在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② 同年12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而世界史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③ 1923年3月，他还提出：“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④ 他的这些论断，都是对东方革命和东方社会主义前进趋势的肯定。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

(四) 列宁东方理论的历史地位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①，那么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这样看问题的根据是：

第一，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主题是东方社会主义问题。笔者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特别是他们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也就是说，东方社会主义问题或者说东方向社会主义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主题。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虽然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但是它的主题或者说主要内容尚不是东方社会主义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一是对俄国农民状况的分析，认为俄国农民在废除农奴制后名义上获得了“解放”，实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对俄国专制制度的研究，认为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独立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地主和贵族是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他们占据国家政权的各个职务，分享专制制度的权利，支持沙皇的统治；这种专制制度是由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和他们彼此间完全隔绝的状态造成的。三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前景的揭示，认为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公社”面临着瓦解的危险，俄国不可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四是提出不排除俄国走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新式道路的可能性，认为如果国家和社会对“农村公社”予以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财力上的支持和帮助，并且通过俄国民主革命改变“农村公社”所面临的非常不利的环境，俄国就有可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上述四点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主题或者说主要的内容是对俄国现实状况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状况、政治制度的状况以及“农村公社”的存在状况的研究和阐述。虽然它研究和提出了俄国以新式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反映此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同反映俄国现实状况的观点的文献资料相比，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就这个问题表达的观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有关内容。

点，具有不确定的特点，即他们一方面认为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俄国不可能走新式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提出不排除俄国有通过“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种不确定性固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它削弱了他们的东方社会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和特质。由此说，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主题或者说主要内容尚不是东方社会主义问题。

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相比较，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主题则是东方社会主义问题。如前所述，列宁在论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他在论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或者什么抽象的图景，人们将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只要敢于面对并努力完成当前的任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他在论述俄国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说，俄国无产阶级应当建立新经济关系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要在世界上树立榜样，即树立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由此看，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主题是东方社会主义问题。

第二，列宁东方社会理论将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一系列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作研究和反映，高度地评价了这些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他们的东方社会理论重在研究和反映俄国问题，而对东方其他国家如中国、印度等的研究和反映则很不够。特别是由于当时中国、印度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尚没有形成和发展起来，他们的文献对此内容更少涉及，对中国、印度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评价极低。如恩格斯 1882 年 9 月 12 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提出，西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引导印度等东方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并且引导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他所说的：“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的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①在这里，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是需要西方国家引导的对象，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被动地跟着西方走的力量。再如，恩格斯 1894 年 11 月 10 日在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写道，中日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改变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9 页。

这样中国旧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将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这样就会造成欧洲人的生存环境的压力，造成欧洲极端尖锐的形势^①。在这里，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将是流浪于欧洲；如果说他们有一定的作用的话，那在于他们的生存竞争会激化欧洲的矛盾和形势。

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相比较，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和反映了俄国、中国、印度等一系列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并且将其有机地联系起来，视为同一个政治力量体系进行研究和反映，高度地评价了它们的作用。由于十月革命的推动和影响，由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东方一些国家人民革命斗争的直接支持，东方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蓬勃高涨。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报告中，高度肯定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说：“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②在上述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提出了必须使东方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联盟的观点。他说：“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③。1922年底1923年初，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俄国发展的特殊性表现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很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经济前提不够好，但是无产阶级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先夺取了政权，此后他们将利用自己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努力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走向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性在东方其他国家也会体现出来，而且当革命继续向东方转移时，“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④同一时间，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提出，东方的许多国家如中国、印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

度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发展道路，正在按西方资本主义的轨迹前进，同时东方国家已经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动荡，出现了革命运动。由此他说：“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①他还提出，从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许多国家人民起来革命的事实中，可以预见到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预见到世界社会主义的结局。这就是他所说的：“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②在上述场合，列宁将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视为同一种政治力量体系，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指出的是，他提出东方各国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东方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俄国、中国、印度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这些国家的斗争中可以看到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这则是对东方人民革命斗争作用和地位的充分肯定。

第三，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同愈益成熟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 20 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19 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成熟的实践。这一时期，在中国、印度等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不足，无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尚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正处于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转变过程中。尤其是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在俄国的革命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尚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而是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运动。19 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这个特点，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下述两个特点：一是基本上只同俄国问题相联系；二是力图回答俄国能不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俄国民粹主义者提出的。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尚没有同东方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尚不能指导和说明 20 世纪以来东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1 页。

方愈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

20世纪以来,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愈益成熟。1903年俄国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领导了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领导了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由于该党的推动,1919年产生了共产国际,随后中国、印度、朝鲜、越南等国,先后产生了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和建设新政权,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同20世纪愈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如列宁关于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观点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的实践。如前所述,20世纪以来东方国家比西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俄国1905年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又连续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十几年后接连发生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朝鲜、越南等国也不断发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又如,列宁关于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的实践。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革命运动转入低潮,苏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苏俄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先于西方国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列宁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列宁理论的指导下,苏俄人民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越南等东方其他一些落后国家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了政权,也先于西方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再如,列宁关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的观点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的实践。俄国、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伟大的实践,因为它开创了从政治上、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先河。但是这个实践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的进程中会有许多曲折。从东方单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上看,经济建设中的“冒进”,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都是曲折的表现。从整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上看,或者说从作为一个体系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上看,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是曲折的表现。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现象可以从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里得到解释和说明。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

义轨道发展的学说。可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里，社会主义问题尚不是主题或者说主要的内容。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则将社会主义问题提上了主题的地位，即它围绕着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各个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要求回答和说明东方各个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除了研究和说明俄国问题以外，很少论及东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则反映了俄国、中国、印度等一系列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并且将其有机地联系起来，视为同一个政治力量体系进行研究和反映，高度地评价了它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能够指导和说明 20 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同东方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当时东方尚没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尚不能指导和说明 20 世纪以来东方愈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则克服了这一问题，它同愈益成熟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 20 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基于以上研究和认识，可以得出结论：从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向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二、列宁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的思想

从 20 世纪初起，到 20 世纪 20 年代，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阐述了中国人民革命的问题，形成了重要的思想。当前，研究和掌握列宁这方面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1900 年 8 月，以德国、俄国、英国、美国、日本为首的八国联军进攻并占领天津和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关资料记载，从天津到北京，沿途的房屋均遭侵略者摧毁，变成瓦砾之场，至少有 50 万人变成无屋可居者。联军攻入北京后，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遭到了洗劫。联军士兵得到命令，可以在城内为所欲为 3 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可是实际上抢劫过程持续了 8 天。北京市民所受财物之损失，数不

胜数。联军虽不公开占领紫禁城，但各国官兵均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内，抢掠财宝。中南海的仪鸾殿变成了联军的司令部。这里曾是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珍宝无数。联军撤出时，抢劫后将其烧毁。侵略联军所到之处，残酷屠杀义和团和其他群众。天津西南 20 多公里的独流镇，北京以东的通州、武清，北京以南的良乡、涿州，北京以西的三家店，均是义和团的活动中心，惨遭侵略军的掠夺和焚杀。沙皇俄国除了伙同德国、日本等侵占天津和北京外，还单独出兵 17 万，向中国东三省发起进攻，占领了东三省的所有大城市，杀戮中国平民，制造了一幕幕惨剧。

列宁痛斥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同年 9 月，他在《对华战争》一文中指出：“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迫使当地居民奋起反抗，或者使他们濒于饿死的境地。”^①在文章中，列宁回顾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形象而深刻地说，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开始瓜分中国时不是公开地进行，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地干，“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②当时，俄国的报纸和其他舆论工具大力宣扬俄国军队取得了胜利。针对此说，列宁指出：“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③沙皇俄国政府当时在有关文件中说，俄国军队占领中国的牛庄和进入满洲，是临时性行为，是为了平定中国叛民的反叛活动，在这些事件中沙皇政府“毫无私心”。列宁针锋相对地说，沙皇政府装扮得十分可怜，装扮得像基督徒那样毫无私心，指责人们冤枉了它，可是历史事实说明，“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承包人、工程师和军官派到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温顺出名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9 页。

的中国人的愤怒。”^①列宁的这些论断，揭露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抢掠和杀戮的罪恶行径，驳斥了它们掩盖恶行的谎言。

1902年4月，中俄之间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分三期撤出军队，每期半年，一年半以内将军队全部从中国撤出。可是，沙俄政府在第一期撤军以后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拒绝从中国撤军。针对此，列宁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俄国政府曾向其他大国保证不侵犯中国，答应不迟于1903年10月8日将满洲归还中国，但它并没有履行这一诺言。沙皇政府在推行其军事冒险和掠夺邻国的政策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以致它已经无法后退。”^②他还指出，沙皇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要满足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利益要求，要满足沙俄统治者的利益要求，这种政策不仅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还会给俄国人民带来灾难。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欧洲各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冷漠的政治态度，如不承认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不支持这场革命等等。英、法、俄、德、日、美等六大强国成立银行协作组织，一致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力图削弱和破坏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针对此，列宁1912年11月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为什么欧洲这样冷漠呢？这是因为在西方各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已经腐烂了四分之三，……在这个资产阶级眼里，中国不过是一块肥肉。”^③1913年3月，他在文章中又说，六国银行协作组织一致停止向中华民国提供贷款的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欧洲资产阶级中间所引起的不是对自由和民主事业的热忱……，而是掠夺中国、开始瓜分中国、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④这说明，列宁正确地看到并且已经指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口头上崇尚自由和民主，但是并不希望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不希望中国进步和文明，它们关心的只是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即通过何种手段把中国的财富变为它们的囊中之物。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列宁声援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八国联军在天津和北京的抢劫和焚杀，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以贫苦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义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和团组织，不畏强暴，顽强斗争，打击侵略者。在天津、北京以及中国北方其他一些地方，都有义和团的斗争。由于义和团的斗争，西方帝国主义者说，造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原因，是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是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 and 文明。列宁针对这些言论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①他还说，那些到中国来只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帜而进行欺骗、掠夺和血腥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②俄国的报刊也大肆攻击中国人，说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中国人的使命，俄国士兵去打仗如何兴高采烈等等。列宁针对此说：“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也同样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一切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③在这里，列宁主持正义，驳斥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舆论工具的歪理邪说，声援和支持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斗争。

如上所述，列宁看到，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帝国主义者对此采取冷漠的政治态度，不给予支持，一致停止对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的贷款。他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者这样做的动机。但是同时，列宁也看到，六大强国成立的银行协作组织正在瓦解中。他说：“这个赢得全世界劳动群众同情的年轻共和国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就是这个黑帮银行团的瓦解。美国总统宣称：美国政府将不再支持这个银行团，它在最近的将来要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现在美国的银行都已退出银行团。”^④列宁还看到，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过去日本甚至不愿意让孙中山到日本去，现在孙中山已经到日本去了，日本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欢迎同共和制的中国建立正常的合作关系。列宁强调指出：“强盗般的银行团的瓦解，自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然也是俄国推行的反动对外政策的一大失败。”^①在这里，列宁通过揭露帝国主义者削弱和破坏中华民国阴谋的失败，声援和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二）高度评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及他们的事业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向了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则是孙中山。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中国问题之解决》一文，提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已经确立。1905年7—8月间，孙中山在日本领导建立了中国同盟会。该组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把原有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地方性的团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7—1908年，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广东、广西和云南举行了六次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1910年初和1911年初，他们在广州又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均遭到失败。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的组织工作及思想影响，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革命斗争的结果。

列宁高度地评价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12年7月，列宁在西方的法文报刊上看到了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孙中山的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②他之所以这样说，在他看来，孙中山认识到仅仅进行民族革命不足以达到革命的目的，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必须反对“社会改革”和“立宪改革”的主张。鉴于此，列宁还评价说：“这是带有共和制要求的完全的民主主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页。

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①在列宁看来，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政治上的解放，只有民主主义的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才能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②在这里，列宁高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以及他提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

在此文章中，列宁还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他们的临时大总统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总统作比较，深刻地指出，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那儿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工人阶级的鲜血。而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充满了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从这样的分析出发，列宁得出结论：在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③在这里，列宁既高度评价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者孙中山，而且高度地评价了中国的革命资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同孙中山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据有关资料反映，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第一次发电报给列宁，向他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1923年，列宁派苏俄代表越飞到中国见孙中山。孙中山在上海的住所接见了越飞。北伐战争爆发后，列宁又派一位代表到桂林，同孙中山讨论中国革命与北伐战争的问题^④。这些事实说明，列宁对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以及对他的事业的热情支持。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有许多政党团体在活动。对这些政党团体的性质和政治面貌进行科学分析，是正确地组建革命阵营和推进革命的需要。当时，远在西方的列宁，根据有限的资料，对中国的诸多政党团体的性质和政治面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

④ 尚明轩著：《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323页。

貌进行了研究和分析。1912年11月，列宁在《新生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由几个政治上比较进步的组织和团体组成了“国民党”，该党的领袖是“著名的孙中山博士”，高级领导层中有许多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求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发展“面向社会”的工商业，维护和平，目前正在忙于制订大规模的铁路网计划。该党的立足点在中国工业比较先进和发达的南方地区。中国的另一些组织和团体组成了“保守党”。该党主要依靠北方也是最落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资产者，“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招摇撞骗的典型”。列宁看穿了袁世凯的政治面貌，说：“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①列宁的这些论述，既充分肯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又鞭挞了善于变节的袁世凯之流，体现出他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以及敏锐的政治目光和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

1913年5月，列宁在有关文章还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在发展，但是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却在帮助中国那些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人。他说：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向中国提供一笔新贷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②欧洲资产阶级之所以愿意向中国提供这笔贷款，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反对中国走向民主和支持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以外，还因为通过这笔贷款，他们可以赚得大量的利润，也就是说可以大大地剥削中国人民一次。列宁说，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这笔贷款，反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剥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冒险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勾结起来扼杀‘落后的’亚洲的共和制！”^③他还说：“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④在这里，列宁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的反民主势力和欧洲的反动势力，体现了他对中国资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和同情。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列宁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如前所述，1907—190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举行了数次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同时，其他革命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不断发生。身在欧洲的列宁根据有限的资料，了解到这些情况，肯定地评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908年7月，他在《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一文中说：“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强有力地开展起来。”^①随着西方民主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中国各个革命组织领导的各种武装斗争，“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②辛亥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走向高潮，并且这以后它在艰难的道路上顽强地前进着。1913年5月，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说：“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③他还说，中国的革命运动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人民的觉醒，以及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1914年2月，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和俄国1905年革命、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联系在一起，作为东欧和亚洲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标志，认为这些革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和展望

1912年，列宁在对孙中山有关文章作研究后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民粹主义色彩。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会有大规模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俄国依靠农民的力量，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而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民粹主义的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和空想的，由于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俄国只能以资本主义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有关著作如《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等等中，提出了某些类似俄国民粹主义的主张。譬如他提出，必须通过土地国有化，达到平均地权。具体做法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以后，令地主自行申报自己所有土地的价格，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国家则按照地主所申报的地价每年征收一定比例的地价税，同时国家保留按照地主所申报的地价收买土地的权利，以防止地主少报地价，偷逃赋税。在申报以后，如果地价增长，增长的部分则全部归国家所有。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地租和地价不高，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租和地价会猛长，由此将会出现大垄断资本家。如果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垄断资本则无从产生，中国则容易走向社会主义。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其内容一是对私人资本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进行工厂立法，加强对它的管理和制约。二是把一部分规模巨大的、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收归国有。在他看来，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显然，孙中山关于防止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是空想的。

列宁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有关文章中说，孙中山虽然不了解俄国，不了解俄国的民粹主义，但是，“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①“在这位中国的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②从孙中山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发展不可避免，再过50年，中国将会出现许多上海一样的大城市。这样的认识同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因素相矛盾，但却符合实际。列宁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孙中山终于以事实粉碎了自己的民粹主义，“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③。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产生和发展起来。辛亥革命时，中国的产业工人有五六十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0页。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起来。列宁注意到这一事实,充分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会掀起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他1912年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起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①即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会建立自己的政党,这个党的纲领在先进性和科学性上一定会超越孙中山的纲领。1919年中国无产阶级举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列宁就此说,中国(以及土耳其等国)开展了革命运动,说明帝国主义战争唤醒了东方,把东方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他还说:世界上大多数居民已经觉醒,“而中国和印度在沸腾。这有7亿多人。再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现在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②

1923年初,列宁在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提出这样的问题:苏维埃政权能不能坚持到西方实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它能不能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武力冲突呢?他回答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一丝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③在这里,列宁把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苏俄、印度等国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视为打击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主要力量,视为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之所在。可见,他对中国和苏俄等国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斗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之高!

三、《怎么办?》与东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

1902年,列宁在领导创建俄国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撰写和发表了名著《怎么办?》,就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等提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

出了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同东方国家革命前的实际相适应，所以在东方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驳斥“反对正统”、“批评自由”的口号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国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俄国也有其代表者。这样，国际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较量，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反映。“经济派”是国际上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它们反对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反对正统”、“批评自由”等错误口号。这个派别在国外主办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发表文章说，要把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意思是说，要实现各派的统一，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必须有对“正统派”批评的自由，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的自由。在俄国国内，“反对正统”、“批评自由”的口号，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口号出现在报刊上，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习以为常或默认了它的合法性。鉴于这种口号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不利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俄国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列宁有力地驳斥了它。

列宁指出，叫嚷“批评自由”的人，是要走到泥潭里去。“自由”，原来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可是，在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它则成为一个虚伪的口号，它的含义是资产阶级可以自由掠夺和剥削劳动者。列宁说：“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① 鉴于“经济派”以“批评自由”为幌子，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排除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列宁说：“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② 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同反动的沙皇制度作斗争，任务非常艰巨，形势非常严峻，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坚持马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否则有可能陷入泥潭，即有可能走向错误的道路并且越走越远。“经济派”叫嚷“批评自由”，就是要让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走向泥潭，走向错误的道路。列宁针对此指出：“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①他还说，作为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的人作斗争。

列宁指出，叫嚷“批评自由”的人，是要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当时，“经济派”以及它们主办的《工人事业》，否定理论工作的意义。在它们的纲领性文件和它们刊物上发表的所有文章中，只字不提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相反却大谈所谓批评自由。列宁说：“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②即认为它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或者说处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立场上，抛弃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运动的原则。在这里，列宁强调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革命原则：“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他说，这个原则是必须始终坚持的，而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由于存在着三种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④这三种情况，一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刚刚开始，在实践上同企图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思想上的清算远没有结束。二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要运用别国的经验，但是简单了解别国经验或抄袭别国的文件是不够的，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别国的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⑤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曾有过的，他们必须首先把人民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⑥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④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⑤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⑥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全力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党必须加强理论建设。加强理论建设，最根本的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必须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教育以外，必须纠正一切对邓小平理论认识上的模糊观点，克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要地位认识不足的倾向。要发扬列宁当初批判错误口号的精神，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维护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二）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经济派”的另一个错误，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即主张排除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排除正确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不搞政治斗争，由工人群众自发地进行经济斗争。这个派别主办的《工人思想报》发表社论说，俄国的工人运动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革命组织及其领导者“手中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每个卢布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列宁在《怎么办？》中批判了它们的这些论调，强调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列宁提出，对“自觉因素”即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任何轻视，都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群众的影响。所谓“自觉因素”，指群众运动中的正确理论指导的因素和革命政党对群众运动领导的因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证明，只有群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且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革命运动进行正确的领导，群众的斗争才能成为自觉的斗争，革命运动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并一步步地走向胜利。按照“经济派”的观点，任凭群众运动自发地进行，那么运动只能停留在经济斗争的水平上，不能够实现真正解放无产阶级的目的，并且这样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徘徊在非无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轨道上。如19世纪英国的工人运动，曾一度受工联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停留在低水平的获取眼前经济实惠的阶段。针对此，列宁批评说：“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

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①为什么会这样呢？列宁分析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资产阶级社会里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掌握了先进的世界观并总结了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创立这种思想，需要把这种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又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全面加工和修饰，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更容易对工人运动产生影响。由此出发，列宁郑重指出：“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②即应当提防和反对那些崇拜自发性和反对加强自觉因素的人。他还指出：“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③

列宁提出，必须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首创精神和行动的计划性。使无产阶级的运动具有自觉因素，或者说使他们的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根本的条件是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首创精神和行动的计划性。党发扬首创精神，制定出科学的行动计划，用以指导无产阶级运动，则可以使运动有目的地、有秩序地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可是“经济派”否定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首创精神和行动的计划性。这个派别的刊物《工人事业》发表文章说，“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意思是说，由工人自发地进行斗争最合适，用不着以党的计划来指导。针对这种奇谈怪论，列宁说：“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他们（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引者注）指挥！”^④列宁还举例说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是一部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领袖以计划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④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和政策指导革命斗争的历史。当德国资产阶级国家给工人以普选权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威·李卜克内西发扬首创精神，制定无产阶级正确利用普选权进行斗争的计划和政策，赋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更多的自觉性，使其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到“非常法”打击时，甚至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如“左”的派别和右倾的派别也分别提出了他们的行动计划，不存在由工人自发地进行斗争的事实。由此列宁提出一个结论：“经济派”说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①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自发的工人运动提高到党的纲领的水平。党的纲领是党的旗帜，也是指引无产阶级斗争走向胜利的旗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取得成就并最终胜利，必须在党的纲领指导下进行。可是“经济派”否认这一点。它们说，不管自然科学取得怎样的成就，人类还是要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怎样增加，新社会制度的产生也是自发地产生。它们还攻击说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作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意思是说，以党的纲领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绝对错误的行为。列宁针锋相对地说：“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纲领’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②他还说：“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③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愈是要制定好自己的纲领，搞好自己的理论建设，做好自己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

当前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行进在新的世纪。在新的实践中，党面临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党的自身建设诸多方面的考验。只有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迎接考验的自觉性，才能成功地经受种种考验。而增强党的自觉性，在于党发扬首创精神，根据新形势的要求提出新的理论，用新的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党和人民的行动步伐，强有力地推进改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述列宁的理论正确地提示了这一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地实践了这一点。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精神源于列宁的理论，光大了列宁的理论。

（三）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

“经济派”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说，在当前的运动中，主要的任务是对工人阶级的“当前的日常利益作出反映”，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工人阶级的利益不断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即主张以主要精力组织工人同厂主作斗争，争取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有所改善。显然，这是主张“纯粹工会的斗争”，是工联主义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相悖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因为后者主张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旧制度的政治斗争，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列宁在《怎么办？》中批评了“经济派”的错误主张，强调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这个阶级同某个或某些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这个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以及它同国家的关系而言的。弄清楚这个问题，是认识“经济派”错误主张的关键。“经济派”之所以主张进行纯粹工会的斗争和纯粹经济的斗争，是因为它们在认识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把工人群众同某个企业主或某些企业主的关系当成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那种具有本质意义的关系。可是实际上，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工人阶级同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才是现代社会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现代社会除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阶级如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上述阶级关系表明，资产阶级需要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自己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镇压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反对剥削与压迫的斗争。工人阶级则希望团结和联合其他劳动阶级，运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从经济上得到解放。“经济派”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它们关于工人阶级斗争道路的观点是错误的。针对此，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

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①他还说,引导工人群众同企业主作斗争,揭露企业主剥削工人的行为,只涉及到某些工人同某个企业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在有利的条件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②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领导工人群众所进行的斗争,应该趋向这一目的,不可避免地趋向这一目的。

列宁提出,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如前所述,所谓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其内容就是进行政治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由于这种政治意识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形成,所以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就此列宁指出:“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③“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外面灌输给工人。”^④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这个提法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首先要到工人群众中去,联系工人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宣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真正达到解放的条件。列宁就此说,到群众中去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⑤这个提法还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应当到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劳动阶级和阶层中去,联系一切赞成、支持和倾向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包括具有一般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对他们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宣传,让他们知道实现民主主义的正确途径,同时不要忘记向他们指明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就此说,“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应当把愿意听无产阶级政党讲话的一切人召集起来开会,“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④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⑤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①在列宁看来，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具备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宣传的力量，工人运动已经使居民的一切阶级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工作的基础，需要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实实在在地到各个阶级的群众中去，扎扎实实地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使工人阶级放眼未来，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才能养成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经济派”竭力主张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宣扬使每一个卢布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都更加实惠，实际上是引导工人群众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可是它们另一方面说，引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是激发工人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普遍适用的手段，即认为只要引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就能培养他们的“革命积极性”。针对此，列宁指出，培养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只有在党领导的斗争不局限于经济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不进行政治斗争，“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引导工人群众对生活中各种重大事件作政治分析，使他们从政治的高度了解本民族的前途和本阶级的前途，从而形成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②。他还说，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主要地集中在工人群众“自己身上”，他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因为引导工人群众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不能产生任何积极性和自觉性^③。使工人群众产生革命积极性，重要的办法之一是使工人群众放眼未来，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列宁就此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像使局部服从整体一样。”^④意思是说，无产阶级政党不反对进行经济改良的斗争，但是它们更重视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用社会主义的目标来鼓舞工人群众，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可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7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7页。

④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是，“经济派”以及它们主办的《工人事业》认为，为了维持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提出一些“能够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即认为提出一些可以马上见效果的“具体要求”，使工人群众很快得到实惠，可以维持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显然，这种看法迎合了一部分落后的工人的心理。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济派’，也包括《工人事业》，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不开展的工人的心理。”^①他还说，能够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工人群众在斗争过程中自己也能提出来，用不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帮助”。由这种“具体要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积极性”，工人群众已经具备，而且这样的“积极性”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上述列宁的理论，对于当前我党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党当前强调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的是代表作为一个“阶级”的或者说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全体人民的利益。工人群众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部分人，都不能以个人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作为标准，评判党是否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启发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学会以政治观点分析各种重大的事件和国家的前途，克服偏重于关注经济利益的倾向。要引导工人群众在困难的时候看到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远景，以个人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服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增强信心，发挥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四）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所谓革命家组织，就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当时也称社会民主党。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像执政以后的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那样，党员人数多，地方党组织也多，而只是由少数以开展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组成的革命家组织。可是，这种革命家组织具有极大的革命权威，能够为革命运动制定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有力量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它是全国革命运动的高层领导核心组织。“经济派”从工人群众进行日常的纯粹经济斗争的任务出发，认为完全不需要建立这样的革命家组织。列宁在批判他们观点的过程中，阐明了必须建立革命家组织的理论。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列宁提出，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要求建立革命家组织。当时的俄国，许多工人团体往往在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彼此之间没有建立联系的情况下，分散地进行斗争。他们就像一群种地的庄稼汉一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其结果是往往遭到彻底的失败。列宁把这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称为“手工业方式”。他指出，那些主张工人群众进行日常的纯粹经济斗争的人，必然主张这种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①“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②在列宁看来，革命家组织由专门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掌握先进理论和懂得革命斗争规律的革命家组成，具有坚强的领导革命的力量；它善于进行革命活动，能够在复杂的斗争条件下巩固自己的组织，从而保持组织上的稳定性；它由于组织上的稳定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所以其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能够持续贯彻下去，即能够保持其继承性。俄国的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历史证明，只有建立这种革命家组织，由它领导革命事业，才能使革命事业走向胜利。列宁针对此说：“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参加运动的群众愈多，革命家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③建立革命家组织，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扩大工人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可以而且应当遍布全国各地，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促进工人运动发展。列宁对此作了论述，并且要求把这些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区别开来，不应以一般的工人组织取代革命家组织。

列宁提出，工人群众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家，需要更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派”认为，开展工人运动，应当使群众“提出”具体的经济生活上的要求，设法满足他们“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不需要开展政治斗争，不需要建立革命家组织。列宁针对他们的观点说，许多工人在经济斗争中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仅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仅进行经济斗争不能解放无产阶级,重要的是进行政治运动。进行政治运动,“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①意思是说,要使工人群众投入政治运动,相信职业革命家的作用,拥护职业革命家和积极培养许多的职业革命家。事实上,有一定政治觉悟的工人群众拥护自己的政治领袖即职业革命家。在19世纪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涌现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他们深得群众的拥护,被工人群众选举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成员,多年参与议会活动。列宁说,这个事实说明,德国的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群众“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拥护这些领袖啊!”^②议会中有的资产阶级议员讥讽说,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总是这些人,比封建社会的官吏还难以调换。列宁说,这种论调是企图把群众与领袖对立起来,破坏群众对领袖的信任,使运动失去稳定性和坚定性。在俄国,有些思想认识不正确的人说,如果建立革命家组织,由它来领导革命运动,那就意味着由革命家组织“代替大家动脑筋”,意味着工人群众可以不必参加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建立革命家组织,并不是说由它代替群众动脑筋,更不是说由它代替群众进行革命运动,恰恰相反,它会领导更多的工人群众参与革命运动,并且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③当然,这里强调的是革命家产生于群众斗争之中,不是指所有的群众都能成为革命家。

列宁提出,建立革命家组织必须反对各种不正确的民主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民主的精神建设党组织和领导革命运动。可是,民主的程度和方式必须视革命的条件而定。在当时的俄国,人民没有民主权利,不能以合法的方式进行革命运动,所以追求不切实际的民主对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运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当时的“经济派”正是追求所谓“广泛民主原则”,攻击说革命家组织有“反民主倾向”。针对此,列宁指出,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毫无意思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没有实行过广泛民主制，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如果这样做必然导致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列宁认为，上述“经济派”的民主观根源于一种幼稚的原始的民主观。英国的某著作家在论述有关工联的书中列有《原始的民主》一章，其中写道，英国的工人在工会活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是由大家来担负工会的管理工作，一切问题都要由全体会员大会表决，一切职务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列宁要求俄国的革命者注意读这本书，并且说：“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①在19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有少数人不切实际地要求实现直接民主，或者鼓吹“直接的人民立法制”，或者鼓吹“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否定专职新闻工作者和专职国会议员的必要性。这也是一种对民主的原始见解。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在有关著作中批驳了这种见解。列宁要求俄国革命者读一读考茨基的有关著作，增强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抵制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原始民主观。

列宁提出，革命家组织应反对运动中的分散性，把握全局推进运动。建立革命家组织，由这种组织领导俄国的革命运动，有利于把握全局，推进全俄的革命运动。可是有的人产生怀疑：这样会不会削弱一般的工人组织同群众联系的牢固性，会不会削弱地方的工作和影响地方工作的稳定性。针对此，列宁指出：“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埋头于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微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②意思是说，革命家组织会正确地处理全俄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关系，既推进全俄工作，又推进地方工作，加强一般工人组织同群众的联系。他以办报为例说，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俄国各个地方的机关报加在一起，总共只出版了30期，平均每月出版1期。往往是地方机关报出版后，受到敌人的破坏，工作无法再坚持下去。而且地方革命组织无力保证自己的机关报具有原则的坚定性，无力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水平，无力收集和利用材料来说明俄国的全部政治生活。他说：“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偶然现象，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而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①如果把各个地方的力量集中起来办一份机关报，那么这份报纸就会很容易地出版 60 期，甚至出版 100 期，由此可见加强斗争统一性和集中力量的好处。列宁要求根据这样的原则精神，着眼于全国的大局，推动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

上述列宁关于必须建立革命家组织的理论，关于反对不正确的民主观和反对运动分散性的理论，对于我党当前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党的高层领导集体，包括中央领导集体和各省市领导集体，正是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革命家组织。进入新世纪以后，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成果，改善人民的生活，依赖党的高层领导集体即革命家组织的坚强领导。党的高层领导集体要重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其他各项制度建设，可是只有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地认识和建设党的各项制度，排除某些不正确的思想的干扰，才能建立起既有利于加强党中央领导又有利于发挥地方党组织积极性、既有利于发挥党组织整体作用又有利于每个党员干部发挥积极性的优良制度，才能通过这种制度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在这个实践中，我党可以从上述列宁的理论里吸取智慧和力量。

四、“渐进发展”的理论

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内容丰富多彩的理论宝库。这个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渐进发展的理论。所谓“渐进发展”，指与“冒进”相对应的、速度相对较慢的、逐步的、有秩序的、平稳的发展状态。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发展”或者是向着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或者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列宁关于“渐进发展”的理论，是向着社会主义目标“渐进发展”的理论。研究列宁的这一理论，对于人们当前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渐进发展”理论的进程

在 1917 年十月革命过程中，列宁即形成和提出了“渐进发展”的理论。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7 页。

二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回到国内，为使政权转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里而斗争。当时，斗争的形势十分复杂。在革命的队伍中，既有布尔什维克，又有孟什维克，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右派社会革命党等等。这种情形要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出稳妥的、比较能够为其他派别所认同的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造的设想。

在此过程中，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改造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进行“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或国家机关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账目进行计算。1917年4月，列宁在《四月提纲》中论及当前革命的任务时提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①当时，党内有的人误解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指责列宁“指望”将俄国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指出，“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国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我还提醒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他说：“我所‘指望’的仅仅是，无非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粮食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实际困难问题上，会比官吏和警察高明。”^②即希望展开“计算和监督”，把生产和分配组织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随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正式的《工人监督条例》，展开了工人监督的活动。

值得强调的是，“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也就是说，列宁当时并未形成和提出剥夺资本家财产的思想。1917年5月，俄国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及经济破坏，出现严重的饥荒。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为了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必须把有产阶级的税率提高到利润的100%，即“剥光”资本家。列宁在批评这种“高调”和“空话”时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处理得更适当，逐步实行比较合理的税收，把小股东和大股东区别开来，对前者将征得很少，对后者才征得很多。”^③他还说：“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① 这里的意思是，不要“剥光”资本家，既不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也不对他们征收 100% 的捐税，而只是对少数大资本家征收较多的捐税。列宁说：“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摆脱灾难而应该向人民宣传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取得政权的地区现在就应该部分实现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应该全部实现的措施。”^② 同年 11 月 5 日即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列宁在《告人民书》中谈到苏维埃政权当时的措施时说：“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把以前所规定的捐税全部征收上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③ 即苏维埃政府不打算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列宁主张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意味着他否定激进发展的措施，主张采取渐进发展的措施。这说明他当时的思想是“渐进发展”的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在 1921 年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在回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的措施时，明确提出当时采取的是“渐进发展”的措施。1921 年 10 月，列宁看到了一份私营的《广告小报》，引起了对 1917 年底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联想。他在当时举行的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件事，并指出：“在 1917 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④ 以上这一段话，最清楚地表明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思想。他主张采用“渐进的办法”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这种办法的内容是保留私有制，即保留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保留私人报刊，将这些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这也就是所谓“计算和监督”）。可是，当时资产者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展开破坏活动，迫使苏维埃政权同他们进行政治斗

① 《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2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2 页。

争和军事斗争。这说明，当时上述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及其指导思想是“天真的”。列宁在上述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同时强调：1917年国家关于垄断广告的法令“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①意思是说，当时所实行的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是最能适应当时条件的措施，是渐进的措施，是不作大的破坏的措施。在此报告中，列宁还就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措施作出如下评价：“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这一点也表现在我所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里（即苏维埃政权颁布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的例子——引者）。”^②以上援引的材料说明，在上述报告中，列宁三次提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措施是渐进的办法或渐进的改变。这一方面证明他十月革命时期的思想确实是渐进发展的思想，另一方面证明他对此思想是充分肯定的。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时期，是俄共（布）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展开猛烈进击的时期。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属于“激进”、“冒进”的思想，即认为他主张快速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可是实际上，列宁这一时期继续坚持并明确论述了“渐进发展”的理论。

当时的俄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小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可是，从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看，必须把个体农民引上集体化的道路，必须使个体农民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显然，对于俄国来说，完成这个任务是异常困难的。1918年11月上旬，列宁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下子就把数量很多的小农户变成大农庄是办不到的。要在短期内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经营的农业变成公共经济，使之具有全国性大生产的形式，由全体劳动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劳动义务，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劳动产品，——要一下子做到这一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点，当然是不可能的。”^① 这里所谓“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一下子”是不可能的，指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缓慢的过渡阶段。12月中旬，他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又说：“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指公有制——引者注）的过渡，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深深知道，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② 在这里，他不仅清楚地说这种过渡“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明确地提出，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不可能实现这种过渡。

他这里所说的“渐进的预备阶段”，指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的事实。列宁此前曾就这个事实说过，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让农民个体经营，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看起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由于广大农民要求这样做，布尔什维克不能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愿；通过这样的措施，可以促进农民经济的发展，为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上述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不经过这样的预备阶段，则不可能完成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同时他在这里再三强调：“这种由个体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再说一遍，不可能一蹴而就。”^③ “我们深深知道，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千百万人生活中一场触及生活方式最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现。”^④

1919年10月，列宁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这里，他在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要求消灭阶级，要求消除工农差别，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经过长期的、逐步的、渐进的过渡，绝对不可以采取急躁轻率的态度。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了消灭阶级，……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页。

④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①这一论断由于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办法，明确提出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极具理论深刻性，成为列宁关于“渐进发展”的经典性论断。

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认真地分析了俄国中农的经营状况和阶级特点。当时的中农，作为劳动者农民，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受过资本主义的压迫，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但是作为握有余粮的私有者的农民，他们习惯于把余粮看成可以自由出卖的财产，在社会上出现饥饿威胁的时候成了投机者和剥削者。因此工人阶级如何处理同中农的关系，从而将这个阶级引向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无比艰难的、长期的任务。列宁说：“我们的最困难的任务就在这里。社会主义者总是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会提出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工人阶级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期望共产党员同志细心地、自觉地好好对待这一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不要企图一下子就解决问题。”^②1920年4月上旬，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讲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时说：“这个任务单凭热忱、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精神是不能完成的！在这种我们俄国人做起来比谁都差的组织工作中，……图快是什么也做不成的。”^③

总之，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在论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自始至终强调不能急躁轻率地行事，不能图快，不能企图一下子解决问题，要求进行长时期的、渐进的过渡。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他坚持并论述了“渐进发展”的理论。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将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看成为“激进”的思想，在于人们将列宁应付战争形势和战争条件而作出的决定或提出的论述看成了社会主义理论。毋庸讳言，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领导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措施。这是应付战争形势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列宁自己曾经说过，这不是正常的经济建设所要求的政策和措施，不是正常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因此不应将列宁关于实施战争共产主义政策和措施的论述看成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页。

为社会主义理论^①。

1921年春，苏俄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主要有：实行粮食税制，允许自由贸易，支持城市小型私人工商业企业发展，开展租让制和租赁制，在国有企业实施商业原则即物质利益的原则等等。在实践中，列宁深入阐述了“渐进发展”的理论。

在这一时期，列宁首先着眼于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同私有者农民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渐进发展”的理论。1921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在俄国，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是进行小生产的私有者农民，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国家在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长期地同小农打交道，必须渐进地发展。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而大生产是不可能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时间。在这以前，我们还要同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②这里，关于无产阶级国家需要同小农打“好多年的交道”的论述，体现了“渐进发展”的思想。他还说：“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竟然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③在列宁看来，由于这个情况，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有特殊的办法，“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④。这里的思想，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很长的时期内同农民协调关系的思想，是采取特殊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是“渐进发展”的思想。同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论及俄国国内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时，再次提出：“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

^① 参见俞良早：《列宁后期思想的政治性质及其发展中的一贯性》，《学术季刊》1998年第2期。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进的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① 这里，他明确而直接地提出必须使用“渐进的办法”实现社会化大农业，从而表述了“渐进发展”的理论。

在这一时期，列宁着眼于俄国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阐述了“渐进发展”的思想。同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俄国由于落后，大城市以外的许多地方，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里的乡村同铁路之间相隔几十里，或者只有羊肠小道，或者无路可通。由这样的状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创造一个条件，即实现全国电气化，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② 意思是说，在落后的俄国完成电气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需要十年，还有后续的工程需要完成，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由此看，在俄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或者是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国家取得胜利，俄国在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也许较容易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这更是遥遥无期的事。列宁认为，如果上述条件和途径不能实现，那就只有通过“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在最近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③ 这些中间环节，指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中间环节过渡，指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向社会主义过渡。他的上述思想不是马上完成过渡任务的思想，而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或者经过中间环节过渡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渐进发展”的思想。

这一时期，列宁还就俄国恢复经济和经济建设的任务，阐述了“渐进发展”的理论。同年5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恢复国民经济和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苏俄同国外资本主义的斗争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因此完成恢复经济和经济建设的任务至关重要。他说：“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以取得胜利。”^① 这里，强调慢慢地、逐步地前进，认为图快是不行的，表达了“渐进发展”的思想。在此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还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后来又用一些法令和决定加以肯定下来的政策，无疑是党认为必须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② 这里所说的政策就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体现渐进发展的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必须长期实行下去，说明列宁主张长时期的渐进发展。同年8月，他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中指出，过去的几年，无产阶级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绩，现在转入了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比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说：“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定更加困难、更加缓慢、更要循序渐进。”^③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前进，否则象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样困难的道路上，在这样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现在是无法前进的。”^④ 这里提出经济建设中必须更加缓慢、循序渐进，必须一步一步地前进，深刻地表述了“渐进发展”的理论。同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⑤ 这里，列宁使用了“渐进主义”一词，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渐进主义”的行动方式，是目前的新事物，从而表述了“渐进发展”的理论。

（二）“渐进发展”的形式或措施

渐进发展，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或措施实现的。列宁在当时的实践中就此作了深刻的理论阐述。总结和归纳他的思想和理论，“渐进发展”的形式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⑤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第一，较长时期地发展小农经济。如前所述，列宁从俄国存在着大量农民和存在着小农经济的事实出发，得出了它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渐进发展”的结论。与此相联系，在实践中他主张较长时期地发展小农经济。在俄国农村，1917年10月至1918年夏，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列宁和俄共（布）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通过《土地法令》和《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无偿地转让给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从而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以后，俄国的小农经济发展起来。在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被迫实行余粮收集制和禁止自由贸易，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战争结束后，列宁提出，一定要尽快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为小农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他在《论粮食税》一书中指出：“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① 国家十分需要粮食和燃料，“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②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列宁和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实行粮食税。在列宁看来，粮食税是推动小农发展生产的一种动力。他3月15日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说：“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③ 在实行粮食税的过程中，“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④ 援引的这些论断说明，列宁当时极力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列宁逝世前夕，在重要著作《论合作社》里提出了开展合作化的任务。可是，在列宁的思想上，当时的合作化，就是组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进行个体生产劳动、通过合作社进行彼此之间和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消费合作社。也就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

是说，列宁当时设想的合作社，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体劳动的生产组织，而仅仅是“买卖机构”^①。从一定意义上看，他的这个思想仍然是发展小农经济的思想。

第二，积极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在苏维埃国家，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采取许多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看似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可是，在生产水平和经济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这样做能够促进发展，实际上是在缓慢地、逐渐地接近社会主义目标。由此，在列宁的思想上，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是实现“渐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形式。1921年春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活跃起来了。针对此，列宁指出，由于有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有小经济的发展，必然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所揭示的现象。对此，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怎么办呢？他说：或者是试图完全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②这里，列宁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在苏维埃国家或者说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这一时期，党内有人对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持不正确的认识，于是出现了一种议论：社会主义是幸福，资本主义是祸害。列宁针对此说，不能简单地谈论这个问题，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③即认为就俄国当时的情况而言，资本主义是“幸福”。正是由这样的认识出发，列宁提出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④这是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最经典的论断。

① 参见俞良早：《关于列宁逝世前夕几个重要论断的理解——对某些流行观点的商榷》，《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第三，紧紧地抓住发展商业的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业和商品交换。在苏维埃国家发展商业和商品交换，似乎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和目标。可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一步步地接近社会主义的目标。由此，在列宁的思想上，发展商业是“渐进发展”的一种形式。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列宁并没有将商业与建立新经济联系起来，甚至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他在提出实行商品流转时仍寄希望于通过合作社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以物易物式的直接交换”。直到1921年秋“以物易物式的直接交换”失败了，他才认识到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发展商业。这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商业问题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①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到，1921年9月至11月，苏俄中央合作总社的贸易额分别是100万金卢布、300万金卢布和600万金卢布，这些数字虽然很小，但它说明苏俄的商业在发展，“这一点应当坦率地承认，因为对这一点发生任何错觉都是有害的。……情况是在向前发展的，我们是可以抓住这个经济基础不放的。”^②值得指出的是，在列宁的思想上，发展商业是这一时期新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主要环节”。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在讲到党面临着发展商业的任务时说：“这就是我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应该看清的主要之点。”^③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在论及搞好工作必须抓主要环节时说：“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④他在最后的文章《论合作社》中指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领……结合起来。”^① 这些论述强调，发展商业是当时各项经济政策的“主要之点”，是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全部问题在于”要有做商人的本领等等，说明列宁把发展商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

第四，适时地转变工作重心从而消除“激进发展”的态势。在苏维埃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有时处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之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工作重心处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之上时，由于政治斗争环境的影响，党和国家的整个工作往往容易离开“渐进发展”的轨道，形成“激进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况要求党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告一段落时，适时地转变工作重心，消除“激进发展”态势，恢复“渐进发展”的正确轨道。所以在列宁的思想上，适时地转变工作重心是实现“渐进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1918年4月，由于党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苏维埃政权已经在俄国各大城市和乡村建立起来，并且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巩固。由于签订布勒斯特和约，苏维埃俄国已经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这时列宁提出了转变工作重心的思想。他说：“镇压反抗的任务目前大体上已经完成，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管理国家的任务。”^② 党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服人民相信党的纲领和路线的正确性，第二个任务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③ 在前一个阶段，苏维埃国家对一部分企业主实行国有化的措施，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体现出当时事业发展的“激进”态势。列宁说，如果我们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发展，继续坚持“激进”的态势，我们就一定会失败，所以一定要把工作重心转变过来。由于不久爆发了国内战争，这一次转变工作重心的任务没有完成。到1920年11月，红军彻底打垮了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国内战争以苏俄军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苏维埃俄国取得了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一定的均势。这时列宁及时地、再一次地提出了转变工作重心的任务。他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中说：“现在必须在国内战线上取得胜利。……应当做到把全部热情和纪律都转而用于和平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经济建设的工作，应当争取普通群众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①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在讲到以往曾进行过几次工作重心转变时说：“现在我们必须再一次把这种转变提到首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实现。”^②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以后，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重心发生了一个新的、更深层次的转变，说明列宁从新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形成了转变工作重心的思想。

五、发展农村和农业的思想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十月革命后，发展农村和农业成为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宁领导党和苏维埃政权展开了积极的实践，形成和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当前研究列宁关于发展苏俄农村和农业的思想，对于我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和思想指导的意义。

（一）建立适合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农村政权组织

建立适合的即同苏俄实际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农村政权组织，是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因此，解决此问题成为列宁理论和实践最重要的内容。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主张将一切土地包括地主的、皇室的、教会的土地，按照平均使用的原则，分配给劳动者即农民使用，确立个体农业生产的形式。他的这一思想的依据，是当时俄国农村和农业十分落后的状况。革命前夕俄国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实行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业生产技术极为简陋。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俄国农业中使用的工具，是近800万只木犁和400万只铁犁。平均每一公顷耕地，只配备有6卢布的农业机械或工具。农业生产中根本没有拖拉机和汽车。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只能是个体的、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的经济形式。列宁正是从这种状况出发，主张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他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工农革命政府首先应当解决土地问题，——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问题。”^①同一时间通过的由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规定：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平均分配给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稍后，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继续强调这一思想。如他在起草会议决议草案时针对《土地法令》写道：“农民代表大会表明坚定不移的决心，要全力维护这项法律的实施，号召全体农民一致拥护这项法律并且由农民自己立即在各地付诸实施，同时号召农民只选举那些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完全忠于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的人担任一切重要职务。”^②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由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等于主张或确认了个体农业生产的形式。列宁之所以持这种主张，一是由于他意识到俄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低，与之相适应的只能是个体生产的形式。二是由于他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获得自己支配的土地，工人阶级执政党和苏维埃政府不能违背农民群众的意愿。三是由于他认识到农村的生活应当由农民自己做主。就这一点，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俄国幅员广大，各地条件不同；我们相信农民自己会比我们更善于正确地妥当地解决问题。”“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③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列宁主张由个体农民经济向公有化的“共耕制”过渡，同时强调这种过渡需要很长时间。如前所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主张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确立个体农业生产的形式。可是，个体生产的形式是同社会主义原则相悖的。作为领导人民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俄共（布），必须将个体农民经济引向公有制经济。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趋势，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提出了向共耕制过渡的思想。

所谓共耕制，指苏俄农村当时探索中的公有化制度，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均公有化的“农村公社”，二是社员保留家禽、家畜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和少量宅旁园地的“农业劳动组合”，三是仅仅在耕种土地时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性的“共耕社”。1918年11月，列宁开始提出个体农户向共耕制过渡的问题。他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前一阶段分配土地的斗争时说：“分地只在开始的时候是好的。它是要表明土地从地主手里转到农民手里。但这是不够的。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①随后，他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于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②1919年2月，列宁在起草《俄共（布）纲领草案》时，将这一问题反映到了该草案之中。同年12月，他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指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耕作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③以上援引的论述，证明列宁确实提出了个体小农经济向共耕制过渡的思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并没有要求马上完成向共耕制的过渡，而是要求稳重地、逐步地、长时期地做这项工作。如他在提出向共耕制过渡的任务时清醒地指出：“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重地逐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现共耕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接受共耕制的只是极少数觉悟的农民，而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这个要求。”^④“当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在所有地方过渡到共同使用土地的制度。富农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农民自己也往往顽固地反对在农业中实行公社原则。”^⑤“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向共耕制的过渡，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⑥从当时的实践看，到1920年，参加共耕制组织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0.5%，说明这项工作并未过急过快地推进。也就是说，实践的情况和结果同列宁的指导思想是相吻合的。由此看，即由列宁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④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⑤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⑥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

意识到向共耕制过渡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需要逐步地推进看，他的思想符合实际。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列宁要求加强农村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及苏维埃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若要在农村得以落实，需要组织上的保证，即需要建立维护贫苦农民利益的农村政权组织。1918年6月，俄共（布）开始领导在农村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贫苦农民委员会以乡或村为单位建立，其委员在贫苦农民以及中农中选举产生。它的任务是：分配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分配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关没收富农的余粮，参加对农民分配土地，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并进行重新分配，为红军征集志愿兵，组织文化教育工作等等。当年11月，欧俄的33个省和白俄罗斯，已经建立12万个贫苦农民委员会。该组织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是农村苏维埃政权组织，是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在农村得以落实的组织保证。列宁要求加强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设。这年6月，他在起草的有关文件中写道：“为了对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组成和活动进行总的领导，特别成立一个常设会议，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二人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代表一人组成。”所有地方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及地方苏维埃机关都必须服从于该会议^①。同年11月，他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必须使贫苦农民委员会遍布全国。”^②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还说，只有不剥削别人劳动、不趁人民挨饿进行抢劫、不以余粮投机、不隐藏粮食的人，才有权利选举为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委员，“在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中不应当有富农和寄生虫的位置”^③。同年12月，他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地评价了贫苦农民委员会，认为它体现了农村中的新潮流和新生活，体现了农村的一种变革，体现了农村发展以至整个俄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他说，从此后，农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贫苦农民委员会的阵营，一个是富农的阵营。贫苦农民同城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继续前进，迈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实践中看到，贫苦农民委员会只是农村苏维埃政权组织的雏形，必须对它进行改革和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改组，使其成为正式的苏维埃组织。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拟订了一个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改组计划，这个计划将提交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我们决定，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不应当并存。……我们要把贫苦农民委员会同苏维埃合并，使贫苦农民委员会成为苏维埃。”^①此后，他的这个论断及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执行。

在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过程中，列宁主张继续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即小农经济，主张恢复个体农民之间的贸易自由。如前所述，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曾提出应当使个体农民经济向“共耕制”过渡，但同时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因而在当时的实践中并未着力于推进这项工作，国内战争结束时苏俄农村仍然是个体农民经济占优势地位。所不同的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形势和支持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禁止农民自由贸易的措施。国内战争结束时，农民仍然没有贸易自由。针对这种背景和形势，列宁主张继续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恢复个体农民之间的贸易自由。他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说：“当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恢复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懂得，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而大生产是不可能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的时间。在这以前，我们还要同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因此，自由贸易的口号是必然会提出的。”^②确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还要同个体农民生产者打很多年的交道，确认必须恢复个体农民的贸易自由，说明列宁确认了苏俄农村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事实，肯定了个体农民经济存在的必然性。这一时期他还说：“我国有2000万农户，农民的9/10，更可能为99%是单独的个体劳动；我们打算在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提高农民经济，而且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这一点。”^③列宁认识到，前几年由于战争的重压，苏维埃政权没有精力考虑怎样处理好无产阶级国家同小农经济的关系，以及怎样找到与小农经济共处的形式，当前则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小农只要还是小农，就需要有与他们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即必需由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劳动成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果，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当时有的人以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小农经济改造为公有经济。列宁针对此指出：“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竟然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①

列宁逝世前夕提出，必须在苏俄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制度。在苏俄，合作社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机构。在旧社会，它是劳动者自愿组建的、以有利于交换和消费为目的的经济合作机构。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即提出无产阶级国家要善于利用这一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机构。在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曾把合作社变成消费品分配机构，利用它对城乡居民进行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维埃政权又利用它进行城乡间的商品交换（当时既有这种形式的交换，又有自由贸易）。列宁逝世前夕，对合作社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他说：“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合作社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② 必须在农村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脚跟。”^③ 他这里所说的合作社，仍然是一种商品交换的组织。他的设想是，农民的生产仍然是个体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产品仍然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需要通过合作社进行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和彼此之间的商品交换。这样的合作社，合作化的程度较低，可以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并且可以逐步地培养农民群众集体生活的习惯，以便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过渡到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上。列宁认为，合作社制度是俄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道路，全体农民参加了合作社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成为现实。

（二）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和推动农村建设

发展农业生产和推动农村建设，有赖于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措施和政策。列宁在实践中重视解决此问题，形成了重要的思想。

第一，主张以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国家机关对农民进行物质奖励的问题。有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368页。

的出席者提出，不能对个体农民进行奖励，只能奖励农村的带有集体化因素的社团。另一部分代表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提出了看法：两种奖励都保留，并规定两者的一定比例。列宁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我国有 2000 万个体农户，都是单个经营，并且也不可能用其他方式经营；如果我们不通过奖励去提高他们的生产率，那就根本错了，那显然太过分了，是不愿看到我们应当加以考虑、应当作为依据的显而易见的现实。”^① 意思是说，从苏俄当时的现实出发，应当奖励个体农民。同时列宁提出，在对个体农民进行奖励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个情况：某个劳动者虽然取得了经营成绩，但是使用了富农手段，如放债、利用工役、投机倒把，那就不应该得到任何奖励。他提出，对农民进行奖励时，可以奖给他们生产资料，即用来扩大生产和改进生产的工具、机器，也可能奖给他们消费品，即用来改善他们家庭生活的日用品。列宁在会议上反复强调上述思想，并将它作为条文反映在了会议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中。这个事实说明，列宁主张以正确的奖励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21 年春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更体现出列宁以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思想。此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实行粮食税制和恢复自由贸易，则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此，列宁在党的十大有关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实物税就是这方面的一项简单而又绝对必要的措施。它能给予这种鼓励。应当无条件地通过这项措施。”^② 他在《论粮食税》中还说：“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③ 上述论断反映了列宁以正确的粮食政策和商品交换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思想。

第二，重视以新技术和新机器促进农业生产。20 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有了快速的发展，有的科学技术成

① 《列宁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7—208 页。

果运用于战争中，有的则运用于工农业生产中。列宁看到了这一点。1918年底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战争使俄国的农民认识到了现代技术创造的巨大力量，“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是利用这种力量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对它进行改造，把它从按照旧的方式盲目经营的农业变成建立在新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① 当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苏维埃国家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进行了较多的投资。就此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苏维埃政权已决定拨出十亿卢布，作为发展农业的专用基金。一切现有的和新成立的公社都将得到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② 以新技术来促进农业生产，要求不断地向农村供应新机械，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的能力。苏维埃政权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18年4月，人民委员会酝酿通过关于向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机械的法令，列宁关注分配农业机械的原则，为该法令草案写了一个补充意见。他提出：“分配农业机械等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既要首先保证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全部土地的耕作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要对贫苦的劳动农民优先供应农业机械等。”^③ 同年7月，他又代表人民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决定草案，其中写道：成立一个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组成的领导机构，研究向农民供应农业机构的问题；该机构应迅速展开工作，提出工作方案，并尽快落实。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国外的经济贸易取得进展，国家有可能从国外买到农业机械。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写道：“现在外国资本家不得不同苏维埃俄国签订贸易协定了。这些协定将帮助我们买到必要的农具、机器和其他东西，来恢复被破坏的农民经济。”^④

以新技术促进农业生产，必须充分发挥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1921年11月，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举行，列宁到会并作了讲话。他指出，目前形势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发挥农艺师的作用和运用新农业技术。同时他说：“农艺师的数量同全体农民群众相比毕竟很少，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他们的工作如果不同农业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就不会富有成效。”^①当时莫斯科省农民在发挥农艺师的作用和运用农业技术方面取得了初步成绩。列宁要求该省向其他省份传播经验，提出：“莫斯科省的农民必须把自己在改善农业状况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看作是在这方面迈出的头几步，并把它们介绍给全体农民。”^②

第三，要求向农民提供足够的种子并保证完成播种任务。农民有没有足够的种子，能不能完成播种任务，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多少，所以列宁十分重视解决此问题。1918年5月，苏俄的春播任务眼看不能按计划完成。列宁在起草的有关决议草案中提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尽可能减少春播谷物播种不足的情况，并且发展蔬菜种植业和作好秋播的准备。同年8月，农民仍然普遍的种子不足，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列宁对此极为关心，提出了许多解决困难的办法。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让贫苦农民委员会从富农那里没收种子粮，无论如何要这样做，如果现在不行，以后也要向富农征收——先暂时从地主农场拿出一部分粮食交给贫苦农民作种子。”^③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发展农业经济的问题，列宁就种子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由于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人们有可能将种子吃光，所以必须抢救种子，必须将种子拿到公共仓库里去，同时应当向农民保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种子在春播时一定会合理地分配给农民，而当前则一定要使播种所需要的种子由国家来保管。同时他提出：“最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最紧迫的工作上，即：无论如何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种子，保证播种计划的完成，在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和中农人数最多的地方开始大规模地推广已试验过的改进农业的措施。”^④在1921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维亚特卡省的饥荒极为严重，完成春播任务十分困难。列宁当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苏俄政府根据同美国缔结的一项条约，可得到美国2000万美元的贷款，政府再拿出1000万美元，共3000万美元，相当于6000万金卢布，以此用于支持农民的春播。此外，他还提出：“我们想，还可再动用部分黄金储备稍微多购一些种子。……春播任务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④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必须尽可能全部完成。我们将全力以赴。”^①

第四,力图以文化工作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根据1920年的统计,俄国居民中识字的人数不足居民总数的1/3,即2/3以上的人是文盲,而且文盲绝大多数在农村。显然,这种情况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农村中文盲者居多,或者说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太低,不利于普及农业生产技术,不利于采用新的农业机器,而且不利于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基层政治生活的正常发展。列宁看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要求开展文化工作,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而且列宁看到,农民的文化水平低妨碍了合作社化的开展,即由于农民缺少文化,思想不开化,难以接受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这样,列宁在提出建立合作社的任务时明确地指出:“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②

列宁主张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开展文化工作。1919年5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维埃国家进行文化教育的条件很差,纸张和书籍都很少,可是在农民群众中有这样的现象:有些农民夺取了贵族老爷的书籍,拿回家隐藏起来,惟恐有人夺走,而不知道和不愿意利用这些书籍来进行文化教育和文化学习。他认为,这里有一个启发群众觉悟和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如果启发了这些农民的觉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做了相应的组织工作,就可以利用现有的不多的书籍来进行文化工作。列宁还主张城市党组织和城市文化团体经常下农村,促进农村的文化建设。一个做法是,在城市建立许多以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经常下农村,开展文化建设。这就是他所说的:关于农村的文化建设,“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在这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展。”^③另一个做法是,使城市一些党支部与农村一些党支部之间建立固定的联系,由城市党支部帮助农村党支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他就此提出:“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④对此,他予以肯定,要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求认真地这样做下去。

(三) 执政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和关心农民的生活

在苏维埃俄国，由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发展，所以列宁在当时的实践中要求工人阶级及其执政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和关心农民的生活。他在此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实践，形成了重要的思想。

第一，党和苏维埃政权不能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如前所述，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将土地平均分配给了农民。可是，这种土地革命纲领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在十月革命以前，社会革命党提出了他们关于土地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土地社会化”，即主张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但在十月革命以前，这个纲领没有得以实现。只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才将这个土地革命纲领付诸了实践。然而，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目的是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从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看，必须在农村建立集体使用土地的制度。这说明，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措施，不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理想，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说明，列宁和俄共（布）在十月革命时期鉴于在俄国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成熟，鉴于农民迫切需要得到土地，以非社会主义的途径照顾和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要求。1918年11月，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中，在回顾以前的经历时说：“土地改革是从土地社会化开始的，我们亲自举手通过了土地社会化，同时我们又公开指出它不符合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民都主张平均使用土地，我们不愿意强迫他们。”^①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支持通过了关于土地社会化的一系列法令，是为了遵从农民群众的意愿，或者说是为了不违背农民群众的意愿。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又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反对土地社会化法令的。但我们还是签署了这个法令，因为我们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②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第二，党的政策和措施一定要保证农民“得到好处”。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1918年夏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陷入严重饥荒之中。战争前线需要粮食，城市人民的生活需要粮食，可是收购粮食极为困难，由此产生了所谓余粮收集制，即国家政权强制性收取农民粮食的政策和措施。众所周知，随着战争以及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进展，这个政策的内容演变为国家无偿地收取农民的粮食。可是它开始阶段的内容却不是这样，而是国家政权以纺织品、农业生产工具等同农民交换粮食，即国家政权从城市将纺织品、农业生产工具等运送到农村，换取农民的粮食。当时列宁提出，一定要使农民在这个活动中得到好处。1918年7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国家政权决定按50%的价格即半价将纺织品卖给农民，要保证这些商品卖到农民手中，不能落到投机商手中，“一定要使贫苦农民从粮食和纺织品的分配（即交换——引者）中得到好处，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没有尝试过的，而现在我们正尝试着这样做。”^① 1919年3月，他在俄共（布）八大有关决议中写道：“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力帮助农民，主要是供给中农城市工业品，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质，以提高农业经营水平，保证农民的劳动和生活。”^② 在这里，他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工作者真正做到以下几点：调整农民使用的土地，消除土地零散插花和地块窄长的现象；供给农民改良的种子和人造肥料；改进农民的牲畜品种；推广农艺知识，给农民以农艺指导；由国营工厂修理农民的农具；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改良农田的土壤等等。他说，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帮助贫苦农民和中农，“党认为国家为此拨出巨款是必要的”^③。

第三，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如前所述，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迫于战争形势，实行了余粮收集制和禁止自由贸易等政策。实行这些政策，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并保障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从1920年底开始，苏俄农村的许多地方发生骚乱，尤其是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情况更为严重，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在党的十大上以及十大以后，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把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特别是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提到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面前。列宁在党的十大上起草《关于改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的决议草案初稿》，就迅速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意见。该决议草案初稿指出：由于战争和粮食歉收，农民极端贫困，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党组织应通过紧急措施来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由于农民的生活极端困苦，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措施同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措施相比应该更多更有力。随后，列宁在《论粮食税》一书中指出：“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① 国家十分需要粮食和燃料，“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② 意思是说，党和国家首先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改善全体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当时粮食税制作为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之一，使农民能够支配纳税后余下的粮食和农副产品。自由贸易则可以使农民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粮食和农副产品，购回个人以及家庭生活必需的日用品和扩大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国家还支持城市私人小工业企业恢复生产，使其尽可能快地生产出日常生活用品，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采取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又实现了工业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就此，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恢复这种结合，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③ 意思是说，共产党人正以务实的态度进行工作，力图使农民尽快地摆脱贫困的境地。

六、关于苏俄三个时期三种工农联盟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国内战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而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由于农民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占人口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关系重大，所以列宁和俄共（布）十分重视解决工农联盟的问题。由于苏俄三个历史时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各不相同，工农联盟的内容必然不同。实际上，苏俄历史上形成了三种内容不同的工农联盟。列宁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认真的实践，形成了重要的思想。

（一）以工人阶级及其执政党支持对农民平分土地和农民拥护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工农联盟

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俄国的无产者有 1000 万人，农民有 2000 万户（每户至少有 2 人）。农民的数量之多，说明这个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农村各地掀起了夺取地主土地和反对地主压迫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还产生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鉴于上述情况，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实现工农联盟，以便自己的事业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1917 年 11 月 18 日，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工人革命已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胜利，并正在俄国其他地方获得胜利。工农政府保证广大农民，即占农民多数的贫苦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① 12 月 1 日，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只有实现工农联盟才能获得土地和平。”^② “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盟’，真诚的联合，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③ 以上论断，体现了列宁关于工农联盟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思想。

列宁认识到，这一时期苏俄工农联盟的一方面内容是工人阶级及其执政党支持对农民平分土地，使农民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革命前的俄国农村，私有土地共有 9150 万俄亩，其中属于贵族地主的就达 7300 万俄亩。许多农民没有土地，不得不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租种地主的土地。如用自己的农具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8 页。

和马匹为地主耕种，将收成的一半交给地主。由此，俄国农民迫切希望在革命过程中解决土地问题。1917年8月，自认为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综合地方242份农民委托书，拟定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提出了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农民的要求。可是该党在十月革命前执政的过程中并没有将此问题付诸实践，所以农民的土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十月革命胜利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任务摆在了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执政党面前。列宁和俄共（布）主张按照社会革命党《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的精神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是，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党人的理想，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必须在农村建立集体耕种土地的制度。尽管如此，列宁从有利于实现工农联盟的目的出发，主张将土地国有化并平均分配给农民，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如他当时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全俄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在这个法令里，布尔什维克完全重申了农民委托书中提出的原则。”“不管怎样解决土地问题，不管是在什么纲领的基础上把土地转交给农民，都不妨碍农民和工人结成巩固的联盟。既然农民世代都坚决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那就应该加以废除，这才是重要的事情。”^① 他还说：在革命胜利后，“居于统治地位的应当是多数人的意志：这种多数人的意志要靠劳动者联盟，要靠工人和农民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真诚的联合来贯彻。”^② 上述列宁的论断，深刻地反映了他关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工农联盟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思想。

列宁认识到，这一时期苏俄工农联盟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农民拥护十月革命和支持革命向前发展。由于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途径是相同的，所以俄国农民拥护十月革命和支持革命向前发展。1917年11月下旬，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只是俄国革命的第一步，但是解决土地问题不能离开革命的其他任务，只有农民拥护十月革命并支持革命向前发展，才能解决土地问题。他还代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大会宣布：“农民代表大会表示深信，只有在10月25日开始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条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件下，土地法规定的一切措施才能全部实现。”“因此农民代表大会完全拥护10月25日革命，而且拥护的正是这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①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分子散布舆论，说苏维埃政权得不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陷入孤立，很快会失败。列宁针锋相对地说：“我没有看到一个农民表示反对苏维埃。贫苦农民和工人必须结成联盟，这样，社会主义就会……获得胜利。”^②“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③

当时，由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穷凶极恶的颠覆活动，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疯狂的军事干预，革命队伍中有的人也对苏维埃政权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产生了怀疑。列宁指出：“一个政权要能长期存在下去，就要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团结成一支彼此密切联系的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力量。”俄国工人阶级及其执政党做到了这一点，“10月25日以后，我们一下子——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政权建立在这种稳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了。”^④意思是说，俄国农民拥护和支持工人所进行的革命，工人阶级及其执政党有能力做到并且已经实现了国内巩固的工农联盟。

这一历史时期，列宁不仅认识到工农联盟的上述两方面内容，而且为深化这些内容进行了不断的努力。

列宁坚决支持苏维埃政权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他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工农革命政府首先应当解决土地问题，——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问题。”^⑤同一时间通过的由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规定：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平均分配给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同年12月，在有关会议上，有人向列宁提出一个问题：在于1918年1月举行的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④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⑤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立宪会议”上，如果一部分代表提出通过土地社会化法律，但是他们只占会议中的少数，那时布尔什维克将怎么办？是不是弃权？列宁说：“当然不弃权，布尔什维克将投票赞成这个法律，但是要预先声明，我们投票赞成这个法律是为了支持农民反对他们的敌人。”^① 1918年1月，列宁领导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规定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如前所述，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体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革命纲领，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这说明，列宁和俄共（布）在十月革命时期鉴于在俄国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成熟，鉴于农民迫切需要得到土地，鉴于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性，以非社会主义的途径照顾和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要求。当党内有人提出异议时，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签署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因为我们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

列宁要求农民支持工人阶级及其执政党将革命推向前进。如前所述，列宁在1917年11月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以会议的名义宣布，农民非常代表大会完全拥护10月25日革命，体现出他肯定并且期盼农民支持十月革命的心境。同年12月中旬，他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进一步向农民表达了这样的要求。当时对待“立宪会议”相关问题的态度成为重大的的是非问题。十月革命前，由于右派社会革命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和出卖农民利益的面目尚未暴露，许多人被农民选举为立宪会议的代表。如果不揭露右派社会革命党的面目，不使农民认识他们并同他们划清界限，则不利于革命的进展。由此，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指出：农民在十月革命前拟定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的名单时，不可能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右派社会革命党靠欺骗才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决不能让这种欺骗继续下去，决不能让它产生严重的后果，必须公布他们的名单，使他们退出立宪会议，改选立宪会议的代表。他呼吁：“农民同志们！现在有许多事情都要靠你们一句有份量的坚决果断的话来决定，能不能停止这场内战，俄国能不能和平地实现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劳动者，能不能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都要靠你们一句话来决定。”^② 他还说，农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构成我国军队的基本群众，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说出自己有分量的、决定性的意见”。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对农民政治上的信任和期待农民支持革命的心情。

（二）以工人阶级支持贫苦农民同富农作斗争和农村向城市提供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工农联盟

1918年夏至1920年底，苏俄处于国内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国内的白卫分子如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先后在西北地区、远东和南部地区发动反革命叛乱，颠覆当地苏维埃政权。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将干涉军开进俄国，支持各地的白卫分子叛乱。在国内各大城市，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极力从事破坏活动，炸毁工厂和桥梁，杀害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在农村，富农掀起暴动，破坏农业生产工具，烧毁国家的粮食仓库等等。在国内外敌人的联合攻击下，苏维埃政权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列宁认识到，只有实现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巩固苏维埃政权。1918年7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只有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即不搞粮食投机的农村劳动群众结成联盟，才能拯救革命。”^①同年11月，他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富农以及国内的各种反革命分子都盼望着外国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颠覆苏维埃政权，恢复旧的制度，“唯一的生路是农村同城市联合起来，农村的无产阶级分子和不使用别人劳动的半无产阶级分子同城市的工人一道向富农和寄生虫进军。”^②1919年5月，他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只有通过劳动农民和工人的联盟，才能保卫住社会革命的果实……同工人结成联盟，对农民来说比同任何人结成联盟的好处都要多，因此，有觉悟的农民一定会同工人结成联盟。”^③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由于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的积极工作，工农联盟适时形成并日趋巩固。列宁看到并且肯定了这一点。如他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只是城市无产阶级同农民的亲密团结才使我们的政权得以巩固，只有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370页。

阶级，在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才坚持了反对一切敌人的斗争。”^①

列宁认识到，这一时期苏俄工农联盟的一方面内容是工人阶级支持贫苦农民对富农进行斗争。富农是苏俄农村的资产者。他们剥削他人的劳动，欺压贫苦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从1918年春天起，苏俄出现严重饥荒，富农囤积居奇，进行粮食投机，加剧了工农群众生活的困难。国内战争爆发后，战场前线需要粮食，城市人民的生活需要粮食，但是富农拒绝将粮食出售给国家。当时，为了改变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改变他们生活贫困的状态，改变国家粮食工作中的困难局面，党和苏维埃政权派遣优秀的工人到农村去，组织贫苦农民，支持他们同富农进行斗争。列宁认识到，这是这一时期工农联盟的一方面内容。1918年11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工人下乡是去反击那些乘人民快要饿死之机搞粮食投机来大发横财的农村剥削者——富农。他们下乡是去帮助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劳动者。他们没有白去，他们伸出了联盟之手，他们的准备工作同群众结合起来了。”^②他还说，由于下乡工人的工作，贫苦农民懂得了同富农作斗争的意义，懂得了要摆脱自己受剥削的地位和自己生活困难的状态，就决不能跟着资产阶级走，不能跟着富农走，而只能跟着工人阶级走。同一时期，他在其他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贫苦农民在同富农的斗争中，有可靠而强大的同盟者。贫苦农民知道，城市是支持他们的，无产阶级会尽力帮助他们的，并且实际上已经在帮助他们。”^③这一时期，列宁强调中农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中农。1919年3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下乡的工人党员必须设法同中农建立同志关系，必须记住，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就是工人的同志，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同他们建立自愿的、完全真诚的、充分信任的联盟。”^④显然，列宁将工人下乡支持贫苦农民的斗争看成为是工人对贫苦农民“伸出了联盟之手”，将城市工人看成为贫苦农民的“强大的同盟者”，主张工人党员下乡以建立同中农的“同志关系”，说明他认识到工人阶级支持贫苦农民以及中农的斗争体现了当时工农联盟的一方面内容。列宁认识到，这一时期苏俄工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④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25页。

农联盟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农村向城市即农民向工人阶级国家提供战争必需的粮食。如前所述，由于富农拒绝将粮食出售给国家，苏维埃政权的征粮工作极为艰难。列宁当时提出，粮食问题成为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基本问题，成为关系苏维埃政权命运的重大问题，围绕着粮食问题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坚持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他认为，农村应该向城市提供粮食，农民应该向工人阶级国家提供粮食。譬如，1919年3月他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写道：“当苏维埃政权认为战胜饥荒是最主要的困难的时候，把全部余粮交给挨饿者是每一个苏维埃公民的职责。这个真理是这样明显，这样清楚，是这样容易为每一个劳动者所理解，因此要反对它是不可能的。”^①这个真理的含义是：工人阶级国家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并且正通过艰苦的革命战争保卫着农民的土地和家园，农民应该向工人阶级国家提供战争必需的粮食。列宁说：“城市工人靠的就是这个真理。他们就是靠这个明显的真理才能从事最困难的工作。”^②值得指出的是，在列宁的思想上，农民向工人阶级国家提供粮食，或者说正确地解决粮食问题，是这一时期工农联盟的一方面内容。如他上述文章中提出：“所有的告城市工人书都说：要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否则，你们就不能解决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粮食问题。”他还提出：“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会胜利；或者你们去接受资本家及其穿着孟什维克服装的走狗和奴仆开导和教诲——‘不要让城市掠夺你们，你们自由买卖吧……’那你们自己就会灭亡，成为资本家的奴隶，使苏维埃俄国遭到毁灭。”^③同年6月，他在有关著作中提出，农民面临着二者择一：或者是赞成粮食自由贸易——这是赞成恢复地主资本家的制度，赞成破坏农民同工人的联盟；“或者是赞成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即卖给统一的工人政权，——这就是赞成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消除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任何可能性。”^④在上述场合，列宁把粮食问题的解决同工农联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看成为工农联盟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看成为工农联盟的一方面内容了。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对于农民的觉悟以及他们愿意同城市工人结成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④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联盟并向工人阶级国家提供粮食充满信心。1919年7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从1917年8月至1918年8月，国家收购到3000万普特粮食，而在1918年8月至1919年5月，国家收购到1亿普特粮食，这说明国家的征粮工作有大大的进步，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将粮食卖给工人阶级国家了。他在这里指出：“我们知道，每一个靠劳动和血汗勉强过活的农民都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是同情无产阶级的（虽然这种同情是模糊的、出自本能的），因为他们看到无产阶级将毕生精力、满腔热血都献给了推翻资本的事业。”^①同年11月，他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旧俄国，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最深，近年来白卫分子的叛乱使他们获得了必要的感受，使他们特别珍惜十月革命以来已经争得的东西，使他们认识到争得的成果还未巩固起来，因为旧制度复辟的危险继续存在着。他说：“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地主资本家政权怎样威胁着他们，他们就会极忠实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了。苏维埃政权正一个月比一个月巩固，从前辛苦劳动、遭受剥削、饱尝地主资本家压迫之苦的农民的觉悟，也一个月比一个月提高。”^②

（三）以工人阶级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并领导农民建设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工农经济联盟

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工人阶级由于实现了同农民的联盟，形成了强大的力量，粉碎了国内外敌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图谋。可是，这一时期苏维埃国家采取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等，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内战争结束时，农民苦于生活困难，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不满情绪。农村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不断发生农民骚动的事件。这说明，苏俄的工农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之中。1921年春即随着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阐述了改善工农关系并建设新的工农联盟的思想。1921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提出，由于战争、经济破坏、战时政策和歉收，农民的处境特别困难，不可避免地使有的农民发生了政治上的动摇，所以必须认真地考察工农关系，修正和改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善它们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大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证明工人阶级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同一时期，他在《论粮食税》一书中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应当善于领导政治和指导政治，而当前的重大政治就是立即提高农民的经济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同年12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弄清楚新经济政策的本质问题，“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艰苦而有成效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搞好工作，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而粗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向他们证明，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而不管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①他还明确地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的结合。”^②“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在帮助这个社会创造工农联盟的形式。我们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一定会建立起一个十分牢固的、世界上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工农联盟。”^③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这一时期的工农联盟称为“工农经济联盟”。他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而当我们真正彻底地肃清了外来的敌人时（这到1921年才成为事实），我们就面临一项新任务；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上的联盟。”^④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他还提出：“在我们共和国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实行过工农的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1921年我们第一次实行了工农的经济联盟。”^⑤他的意思是说，这一时期以前苏俄的工农联盟，产生的条件是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它的意义也在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当前的工农联盟，产生的条件则是苏俄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的实践，它的意义则直接地表现为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顺利进展。列宁认为，这一时期工农经济联盟的一方面内容是工人阶级及其国家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在党的十大报告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⑤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中，列宁提出，工人阶级及其国家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实际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农民：一是需要有商品交换或流转的自由，即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二是必须弄到商品，即对农村供应商品，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求。在《论粮食税》中，他提出，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立即采用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非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他明确地说：“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① 同一时期，他在为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工农联盟。”^② 同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有关报告中说，苏俄的工人和农民都很困苦，工人阶级及其国家可以将困苦分摊到几个阶级身上，分摊的原则和前提是巩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懂得，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来帮助农民。他郑重提出：“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③ 上述列宁的论断说明，他是将帮助农民同巩固工农联盟以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理解的。

列宁认为，这一时期工农经济联盟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一起建设经济。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采取种种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措施，资本主义因素得到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增强。由此产生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较量和竞赛。在这场较量和竞赛中，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广大农民，领导广大农民一起建设经济，才有可能取得胜利。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提出：“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他回答：“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① 他还说：“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② 意思是说，资本家在同工人阶级及其国家政权争夺对农民的控制权和领导权，工人阶级只有及时地将农民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实现对农民的领导，才能处于不败之地。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总结新经济政策一年来的经验时说，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工人阶级及其国家政权以新的方式展开经济建设，它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使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他提出：“我们在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③ 还说：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要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④ 这里，他所谓工人阶级同农民一道建设经济，所谓工人阶级同普通农民汇合起来前进，即指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农民一起推进经济建设。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列宁还指出，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人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工作漠不关心，不从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实。另外一些人则不能正确地看待形势，不能认清工人阶级及其国家在经济上的力量。他说：“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我们击溃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那时，普通农民就会看到，我们在帮助他；那时，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虽然这种步子要慢百倍，却稳当可靠百万倍。”^⑤ 可以看出，列宁是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结合和联盟以及团结和领导农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看待的。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逝世前夕，仍高度地关注工农经济联盟的作用和巩固工农经济联盟的问题。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关于苏俄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条件的著名论断，即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⑤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有了保证”，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我们通过合作社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在这里，列宁高度地评价了工农经济联盟特别是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有了保证”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他提出：“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① 这里，他表达了对巩固工农经济联盟特别是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关心和期望。

七、发展先进文化的尝试与思想

在社会主义史上，列宁和俄共（布）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发展先进文化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当前，研究和了解这个问题，对于我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现实意义极为重大。

（一）革命前对先进文化的认识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列宁和俄共（布）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主张“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19世纪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奥托·鲍威尔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主张社会成员可以自由登记加入任何一个民族，按民族分设学校，针对不同的民族施以不同的教学内容，从而形成所谓“民族文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革命的性质，只有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由此，准备进行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各国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民族文化”，而是能够代表他们共同利益和要求的文化。根据这个思想，列宁1913年在起草的有关文件中提出：“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

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① 在列宁看来，这样的文化，或者体现了一些国家劳动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要求，有利于这些国家民主革命的进行和取得胜利；或者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要求，有利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这种文化虽然被称为“国际文化”，实际上是启发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文化，是每个民族文化中的最先进的内容。如同列宁当时所说的：“国际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②

列宁认为，在各国无产阶级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强调“民族文化”，意在分裂无产阶级的队伍。“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最基本的内容，是主张在同一国家内按民族分设学校，针对不同的民族施以不同的教学内容。如果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時候和一定的条件下，这样做也许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可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样做则可能使同一国家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在生活习俗上距离愈益拉大，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愈益疏远，甚至会造成他们相互交往上的矛盾。加上资产阶级分子采取阴谋手段在各个民族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挑拨，无产阶级的队伍很有可能出现分裂。近代社会以来，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欺骗而在战场上刀枪相见，不乏其例。当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队伍发生分裂时，资产阶级统治者则可进行种种交易，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满足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利益。针对此，列宁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无论在奥地利还是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奴隶主大做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交易。”^③ 他提出：“工人决不允许用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自治’这样的甜言蜜语来分化工人队伍。各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共同的组织内，同心协力地去维护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平等，——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的保证。”^④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调“民族文化自治”，意在用资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民族主义影响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统治。近代社会以来，每一个民族都有无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者。资产阶级分子在强调“民族文化自治”时，有意掩盖各个民族中存在着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族文化以及两者之间尖锐矛盾的事实。可是这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和其他各种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够对无产阶级施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迫使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许多人接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统治。针对此，列宁指出：“‘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以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幻觉来欺骗工人，而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化’。”^①“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②他还说，提倡这种民族文化的直接后果，一是违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原则，二是容易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三是妨碍人民群众彻底地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这个时期，即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列宁就已提出，必须提倡先进的文化，即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用这种文化教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他要求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民族文化自治”，认为这是一种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欺骗和分裂无产阶级的、腐朽而没落的文化。这一思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于它的现实意义。

（二）革命胜利初期发展先进文化的尝试

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列宁和俄共（布）利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条件，为发展先进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他们从理论上搞清楚了以下问题：

第一，先进文化是人类在旧社会创造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新旧事物之间是辩证否定的关系。如同新社会制度是对旧社会制度的辩证否定一样，新社会制度下的先进文化也是对旧文化的辩证否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定。所谓辩证否定，指否定和抛弃其糟粕，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的内容。列宁1920年10月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他举例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之所以是先进文化，是因为马克思以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全部知识为基础，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化知识，马克思都有批判地进行探讨，在工人运动中进行检验，得出新的结论。由这个历史事实出发，列宁论述了无产阶级建设先进文化的任务，说：“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②

同一时期，列宁在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他提出：“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或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③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正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先进文化。接着他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先进文化，赢得了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④。在他看来，苏俄无产阶级只有坚持这样的方法，按照这样的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努力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才能发展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

第二，苏维埃制度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发展。在旧社会，由于传播文化知识的手段如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文学艺术、新闻舆论工具等主要地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所以只有有产者才享有获得文化知识的权利，广大的劳动人民则没有这种权利。有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政治统治地位，把文化知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页。

④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页。

识变成了从思想上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变成了有产者剥削和压迫工具的组成部分。在俄国，由于苏维埃制度的建立，传播文化知识的手段掌握在了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先进文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1918年1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去，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①意思是说，苏维埃制度改变了文化的性质，产生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党和政权决定实施工人监督的措施，即在工矿企业建立工人团体或组织，由这些团体或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账目进行计算。实施这项措施，要求工人群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懂得必要的管理知识。由于这样，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和掌握管理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可以说，这是当时发展先进文化的动力和条件。1918年春天，列宁在领导党和国家政权把工作重心转向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在有关文章中论及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时说，广大劳动群众强烈地要求学习，要求掌握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他们知道只有掌握知识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同年8月，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取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都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知道，要使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是多么地需要教育。”^②1919年1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讲到社会教育工作时，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说：“在社会教育工作中，你们会得到劳动群众的配合，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求知欲，这就使你们易于找到和他们联系的形式。”^③在列宁看来，广大劳动群众所需要的文化知识，是能够使他们在获得解放的文化知识，也就是所谓先进文化，当时劳动群众广泛的需要必然带来先进文化的发展。

从实践上看，列宁和党当时采取了下述重要措施：

第一，利用现成学校的作用，推进教育工作和发展先进文化。苏维埃国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2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家当时的各级各类学校，基本上是旧俄国已有的学校，或者说是现成的学校。在旧俄国，它们是有利于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之一。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和党主张把现成学校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发展先进文化的工具。1919年2月，列宁在起草《俄共（布）纲领草案》时写道：“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和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①在这里，列宁和俄共（布）主张利用现成学校的作用，在工农群众中传播共产主义的原则，对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明确而深刻地体现出他们主张利用现成学校传播和发展先进文化。

利用现成学校的作用，必然地要求利用和发挥教师的作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一些教师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政治谣言的欺骗，对无产阶级革命不理解，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不支持的态度。对于这些教师，列宁的看法是，他们在旧社会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数额不多的薪水，同无产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要实行正确的政策，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团结、帮助和教育，绝大多数人能够转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来。事实果然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许多教师改变立场，逐渐靠近了苏维埃政权。就此，列宁1918年6月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说过去教师在下决心和苏维埃政权合作方面做得很慢，“现在大家愈来愈相信这种合作是必要的了”^②。1919年1月，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肯定地说：“大多数教师是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紧紧站在一起的，他们现在都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有其深刻的根源，深信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扩展到全世界。因此我认为，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教师是一定会真心实意地拥护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页。

的。”^① 这一论断，体现了他对苏俄现成教师队伍的充分信任。在列宁看来，在团结和争取旧社会过来的一批教师的同时，党和国家应该培养一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新教师队伍。1920年11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② 在列宁看来，信任现成教师队伍并发挥其作用，加上建设一支新的教师队伍，传播和发展先进文化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第二，发展社会教育，促进先进文化。当时所谓社会教育，指学校教育以外的、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的教育，是把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教育工作。列宁和党主张通过成人教育学校推进这一工作。在列宁起草的供党的八大讨论和通过的党纲草案中提出，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包括创办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等等。党的八大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载入了这样的条文。列宁主张通过报纸推进这一工作。1921年2月，他在《论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报纸是统治阶级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十月革命后，“我们开始使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在赶跑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怎样生活，怎样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③ 当时，《消息报》的发行量是35万份，《真理报》的发行量是25万份，它们对于推进社会教育和传播先进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列宁要求进一步办好这两份报纸，如要求它们少发表一些“空泛议论和抽象口号”式的文章，多发表一些“切实的、在行的、适合群众水平”的文章，要求增设文化知识教育的栏目，“通过这两种报纸每天都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优秀的和古典的文学作品、普通教育的教材、农业教材和工业教材。”^④ 列宁主张通过编写和发行工农读物推进这一工作。1918年12月，他就编写一套工农读物作了具体的指示，并且亲自拟定了一系列题目，如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国家，土地法，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国有化，劳动纪律，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④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页。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我们是怎样提出和约的，什么是共产主义，政教分离等等，还特别提出：“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该读物提供的材料应当做到可供当众宣讲，也可供家庭阅读，可以单篇翻印，也可以稍加补充译成其他语言。”^① 要想达到用工农读物推进社会教育和发展先进文化的目的，必须搞好读物发行工作。从这一点出发，列宁提出在全国建立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有组织地、合理地把读物送到这些网点，供工农群众阅读。他说：我们将把读物合理地分配下去，“分配给合理地地为全国，为广大工人、士兵和农民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那时人民就会以百倍的干劲、百倍的速度、百倍的成效来要求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识。”^②

第三，利用旧社会过来的科技专家，建设新经济和发展新文化。在苏维埃国家，建设新经济和发展新文化是完全一致的。无论从哪个任务看，利用旧社会过来的科技专家，都是非常必要的。1918年春党和国家转变工作重心时，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即已提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③ 利用旧专家，意味着国家要拿出一大笔钱，付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列宁针对这个问题说，假设苏维埃国家需要1000名各种学术和技术专家，假设国家需要给他们每人每年25000卢布，假设这个数目再增加三倍，国家每年要付出1亿卢布，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了解到因为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得不每年损失数十亿卢布。在国内战过程中，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斗争。建设红军和组织生产需要一大批专家。只有利用这些专家的作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夯实新经济和新文化的基础。这时列宁和党提出，必须大胆利用旧社会的遗产。列宁说：“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大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都用起来。”^④ 党内有的人对此有异议。列宁说：“是我们抛弃过去的偏见、号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专家参加我们工作的时候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④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了。我们的一切集体管理机构，我们所有身为共产党员的工作者，都必须了解这一点。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我们的胜利才有保证。”^①过去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赞成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才建设新社会，而幻想在某种特别的环境里培养出某种特别高尚的人才，利用这种人才建设新社会。列宁针对此说：“现在，这种可笑的想法，人人都觉得可笑，人人都加以唾弃。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善于认真思考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②这里的意思，一是肯定马克思主义主张利用旧的人才即利用资本主义社会过来的专家，为建设新的经济和新文化服务，二是认为国家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对此认识不足，需要提高认识并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三）晚年发展先进文化的思想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的举行，使苏维埃俄国的体制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列宁和党将发展先进文化的思想和实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把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新经济政策，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即先进文化的任务。在此以前的国内战争时期，党和国家政权迫于战争的形势和支持战争的需要，在经济生活中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如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普遍的工业国有化等等。从客观上看，这些非常措施具有消灭资本主义或对资本主义采取进攻态势的性质。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允许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允许自由贸易，具有对资本主义让步或“战略退却”的性质。对于国家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这一转变，党内许多人不能正确地认识。有的人提出，列宁和党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路线，俄国正在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十月革命的成果将一步步丧失。针对此，列宁和党提出，必须正确地认识新经济政策，而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即先进文化的任务。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页。

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①“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②实现了政策转变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③这些论断的含义，都是把完成文化任务与实现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的正确认识联系起来，把后者提高到完成文化任务的高度来认识。

第二，着眼于顺利地实施新经济政策，提出发展先进文化的任务。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实践中的最大困难，是做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不懂得和不胜任经济工作。由此看，提高管理干部的经济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是当务之急。列宁和党从发展无产阶级的管理文化或先进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这项任务。列宁当时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党和国家的管理者将同资本家包括国外的资本家打交道，资本家将通过国家的有关政策得到好处，但是党和国家的管理者一定要跟资本家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还说：“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④这里他提出向做经济工作的科学进军，具有发展管理文化或先进文化的意义。而且他在这里还明确地说：“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⑤可见，在列宁看来，当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方式包含着文化问题。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面前有三大问题，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三大敌人”：一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或者说官僚主义；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列宁和党认为，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提高文化水平或者说发展先进文化。文盲者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管理。当时俄国文盲者甚多，极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针对此，列宁提出：“我们需要大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⑤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194页。

大提高文化水平。”“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①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受贿行为，本来可以利用苏维埃法律来进行。可是，当时广大工农群众甚至相当多的共产党员因为文化水平低，不懂得利用苏维埃法律去进行斗争。鉴于此，列宁提出用提高文化水平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方面的斗争。他说：“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②他还指出，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那样迅速，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党和国家要根据这个特点规划自己的工作，发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开展工作，完成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或者说先进文化的任务。

第三，通过宣传电气化计划发展先进文化。1920年初，列宁提出制定全俄电气化计划的任务。国家集中200多名科学技术专家，进行大量的工作，于年底编制出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电气化计划》，并由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该计划规定，除恢复和改建现有的电站以外，在10—15年以内新建30个区域电站，包括20个火电站和10个水电站。列宁称这个计划为俄共（布）的“第二个党纲”，要求大力宣传这个计划。他在为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有关决议草案中提出：“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学习这个计划，每座电站和每个办得还可以的工厂和国营农场都应当成为介绍电和现代工业的中心，成为宣传电气化计划并且系统地讲解这个计划的中心。”^③当时的这个电气化计划，是新的科学技术的结晶，而且具有“第二个党纲”的意义，可以说是先进文化的体现。列宁和党要求宣传这个计划，等于要求宣传先进文化和发展先进文化。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列宁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1921年12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宣传电气化计划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因此要求每个电站动员一切适当的人力经常举办座谈会、讲座、实习课，向工人农民介绍电的常识、电的意义和电气化计划，尚没有电站的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县要尽快办起电站，并使它成为宣传电气化计划的中心。1922年初，列宁委托伊·斯捷潘诺夫同志写作《俄罗斯联邦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这本书写作完成后，列宁非常高兴地为之作序，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宣传电气化的参考书。他说：“我们应当并且一定能够做到：使每个县图书馆（以后是每个乡图书馆）有几本这种‘参考书’；使俄国的每个发电站（总共有800多个）不仅有这本书，而且还一定要举办关于电力、关于俄罗斯电气化以及关于一般技术的大众通俗讲座。”^①同时他说：“我们是贫困的和文化落后的人。这没有关系。但要认识到必须学习。要乐意学习。”^②这里所说的学习，指学习电气化计划，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或者说指学习和发展先进文化。

八、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重要思想

1921年春，苏俄的历史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一时期，国内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作为执政党的俄共（布），内部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这样，党如何执政和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到了俄共（布）面前。列宁领导党积极地进行实践，形成和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一）执政党决不能忽视前进道路上的“危险”

随着历史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布）和无产阶级政权面前先后出现了三种危险。一种危险是战争、战时共产主义和经济破坏带来的危险。由于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的国内战争，苏俄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之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措施，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国内战争结束时，农民、工人因为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情绪。旧制度的残余分子趁机进行煽动，力图颠覆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和苏维埃政权，恢复旧的制度。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实说明，俄共（布）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危险。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列宁要求俄共（布）高度地关注这种危险性，加强团结和统一，努力战胜它。他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说：“这种政治上的危险性现在是存在的。许多革命都清清楚楚地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也经常指出这条道路的危险性。这条道路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者，决不能采取我们这一年来经常采取的那种态度（即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争论——引者注）。这种危险性无疑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① 他还说：“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还有各种阶级存在，不能忘记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势力是导致白卫分子卷土重来的政治跳板。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个问题，应当认识到，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要有高度的团结、沉着和纪律，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要有一套办法，这些办法过去只是由于战争而没有能够实行。”^② 以上援引的论断说明，列宁看到了国内战争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党面临的一种危险，即旧制度的残余势力利用国内经济困难和人民的不满情绪煽动颠覆活动带来的危险。他针对这种危险提出的措施是：加强党内团结，严格党内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同时党代表农民、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改变经济政策，即尽快将国家的发展轨道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在党的十大上和十大以后，上述列宁的思想得到了贯彻执行。

另一种危险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而形成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实行粮食税制，允许自由贸易，鼓励城市小型私人工商企业发展，将一部分国家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国有企业租借给外国资本家，将另外一部分国有企业租借给国内资本家，在国有企业贯彻商业原则即物质利益的原则等等。由于实行这些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因素增长起来。显然，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给苏维埃政权和俄共（布）带来了危险。

列宁要求党高度重视和努力克服这种危险。同年10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③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楚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① 这里他所谓“谁战胜谁”和“谁将取得胜利”，着眼点不在于政治斗争上，而在于经济发展上。从政治斗争上看，共产党有国家政权，完全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击败资产阶级。但是从经济上看，问题则复杂得多。实行新经济政策，说明共产党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但是如果共产党不善于领导经济，不能够驾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不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服务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将首先表现为共产党人在经济工作中处处被动，他们不能利用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所利用，甚至会导致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危险。所以列宁说，“必须清楚地看待这些事情”，“必须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实施新经济政策已经一年了，共产党人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拥有发展经济的许多有利的条件和手段，然而由于他们不懂得经营和做生意，国家的经济建设没有完全按照共产党人的意志前进。它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共产党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共产党人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可见，共产党面前的危险非常之大。列宁说：“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这里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② 还说：“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会得胜？我说的是竞赛。”^③ 这里，列宁又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指出了共产党人面临的危险。

然而经济领域的危险，最终会演变为政治上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占据优势地位，持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它们必然会谋求政治权力，从政治领域向共产党发起攻击，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面临危险。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① “不论目前还是今后，斗争都比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更加激烈、更加残酷。”^② “完成军事任务毕竟要比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人们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③ 这里所谓“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指从政治斗争的领域看，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危险。就这个问题，列宁还明确地说：“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像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④ 第三种危险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存在带来的危险。在国内战争期间，俄共（布）领导人民赶走了国外武装干涉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且当时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国际关系上出现了某种力量“均势”，帝国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次发动对苏俄的战争了。然而只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存在，对俄共（布）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和它的执政地位来说，就是一种危险。列宁认识到这一点。他1921年7月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它们还不能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很不可靠的均势。”^⑤ “必须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均势，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⑥ 意思是说，虽然国际关系上出现了某种“均势”或者说暂时的和平，但是它很不稳定，很不可靠，仍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苏俄无产阶级政权及其执政党，仍然面临着危险。列宁逝世前夕在有关文章再次提出：“我们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现在能不能指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象过去那样，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呢？”^⑦ 他对此存在疑虑，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⑤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⑥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⑦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

说明他十分担心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对苏俄的战争，意识到苏俄的无产阶级政权及其执政党面临着危险。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明确指出俄共（布）前进道路上的危险，既不是制造紧张气氛，也不是散布灰心失望心理，而是力图使党的领导者和全体党员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关注事态的变化，克服“危险”，巩固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二）执政党“领导政治”的当务之急：调整工农关系

1920年底1921年初，苏俄的工农关系十分紧张。农民苦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怀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农村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骚乱。尤其是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情况更为严重，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有的地区，农民向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党的机关写信，对战时国家的政策提出强烈不满。仅1920年9—12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收到400多封这样的信件。形势清楚地说明，正确处理工农关系成为俄共（布）的当务之急。

列宁针对上述形势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执政党必须领导政治，应当善于指导政治，而这方面的当务之急是调整和改善工农关系。他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论及党决定将过去的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时说：“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①这里，他已把考察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看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随后，他在《论粮食税》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②这里他所谓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和无产阶级善于指导政治，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实质上是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执政的共产党对政治的领导和指导。而当时对政治的领导和指导的具体内容，就是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巩固工农联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言以蔽之，就是调整和改善工农关系。

直观地看列宁关于执政党领导政治、指导政治和调整、改善工农关系的思想，其意义和着力点在于把广大农民拉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一边来。如前所述，当时工农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农村时有农民骚动和暴动的事件发生，而这无疑证明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的对立面上了。所以，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讲到必须把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时对大会代表说：“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好多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①在他看来，只有调整和改善工农关系，才能把农民拉到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方面来。只有把农民拉到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方面来，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达到改善执政党和无产阶级同农民关系的目的，列宁提出，必须同农民妥协。他说：“妥协，这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革命。”^②

就上述列宁关于执政党领导政治、指导政治和调整、改善工农关系的思想，作深入的理论解读，可能看出，它的意义和着力点在于使工农之间的军事联盟和粗糙的经济联盟转向正常的工农经济联盟。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面临着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进攻，工农之间结成了军事联盟，即共同对国内外资产阶级进行战争的联盟。这是苏俄两个主要阶级之间联盟的“初步形式”。即便是初步的形式，也需要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这样，当时两个阶级之间形成了一种粗糙的经济联盟，它的内容是：农民从无产阶级及其政权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并且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得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及红军的保护；无产阶级及其政权则从农民那里得到了进行革命战争所需要的粮食。历史事实说明，这种粗糙的联盟关系是农民不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愿意接受的。列宁说：“我们承认联盟最初的形式是很粗陋的，我们犯过很多很多错误。”^① 1921年春，列宁通过对过去工农之间的军事联盟及粗糙的经济联盟的反思，提出执政党必须领导政治、指导政治和调整、改善工农关系，意思是指将过去的军事联盟及粗糙的经济联盟转向正常的经济联盟。如他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粮食税的作用时说：“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看，只有实物税才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有这样做才能给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② 关于这种联盟的实现形式，列宁还说：“社会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占很大一个少数的国家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存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形式。”^③ 意思是说，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工业产品同农民的劳动产品之间进行交换，就是所谓工农的经济联盟。

综上所述，列宁强调执政党和无产阶级领导政治和进行政治指导，调整和改善工农关系，把广大农民拉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一边来，或者将过去的军事联盟（包括粗糙的经济联盟）转变为工农经济联盟，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因为苏俄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政治倾向如何，关系到俄共（布）的执政地位能否得以巩固。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列宁提出：“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④

（三）执政党要善于“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布）要领导无产阶级开展经济建设，要使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资产阶级则要发展资本主义，要使经济发展有利于自己发财致富。于是在经济发展中，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之间利用与反利用的斗争十分激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说，共产党员担任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着各个经济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职务，可是由于他们不会做经济工作，所以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资产者有时把共产党员推到前面当作招牌或挡箭牌，自己在后面干不法的勾当。针对这种状况，列宁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变被动为主动，要善于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① 还说：“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② 在列宁的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说明共产党善于执掌政权，能够有效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列宁的这一思想，包括下述重要的内容：

第一，共产党员必须向资产者学习做经济工作并且同他们展开竞赛。他在有关文章中对党的干部说：“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一定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③ 他还说：“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④ 在列宁看来，学会经商是学习做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商业。可是俄国经济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的国情，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充分发展商业，利用商业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由此，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学会了解商业关系和经商是我们的责任。而只有开门见山地指明这个任务，我们才能开始有成效地学并最终学会。……商业问题成了党的一个实际问题，成了经济建设的一个实际问题。”^⑤ 列宁提出，共产党员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同资产者竞赛，并且赛过他们。他举例说，资产者到农民那里去，不是去同共产党员争论什么是共产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⑤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主义，而是去争论农民需要商品，需要交易得好，那可以由我们来承办，如果让共产党员来办，也许贵一些，甚至贵上十倍，而且交易过程不会顺畅。由此共产党员必须同资产者在商品交换方面展开竞赛。列宁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①

第二，必须将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有小经济的发展，有自由贸易，就会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所指明的。可是，无产阶级执政党不能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如果硬要堵塞的话，那说明它或者是在自杀，或者是在干蠢事。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确有许多弊端，如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是图，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等等。列宁说：“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②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投机倒把、盗窃公物、逃避国家监督的现象十分严重。列宁提出，必须加强计算和监督工作，并说：“我们要通过实行这样的监督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③ 在列宁看来，如果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则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监督它和制约它，从而克服它的弊端，利用它的作用。

第三，利用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法规制约资本家的活动。苏维埃国家诞生以后，立法机关为建立和健全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了不断的努力，特别在经济立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已经能够运用经济法规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这时，列宁要求严格执行有关的经济法规，制约资本家的活动。在1921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大会起草了《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在这个指令中，他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狠抓两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要让共和国人民法院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始终不渝地遵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

守共和国的法律，有半点偏离都要严加惩处”^①。这说明，列宁对经济执法的要求，一是严，二是准。所谓“严”，表现为对法律“有半点偏离”都要“严加惩处”。所谓“准”，表现为要求执法适当，不允许对工商业者的正当的经济活动作“任何限制”。1922年2月，列宁就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下的任务问题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写信，批评了该部工作中的缺点，阐明了自己关于加强经济执法的观点。他指出，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法制工作中软弱无力，精神不振，没有积极推动人民法院惩治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他认为，在国家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国家司法部门应该对所有的私营企业主宣告：“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②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容许私营经济发展，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但国家必须用经济法规来规范私营企业主的经济活动，使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

（四）清除党内“最可恶的敌人”——官僚主义者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布）内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在眉睫的背景下，党的一些领导者轻视经济工作，不愿意做经济工作，不懂得怎样做经济工作，也不想学习做经济工作。党的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不为经济工作服务，不做实事，或者没完没了地开会，下发许多对基层工作无意义的文件，或者想出新花样，成立新的委员会，或者关闭在机关内制定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不相适应的计划。有些握有较大权力的党政领导者，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败坏了执政党的声誉和形象。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者。1921年10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党内存在“三大敌人”时，认为其中一个敌人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另一个敌人是“贪污受贿”。实际上，这里所指的两个敌人都是党内的“官僚主义者”。1922年3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没有学会同拖拉现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象作斗争，他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为之掩护。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①同一时期，他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说，当时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准备从法国购买一批罐头食品，法国商人已来到莫斯科，同意用苏维埃卢布结算，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简单的事，可是有关方面就此向党中央政治局递送报告，政治局会议专门做出了同意购买的决议，此后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先后作两次调查，分别写出调查报告，送呈政治局，由政治局再下指令，这才买下了这批罐头。列宁就此说，苏维埃国家买一批罐头竟如此困难，原因在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其机关工作者不会做生意，在革命胜利几年后发生这样的事，说明党和国家机关受到官僚主义的侵害。

列宁主张通过清理和整顿党的队伍的方式，将官僚主义者清除出党。从1921年8月到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前夕，俄共（布）开展了清理党的队伍和整顿党的组织的工作。列宁在此工作过程中提出，必须通过这个工作把“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清除出党。他还提出：“依靠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这是最可贵、最重要的。”^②在他看来，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谁是“欺骗分子”和“官僚化分子”。俄共（布）按照列宁的思想进行了这项工作，清除了一批官僚主义者，纯洁了党的队伍，整顿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

列宁主张利用法制的力量打击官僚主义者。如前所述，在1921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大会起草了《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在这个指令中，他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狠抓两件事，其中第二件事是：“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③他说：“审判这类案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提高人们过问这种目前很难对付的坏事的责任心，可以引起工农群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注意，可以达到取得更大经济成就的实际目的。”^④同一时期，莫斯科自来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水厂的工程师奥登博格自杀。调查的结果表明，他是一名精通业务并且高度忠于职守的科技工作者，其死因是有关党员干部对他采取了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不断迫害的行为。列宁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起草了关于这一案件的决定草案。他提出：“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特别用心、妥善和声势浩大地审理这个案件”，“指示《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一批有分量的文章，评论这个令人气愤的案件”。^① 列宁起草的决议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22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进行了很大声势的审判，判处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党员干部谢杰尔尼科夫监禁1年，对其他4名有责任的、有悔改表现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并剥夺了他们3年的担任苏维埃负责干部的权利。

列宁主张通过加强监察和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列宁领导建立了党的监察机构和工农检查机构。他逝世前夕，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中提出了改革和加强监察、检查工作的思想。他提出，从组织上和工作上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其具体办法是：增选中央监察委员，缩减工农检查院的职员，使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联合办公；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即工农检查院院长）和部务委员仍然领导整个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而且领导“派来”听他调遣的中央监察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分配所有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作；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派成员出席政治局会议和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② 他认为，这一改革有下列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地位和威信。作为政府部级单位的工农检查院，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同党的中央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地位和威信必然得以提高。二是可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质量。三是可以使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增进同群众的联系，更好地了解情况，改进工作。由于工农检查院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机构，是检查和调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查情况的机构，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工农检查院的结合，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的必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工农检查院成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了解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桥梁。从这一点出发，列宁说：“经过这种改革，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中央委员会能增进同群众的联系，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更扎实。”^①显然，上述列宁的思想，着力点在于反对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和官僚主义者。

列宁主张通过提高文化水平的办法消除官僚主义。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列宁在分析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时，往往从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上找原因，认为文化水平低是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他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说，就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工作而言，政治权力完全够了，主要的经济力量如大企业、铁路等也掌握在国家手里，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由此他认为，提高文化水平是反对和消除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这就是他在有关文章中所说的：“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②意思是说，机关工作者由于提高了文化水平，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而且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的素质也会提高，从而有利于他们自觉地克服官僚主义。他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还指出，对于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能胜任的经济工作，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包括在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做，因此应当认真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说，在俄国革命胜利5周年之际，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特别是面对机关工作不能适应经济工作要求的情况，应当学习，必须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③根据列宁的设想，一方面机关工作者加强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对机关工作的检查，促使机关工作者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切实改进工作，则可以达到消除官僚主义的目的。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

第四章 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

一、概 论

(一) 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

斯大林在革命生涯中十分关注东方问题，在许多文章和报告中阐述了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反映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文献主要有：《不要忘记东方》（1918年）、《光明来自东方》（1918年）、《论东方民族大学生的政治任务》（1925年）、《关于东方革命运动》（1925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1927年）、《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等等。研究上述文献，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东方人民已经从数百年的沉睡中醒来，献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世界的光明来自东方。随着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国家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里的人民成为帝国主义者任意宰割的对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了东方人民，使他们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波斯等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就此，斯大林1918年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①“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②这里虽有赞扬十月革命伟大作用的含义，但是肯定东方各族人民已经展开反对帝国主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义的斗争并且成为重要力量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同时斯大林还指出，西方帝国主义者过去一直视东方国家为“可靠的后方”，从东方获取了不可计量的自然资源，如棉花、石油、黄金、煤炭、矿石等等，而且还需要获得东方国家“听话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十分热心地维持东方国家的“秩序和法制”——当然是通过武力来达到这一目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东方人民，使他们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这意味着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它们“可靠的后方”。他说：“必须彻底领悟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①1925年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②

十月革命在俄国胜利后一段时间里，俄国西部的一些地区和国家如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等，资产阶级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力图阻挡来自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浪潮，向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宣战。斯大林当时将这些地区称为“沦陷区”。由于苏维埃俄国榜样的作用，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力，“沦陷区”的革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政府纷纷垮台了。就此斯大林说：“解放运动的浪潮慢慢地然而不是不可遏止地从东方向西方沦陷区奔流。”^③“世界革命的旗手——苏维埃俄国站在所有这些极伟大的事变中心，它鼓舞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对胜利的信心，支持他们为世界社会主义利益而进行的解放斗争。”“光明来自东方！”^④意思是说，世界的光明来自东方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俄罗斯！

第二，充分认识东方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它们面临任务的多样性。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存在于各个地区。在东方，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发展的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别，呈现出发展过程及社会性质的多样性。只有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认识不同国家的不同的革命任务，正确地展开革命运动。斯大林1925年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人们通常总是说东方是一个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大家都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8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页。

明白，单一的、同一式样的东方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殖民地，也有落后的和正在后退的殖民地，对于这些殖民地已经不能用任何同一的尺度去衡量了。”^①斯大林认识到，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有上海、汉口、南京、长沙等城市，有近三百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业无产者，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国则没有这个条件。中国有强大的农民土地革命，就此而言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国也不可比拟。正因为如此，“基马尔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这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土地革命的国家内，才有可能”。^②所谓“基马尔式的革命”，指民族商业资产阶级进行的上层革命，它具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性质，但是在继续发展过程中反对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土地革命。斯大林指出：“在中国不可能有基马尔式的革命，因为：（1）在中国有一定数量的战斗的和积极的工业无产阶级，它在农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2）在中国有展开了的土地革命，它正在扫除自己道路上的封建残余。”^③在东方，还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日本。斯大林认识到，日本人民是东方各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人民”，但是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使日本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成为奴役东方人民的工具。对日本人民来说，“出路只有一条：按照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改变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④

在东方，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及其各个加盟共和国，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斯大林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25年5月，他在东方劳动者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中提出：“如果分析一下东方劳动者大学的成分，那就不能不发觉这个成分的某种两重性。这个大学里有不下五十个东方民族和民族集团的代表。这个大学的学生都是东方的儿女。但是这个定义还没有提供任何明确而完整的概念。因为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由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条件的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人是从苏维埃东方，从不再有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并且已经由工人执政的那些国家来的。第二部分学生是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来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1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0页。

的，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仍在统治、帝国主义压迫尚完全保存、还必须赶走帝国主义者以争取独立的那些国家来的。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两个过着不同生活并且在不同条件下发展着的东方。”^①这里所谓“两个”东方，是对两部分性质不同的国家的生动的说明。由此出发，他指出，在各苏维埃国家，当前的任务是在国内建立工业基础，发展农业，推进农业合作化，发展民族文化，加强苏维埃制度的建设。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当前的任务是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联盟并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的领导地位，使城乡小资产阶级摆脱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保证本国解放运动同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等等。

第三，东方一些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在东方一些国家，由于实行封建专制制度，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例如中国。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从而正确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同时，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如他在上述演说中论及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时提出：“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不同的是，这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应该走的方向。”^②在这里，他由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过渡性的工农民主专政——入手，论证了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即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1927年，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中国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此时斯大林在有关文章中提出，中国革命的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斯大林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9页。

引者注) 击败无产阶级, 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 共同进攻革命, 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革命;” “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 巩固自己的领导权, 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 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 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 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二者必居其一。”^① 这里他表达了一种思想, 中国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 击败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并使革命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继续前进。同时斯大林认为,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 大大促进了中国革命走后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走后一条道路并取得胜利而奋斗。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俄罗斯在日益走向社会主义, 俄罗斯东部的突厥语系的民族国家虽然落后但由于得到俄罗斯的帮助也在日益走向社会主义。斯大林 1921 年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 由于没有西方现成的经验而不得不自己进行探索, 因而也犯了一些错误; “突厥语系民族的共产主义则与此不同, 它是在和俄罗斯同志并肩为社会主义而进行实际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它有可能利用俄罗斯同志的实际经验而避免犯错误。这种情况保证东部共产主义完全有可能迅速发展和巩固。”^② 在这里, 斯大林肯定了东部落后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并且肯定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和巩固的可能性。

第四, 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重视解决农民问题, 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东方国家大多数经济比较落后,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 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由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 他们的政治态度及行为如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 所以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时必须重视解决农民问题, 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1923 年,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一文中提出, 在东方国家,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层”, 即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 “这些阶层的重要性是由下面两种情况决定的: 第一, 这些阶层是现今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 或者至少是数量很大的少数; 第二, 它们是资产阶级从中招募军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重

^①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第 199—200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4 页。

要后备力量。如果没有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在我们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内尤其是如此。”^①他认为，过去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如 1848 年巴黎工人的斗争、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和响应而失败的，俄国 1905 年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在 1917 年俄国革命过程中，由于农民举行起义，支持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所以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针对此，斯大林说：“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美结合……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本家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就能够在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②

苏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同样面临一个能否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国内战争时期，苏俄无产阶级同农民建立了军事政治联盟，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此后，无产阶级通过新经济政策满足了农民的利益，实现了工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在新的经济关系上建立了新的工农联盟，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发展了无产阶级事业。斯大林 1921 年 12 月在《前途》一文中就此指出：“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主要是实行军事政治联盟，就是说把地主赶出俄国，把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而当地主为了夺回‘自己的财产’而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对地主作战以捍卫革命成果，因此农民供给工人粮食，并且为军队提供人力。这是一种联盟形式。”^③这是斯大林对国内战争时期工农军事政治联盟的描绘。他接着说：“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土地不会再有危险的时候，旧的联盟形式就不够了。需要有另一种联盟形式。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为农民保持土地，而是要保证农民有自由支配这块土地上的产品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必然使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减，使农业日趋衰落，使运输业和工业瘫痪（由于缺乏粮食），使军队瓦解（由于缺乏粮食），而这一切必然导致工农实际联盟的破裂。”^④这是斯大林对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建立工农之间新联盟形式必要性的正确阐述。当时，党和苏维埃政权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解决了这一问题。斯大林由此说，由工农军事政治联盟向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9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0—141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0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0 页。

新的联盟形式转变，是正确理解新经济政策的钥匙。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解决农民问题和建立工农联盟意义更为重要。可是，在中国革命初期，并不是每个革命者对此都有足够的认识。斯大林1926年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知道在国民党（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引者注）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可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①他认为，为了唤起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者必须走下述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成立农民委员会并使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通过委员会的积极活动影响农民。第二条道路是建立新的人民革命政权机关，使共产党人加入这些机关，使这些机关接近农民群众，使它帮助和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从而影响农民群众。第三条道路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群众，因为农民对新政权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是由他们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这个军队对地主的态度以及看它帮助农民的行动而决定的。

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不久，斯大林即提出了中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的思想。这年4月21日，他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阶段，随着四一二事变的发生中国革命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千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特别是进行土地革命的阶段。当时有人向斯大林提出，现时中国提出夺取地主土地的口号是不是需要的。他回答说：“我认为是需要的。事实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地区内已在实行。在好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惩治自己的敌人，组织自己的自卫力量。我想，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期间都要去实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②

第五，东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建立革命军队和研究军事。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影响和推动，广州革命政府建立了革命军队，并展开了北伐战争。俄共（布）和中共内有的同志对此持不正确认识，认为北伐战争是广州军阀对北方军阀的战争。斯大林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3页。

对此说：“同志们，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国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广州派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点和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①他说，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的革命，通常是大多数人民没有武器或武器很差的情况下举行起义。起义者同旧军队发生冲突，竭力瓦解旧军队，或者把一部分旧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1905年俄国革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②由此出发，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意军队的工作，如要求他们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着手研究军事，不应把军事看成次要的事情，而应把它看成为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不久，有的人提出，在现时的中国能不能提出建立正规红军的问题。斯大林说，立即建立正规红军以取代现有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建立正规红军当前尚没有条件，二是因为武汉的革命政府当前尚没有公开反对革命，他们领导的军队还在进行革命战争。同时斯大林说：“现在主要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组成的新的革命军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他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③在这里，斯大林虽然说立即建立正规红军尚不具备条件，但是他要求为不久以后建立红军奠定基础和作好准备。他的思想实际是共产党人掌握军队和进行军事斗争的思想。

第六，应该反对在东方革命问题上的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行为。例如，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联共（布）内和共产国际内产生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激进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残余或者说不存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9—240页。

在的，或者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所以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是不必要的，当前中国的革命是“反关税的革命”，它的任务是争取关税自主。斯大林批评这种看法，坚持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土 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要不要立即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内一直存在意见分歧。1926年有人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斯大林说，不能离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从中国工业中心的情况看成立苏维埃现在不是迫切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才能进行组织。可以不可说中国农民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现在谈苏维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①在四一二事变以后，在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还保持革命面目的时候，有的人又提出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斯大林说，这时号召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号召举行武装起义以反对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这显然是不适当的。谁这时主张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谁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②有的人提出问题：现在可以不可以提出夺取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口号，能不能提出夺取在中国的外国企业的口号。斯大林回答说，夺取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夺取外国企业，那是以后的事情，因为夺取外国企业等于直接对外国宣战，“我以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当革命还没有巩固的时候，这种办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③可见，在上述问题上，斯大林表示了反对激进主义、冒险主义、主张务实的态度。

（二）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地位

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表现为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个提法的含义在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此前的发展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和思想预见的特点，到斯大林这里，由于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5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1页。

东方的革命实践已经充分展现出来，这个理论则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起着直接指导实践的作用。就此，可以作如下分析：

第一，它适应世界革命的潮流不断向东方发展的实际，反映和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19世纪中后期，世界革命的潮流不断地由西方向东方发展，“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视线也不断地向东方延伸。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关注到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评价了当时俄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预测了俄国革命的走势。20世纪初特别是十月革命时期，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东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掀起的革命运动，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一方面反映和说明了俄国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和说明了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展现得尚不够充分，可供研究的材料尚不够丰富，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的反映和说明，主要的是逻辑推理和思想预见。也就是说，根据俄国革命的事实和材料推理东方其他国家的革命的规律，根据当前事物发展的特征预见它以后的结果。列宁逝世后，特别是1924—1927年，中国的革命走向了高潮，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建立广州革命根据地，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兴起。这时，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一个特点是面对东方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形势，把关注点集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恰当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另一个特点是具体地说明和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例如，它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确认中国革命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研究了中国革命已经走过的路程，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阶段（即中国史学界所说的“大革命”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土地革命的阶段；它明确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以及农民深受剥削的事实，主张进行土地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为穷苦农民所有，发动全体农民参加革命；它认为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武装，研究军事；它提出中国人民在革命过程中只有在时机成熟时才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在条件成熟时才能夺取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本国资本主义企业，切不可在这些问题上“冒进”；它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即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并通过这个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上述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深入探讨并力

图正确地说明这个实践，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第二，它适应苏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的实际，力图反映和说明苏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苏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只是探索了俄国有无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而走特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俄国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提出了苏俄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措施，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未反映出苏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性，所以列宁关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小心谨慎、渐进地、稳妥地发展，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列宁逝世以后，特别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极为严峻，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冒险日益逼近。面对这种形势，苏联必须快速地发展，尽快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增强国防力量。从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发，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战略，规划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例如，斯大林提出，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苏联比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它必须在十年时间内缩短同西方国家之间的距离；实现国家工业化，加强生产资料的生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通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通过开展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强党的建设，培养千百万党的优秀干部，以利于组织好各个领域里的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工农群众在经济上翻身做主人，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上述理论观点是斯大林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而提出的，是苏联当时面临严峻国际形势的必要选择，它适合苏联的实际，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和办法，所以是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历史证明，斯大林的上述理论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使苏联通过十年的时间加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防力量，为后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坚实的物质条件。由此说，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力图反映和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

第三，它反映了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发展和革命的问题，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这些国家实际的紧密结合。关于日本问题，它提出，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使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使日本人民不是成为解

放东方民族的工具，而是成为奴役东方民族的工具。日本人民的出路在于按照日本人民的利益来改变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关于苏联各东方民族的发展，它提出，这些民族的发展已经获得了许多有利条件，如沙皇制度、俄国帝国主义制度、边疆区的剥削制度等已被推翻，但是这些民族能否实现快速发展，经济文化水平能否很快达到苏联的水平，取决于它们对当前有利条件利用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东方民族本身”。关于土耳其的经济状况和革命道路，它提出，不能将土耳其与中国相提并论，土耳其没有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那样的工业中心，安哥拉远不如武汉进步和发达，正像基马尔党的革命性远不如武汉的左派国民党一样。帝国主义已经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等重要的领地，部分地满足了掠夺的欲望。土耳其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既不是重要的市场，也不是重要的投资场所。因此，土耳其远不像中国那样成为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地方，它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远非中国那样激烈和尖锐。这些情况决定了土耳其只能发生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彻底性远不能同中国革命相比拟。上述斯大林的观点说明，他关注到俄国、中国以外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发展和革命的问题，力图正确地、科学地说明这些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这些国家实际的紧密结合。

二、斯大林“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长期以来，斯大林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即“一国能够建成”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但是笔者认为，以往人们对这一理论的了解不够具体和全面，对它的评价不够公正和客观。

（一）“一国能够建成”论的产生和基本内容

在20年代初期，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国国内战争的胜利，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否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问题，终于有了肯定的结论。但是，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却没有定论。列宁在世时，曾指出了苏联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他并未断言苏联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即他并未提出“一国能够建成”论。列宁

在世时以及列宁逝世后不久一段时间，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未提出“一国能够建成”论，相反他们是持几个国家“同时建成”论的。如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指出：“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①这就说明，直到1924年4月，斯大林仍未提出“一国能够建成”论。

1924年秋，俄共（布）内围绕着列宁主义的内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于12月撰写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在此文章里，他提出了“一国能够建成”的最初的思想。他在这里首次提出：列宁于大战期间形成和阐述了“一国首先胜利”论，这一理论既包含有一国可以首先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观点，又包含有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还认为，列宁的这一理论是由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决定的。不平衡规律理论的内容是：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跃进式”地发展，超过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力图夺取新阵地，结果就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军事冲突使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削弱，必然造成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的地方”，在这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②。斯大林说，上述一系列理论观点，都是列宁于大战期间提出的。笔者认为，列宁从未提出过这些理论，这些理论是斯大林的创造。在这一文章里，斯大林运用这些理论来批判托洛茨基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说明他是主张“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论的。

1925年4月，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同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方针。他指出“我们政治实践中最危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6—157页。

^②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险的就是：企图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看做一种被动的东西，以为它在没有得到其他国家胜利了的无产者的援助时只能在原地踏步。假定在俄国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五年到十年内西方还没有爆发革命，……是否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五年到十年内只去干些捣水勾当，而不去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解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可能胜利的理论的全部危险性。”^① 这是对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强有力的肯定。那末苏联一国怎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他说：“我们面前有两个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私有者阶级即农民阶级。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矛盾。人们说：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就是想说：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克服？……是的，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②接着，他分析了苏联无产阶级克服自己同农民的矛盾的可能性，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共同的利益，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说：“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使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是农民，是乐意走第二条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第一条道路指农业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引者注）。因为这条道路是农民摆脱贫困和半饥半饱的生活的唯一生路。不用说，掌握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第二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取得胜利。……可见，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遮盖着他们之间的矛盾。”^③ 这里，斯大林指出了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基本条件和基本力量。

同年6月，斯大林在《问题与答复》的演说中进一步强调：“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④“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⑤

1926年1月，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他在这里承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93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1页。

认，上述他 1924 年 4 月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的那段话“有缺点了”。他说：“这种说法的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就在于它们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予肯定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否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和旧制度复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① 斯大林认为，能否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同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不能因为不能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而否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指出，《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那段话的缺点，就是将上述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

1926 年 12 月 7 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全面地论述了“一国能够建成”论。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他认为，这一标准就是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说：“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② 那末苏联能不能实现这一任务呢？他回答说：“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③ 同时他指出，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从政治上战胜他们，而且是从经济上战胜他们，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他说：“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④ 他论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实现农业和工业结合的方法，说：“为了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有巨大的产品分配机关网，巨大的合作社机关网，即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机关网。”^⑤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35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0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0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1—22 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2 页。

在这里，他论述了苏联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他说：“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但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依赖我们的经济，依赖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木材以及我们广大的市场。”^①又说：“我国依赖其他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丝钉。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②由此他得出结论：苏联能够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这一方面看它能够建成社会主义。

在这里，他估计了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建成的期限。针对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最低限度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的说法，斯大林指出：“在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保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取得胜利”，“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说明我们被击溃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被白匪恐怖制度代替了，白匪恐怖制度可能延长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③

至此，斯大林的“一国能够建成”论，作为一种体系完备的理论，已经产生。

综上所述，斯大林的“一国能够建成”论有以下基本内容：其一，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首先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即能够首先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建成社会主义。其二，社会主义在苏联建成的标准是：苏联无产阶级依靠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关系。其四，苏联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的依赖性，不妨碍苏联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其五，必须把“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同“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两个问题区别开来。

（二）“一国能够建成”论的历史作用和理论缺陷

斯大林的“一国能够建成”论，产生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结束、向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7页。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的时候。当时，革命事业向何处去的问题严峻地提到了党和无产阶级面前，科学地说明这一问题是苏联历史发展的需要。“一国能够建成”论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一，它鼓舞了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激发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苏联人民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中期，他们夺取了政权，巩固了政权，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这时，肯定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既是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心理上的需要。肯定了这一点，就能鼓舞人民的胜利信心，激发人民的社会主义干劲，动员全体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同斯大林所指出的：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明知不能建成，谁还愿意去建设呢？正因为斯大林和党肯定了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所以苏联人民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焕发了冲天的干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运动，使苏联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得以提前完成。

第二，它作为一面旗帜，统一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思想。20年代中期，联共（布）内先后产生了几个反对派，党面临着组织上分裂和思想上瓦解的危险。这时，党需要一面旗帜来促进党的组织统一和思想统一。“一国能够建成”论起到了这样一面旗帜的作用。它批判和战胜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批判和战胜了“新反对派”的投降主义，驳斥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各种不正确的观点，用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与此同时，党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了极少数不肯改正错误的反对派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从而在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巩固了党的团结和实现了党的组织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此后党才有力量领导人民去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第三，它为党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内容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应以不同的思想理论为依据和指导。20年代中期以后，联共（布）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领导人民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党在这以后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一国能够建成”论为理论依据。以这一理论为依据，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能够目标明确、方向正

确。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四，它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坚定革命的意志，推动国际革命。当时，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或低落。如同斯大林指出的：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注视着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成就，期望我们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期望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说明我们在建设战线上的斗争就其使世界各国无产者革命化的作用来说是有巨大的国际意义的。谁企图缩小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谁就是企图打消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国胜利的希望，而谁打消这些希望，谁就是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

斯大林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论，是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的。从总体上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许多国家同时胜利的理论的发展，同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从具体内容上看，若干理论观点也有其理论意义。其一，关于正确处理工农关系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经济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然地有一个如何正确地处理工业同农业、工人同农民的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更没有一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所以未能作深刻的、详尽的探讨和阐述。列宁在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研讨和阐述了当时俄国的工农联盟的问题。但当时俄国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尚未提上日程。苏联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斯大林提出：正确处理工农关系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苏联工农关系的新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团结和领导农民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发展。其二，关于苏联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互关系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问题，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体验和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解决的。列宁在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初步地提出了苏维埃俄国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互依赖的思想。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并且着重地、深刻地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苏联经济的依赖性，从而提出了苏联可以在世界经济交往中保持住经济独立的理论观点。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发展。

斯大林的“一国能够建成”论，是在党内激烈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从它产生的过程看，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论证还不够。所以，“一国能够建成”论存在着以下的理论缺陷：

第一，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可以首先胜利的观点缺乏科学性。这一理论观点强调帝国主义战争对于革命胜利的作用和意义，认为战争使帝国主义相互削弱，可以造成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的地方”，并认为这里的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实践证明，这种观点缺乏科学性。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评二十年联共（布）对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误解》一文中，曾有过论述。笔者的观点是：用“最薄弱的地方”说来说明某个国家社会主义胜利的原因是一种简单化的作法。因为某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各种原因的结果，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原因和国内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国家的民族状况、人口多少、面积大小、地理位置如何等等，都可能对革命能否胜利产生影响。而且，从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看，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最薄弱的地方”，如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都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

第二，一国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的观点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标准是：消灭了阶级统治和消灭了阶级，消灭了私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消失了。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标准时也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①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标准仅仅归结为消灭本国的资产阶级，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标准中关于消灭工农差别和一切阶级差别、消灭阶级统治的科学内容。消灭本国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途径来完成。消灭工农差别和一切阶级差别以及消灭阶级统治，则需要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充分发展生产力，使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化为同一种性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不复存在，这时才有可能实现消灭工农差别和一切阶级差别、消灭阶级统治。可见，斯大林提出的标准大大降低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标准。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273页。

降低了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带来了一系列的历史副作用：

它导致了实践中的急躁冒进。由于确定的标准较低，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社会主义的建成是指日可待的事。所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片面追求高速度，甚至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冒进，以“力争”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如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成的时间，列宁说过，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然而，斯大林则要求在10—20年的时间内建成。无疑，这是急躁冒进的情绪的表现。其所以会产生这种情绪，与所确定的社会主义标准较低有关。

它不利于树立较好的社会主义样板。由于所确定的标准较低，苏联于30年代中期即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这时，苏联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生产力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国力有一定的增强，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工农差别远远没有消失，阶级斗争严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很不健全等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样板，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特别是30年代后期苏联发生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使样板的作用在西方国家人民心目中进一步削弱。对于东方国家的人民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了苏联的样板，照搬了苏联的模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很大的弯路，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其所以会这样，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确定的社会主义标准较低，过早地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

第三，把“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和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区别开来”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如前所述，斯大林认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指在国内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它同免除外国武装干涉是两个相互区别、互不联系的问题。他说：可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可能保证我国不受国际资本的侵犯又是一回事。斯大林认为，这两个问题不能够混淆在一起，谁混淆了这两个问题，“谁就犯了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①他主张将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其意思是说，在确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时，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页。

可以不考虑能否免除外国武装干涉的问题，不能因为不能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而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显然，这是一种理论错误。应该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免除外国武装干涉，是同一个问题中的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更直接地说，免除外国武装干涉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国社会主义能否建成，决定于这个国家能否免除外国的武装干涉。所以说，不能把这两个问题绝对地区别开来，不能不考虑外国武装干涉的问题，孤立地肯定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

由于斯大林没有正确地认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同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对“一国能够建成”论的阐述，常常陷入矛盾之中。如在《问题与答复》中，他一方面认为苏联能够并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与此不同的看法，说：“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如果让我们建设，如果我们能延长‘喘息’时期，如果不发生严重的武装干涉，如果武装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实力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装干涉企图不能实现，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相反地，如果武装干涉得逞而我们被击败，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①显然，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但它是同“一国能够建成”论的体系相悖的。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斯大林指出：“如果大约两年前可以说并且应该说当时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某种均势而‘和平共居’的时期，那末现在我们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肯定说‘和平共居’的时期正在过去，而让位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袭击和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②根据这一论述，苏联将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一论述同斯大林的“一国能够建成”论是相矛盾的。

三、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于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学术界、理论界看法颇不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6页。

一致。本文着眼于其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取向，就这个问题略述管见。

（一）民主的趋向与“不稳定”的矛盾：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的政治根源和社会根源

十月革命胜利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苏维埃俄国体现出明显的民主趋向。

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过程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而是实行集体领导，体现出民主趋向。1917年12月至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党的主要领导人列宁当时主张签订和约，这是一种正确的意见。“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是在1918年1月21日党中央讨论签订和约问题的会议上，“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出席者的支持，支持列宁正确意见的反而只占少数。列宁并没有以主要领导人的身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年1月24日、2月1日、17日、18日，党中央连续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和平谈判和签订和约的问题。列宁的正确意见仍然没有被会议所接受。列宁仍然没有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其他中央领导人。只是列宁会后耐心的思想工作，原来不赞成列宁意见的同志才逐步站到了列宁一边。1918年3月6—8日，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在大会上，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案以绝大多数代表的赞成而通过。随后举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大会上，除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主张签订和约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均反对签订和约。大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辩论，最后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决议。以上的事实说明，在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不是少数人说了算，也不是一个党说了算，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充分地表达出来，展开讨论和辩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这就是党和国家政权工作中的民主趋向。

1920年11月以后，俄共（布）内发生了持续4个月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也证明了党内生活的民主趋向。当年11月3日，托洛茨基在有关会议上提出必须整顿工会，消除旧残余，实行工会国家化，即按工业部门将工会与国家经济管理机关融为一体，以此实行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12月24

日，党的中央全会决定将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1921年1月12日中央全会重申，必须完全自由地进行讨论，任何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讨论过程中，党内先后有8个派别就工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以列宁、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十人纲领”。在稍后举行的党的十大上，各个不同的派别均就工会问题作了报告或副报告。大会表决时，“十人纲领”获得336票，其他派别的纲领分别获得50票、18票等等。这个事实也证明，当时党内生活中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就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这是党内生活中的民主趋向。

从苏俄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过程看，提倡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经济管理和 社会管理，体现出民主趋向。1917年4月，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写道：“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还指出：“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① 这里的思想，是人人参与管理的具有民主趋向的思想。他在《四月提纲》中还写道：“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②所谓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对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由工人代表苏维埃或有关的工人组织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和分配的过程进行监督和计算，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一定的制约。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随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正式的《工人监督条例》，展开了工人监督的活动。

根据列宁关于工人监督的设想，凡职工人数不少于5人、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企业，对一切产品的生产、原料的储藏以及买卖事宜进行工人监督。较小的企业可以由职工直接实行监督，较大的企业由职工选举代表进行监督，代表应在全体职工大会上选出。企业的一切账簿和文具，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等，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由工人代表进行计算。当时列宁在论及工人监督的意义时说：“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①可以看出，所谓工人监督，就是主张全体社会成员都来参与经济管理和 社会管理，这就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趋向。

如上所述，在苏维埃俄国，党和国家政权活动过程中的民主趋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民主趋向，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的。可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物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各种条件和原因的影响，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地存在着。

从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与活动过程上看，具有各自纲领的派别集团的存在及其活动，损害了执政党思想上、行动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削弱了党的执政力量，造成了政治生活的不稳定。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党内产生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苏德之间签订和约，主张苏俄对德国进行战争，以战争支持德国革命，说明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纲领的派别集团。他们的存在以及活动，造成党内思想上和工作上的混乱局面，使党中央迟迟不能就签订和约达成一致的意见，使苏德之间的和约不能及时签订，加剧了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党内形成的所谓“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对苏维埃和工会的领导作用，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要求取消地方政权对中央的从属关系。当时党内形成的所谓“工人反对派”，主张由党和苏维埃政权管理政治活动，由工会管理经济，即由工会全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机关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各个经济管理部门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定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当时党内形成的所谓“伊格纳托夫派”，否认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作用，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辩论自由，要求党“工人化”，要求将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由工会选举产生的机关。当时党内还有托洛茨基派、“缓冲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纲领。他们挑起或参与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造成了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的不稳定，妨碍了党和国家政权当时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紧迫任务，使得 1921 年 3 月党的十大不得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明令禁止党内的派别集团的活动。使得列宁不得不在临终前的遗言中提出种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2—53 页。

种措施，防止党中央的分裂，巩固党的统一。

可是，俄共（布）内派别集团活动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列宁逝世以后，党内先后出现了托派、新反对派、托季联盟等派别集团。虽然对于这些派别集团的纲领以及他们中一些人物的评价，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这些派别集团的存在和活动，客观上造成了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的不稳定，削弱了党执政的力量，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历史事实说明，俄共（布）内的派别集团的存在，以及它们的活动，造成了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的不稳定。譬如，各个派别集团或者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纲领，或者在党的会议上宣扬自己的纲领和主张，甚至引发了全党关于某个问题的辩论和争论，并且发展到上街示威游行，同党中央分庭抗礼。这种情形的出现，足以说明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的不稳定。

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过程看，各种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势力采取种种手段，破坏企业生产，制造爆炸、枪杀等恐怖事件，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稳定。在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初期，一些资本家同沙俄封建残余势力、临时政府的追随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纠合在一起，进行反革命军事叛乱。另一些资本家则采取怠工和破坏生产的办法反对苏维埃政权，如他们不服从工人监督，隐匿生产资料和产品，投机倒把，亏欠税款，销毁账簿，克扣工人工资，停工停产等等。他们的活动，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1921年春，苏俄已经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是国内出现了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在农村的许多地方，如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农村，一部分农民进行骚动和暴动，杀害农村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毁坏农业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烧毁国家的粮食仓库。在大中城市，一部分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以表示他们对当时生活困难和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同年3月初，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即苏俄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城，一部分水兵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事实证明，当时的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局面。1928年，苏联再次出现了这种局面。农村中拥有大量粮食的富农不愿意按照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价格将粮食卖给国家，并且以种种恶劣的手段阻挠中农出售粮食给国家，千方百计地削弱和破坏集体农庄建设，暗杀在农村工作的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党和国家政权的活动中体现出民主趋向，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民主趋向，另一方面党内以及国内的政治生活不稳

定，社会生活不稳定，这样就产生了民主趋向同“不稳定”的矛盾。作为工人阶级的执政党，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主张民主，趋向于自己的活动与工作中有较多的民主。可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当民主得到发扬的时候，即民主基本到位或即将到位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不是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景象，而是政治生活的不稳定和社会生活的不稳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无法回避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从苏联的历史上看出，也可以从其他许多国家以往的事实中发现。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和办法，就是国家制度上的高度集权，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克服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上的不稳定。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即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说，民主的趋向与“不稳定”的矛盾，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的政治根源和社会根源。

（二）难得的“稳定”：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与他种社会制度的比较

如果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产生于列宁逝世和斯大林开始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候，终结于1991年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的时候，那么它的历史有六十余年。在这一段时间里，它为苏联创造了难得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有如下特点：

第一，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未发生严重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的事件。20世纪30年代，苏联消灭了失业现象，建立起了居民的免费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工农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二战以后，情况进一步好转。1917—1957年，苏联工人的收入增加了五倍半，农民收入增加了七倍半，人均寿命从旧俄国时的32岁增长到70岁，四分之三的城市居民搬进了新住宅^①。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的结果，从事实上看，在斯大林时期，在赫鲁晓夫时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未发生过严重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的事件。相反，可以看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如1929年苏联工业战线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运动，全国约有90万工人参加劳动竞赛，有30万人获得突击手的光荣称号。1935年苏联工业战线上又产生了以创造新生产记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即斯达汉诺夫运动。这种事实同十月革命前不断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

^① 程又中著：《苏联模式的兴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增强，未发生民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冲突。过去的苏联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20 个自治共和国、8 个自治州和 10 个民族专区组成。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一些落后的民族地区如中亚、外高加索等等，经济、科技和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96 年俄国的《教育通报》提出，根据当时教育的状况，在高加索地区扫除文盲需要 430 年，在中亚地区扫除文盲需要 4600 年，可是到 1985 年这些地区不仅扫除了文盲，而且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甚至超过了法、德、意等西方发达国家^①。中亚地区已经从以前的牧场和农业地区变成了具有一定实力的工业农业地区。由此各个民族之间形成了团结互助的关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未发生过各民族之间严重的矛盾和冲突，未发生公开的、激烈的民族分裂活动。这个事实同当前俄罗斯国内一些民族之间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的事实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党执政的权力和国家政权的下传与交接过程平稳，路线、方针和政策保持了连续性，未引起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运行的阶段，虽然存在着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一般都离世于任上，但是无论是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还是从赫鲁晓夫（赫不是离世于任上）到勃列日涅夫，以及此后权力相继向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转交，都体现出平稳转交的特点。路线、方针和政策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未发生封建制度下权力易手时刀兵相见、血肉横飞的场面，也未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政党之间争夺权力时相互攻击和不择手段地企图置对方于死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动荡的局面。显然，与封建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权力移交过程相比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的相关过程是一个平稳的过程。这也说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稳定”的取向。

第四，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能够自觉地纠正工作过程中的失误，能够及时消除社会不稳定的苗头。1930 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出现问题，一些基层

^①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2 页。

干部歪曲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强迫的手段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情绪，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苗头。同年2月下旬，党中央举行有关会议，批评了加快集体化速度的做法。3月2日，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了过去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起到了纠偏的作用。1936—1938年间，苏联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9年3月，党举行十八大，斯大林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所犯的错误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还要多，以后再也不需要这样规模的肃反工作了。党的十八大的举行，停止了肃反工作。如果说农业集体化和肃反工作曾经带来社会不稳定的苗头的话，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自觉地纠正了工作中的失误，消除了社会不稳定的苗头。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稳定”的取向，它在苏联历史上创造了难得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这个看法，同当代俄罗斯一些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2003年3月5日，俄罗斯举行“我们怎样认识斯大林”圆桌会议。参加者有俄罗斯“发展研究所”基金会主席维克托·米利塔列夫、著名政治家齐普科、莫斯科大学哲学人类学教研室副主任弗·吉列诺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阿·涅克列萨、“欧亚党”领袖阿·杜金等等。齐普科教授指出：“今天俄罗斯年轻人对斯大林主义兴趣的增长和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俄罗斯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尖锐感受到国家的衰落和混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感情。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了对斯大林的向往。”弗·吉列诺克教授认为，在任何历史阶段俄罗斯民众都希望社会和秩序的稳定，而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斯大林牢固地和“稳定”、“秩序”这两者连在一起。可以说在俄罗斯，只要存在对秩序的需求，就会产生对斯大林主义的强烈需求^①。他们的意思是说，斯大林带来了苏联的“稳定”和“秩序”，从而使苏联能够进行经济建设和生产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代的俄罗斯人正是从当前俄罗斯的混乱和衰落中，看到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合理性。由此看，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稳定”的取向。

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二战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更能看出它“稳

^① 参见吴恩远：《俄罗斯重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定”的取向。在世界历史学界，一般以二战作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线。如果确认这种划分的合理性，那么可以将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到二战前作为一个阶段来研究。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1649年国王被处死，废除君主制，宣布建立共和国，革命达到了顶点。如果以此界定为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它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剧烈的政治动荡。当时，作为共和国的英国，由克伦威尔进行独裁统治。在独裁统治下，英国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派运动和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掘地派运动。克伦威尔无情地派军队镇压了掘地派运动，血腥地镇压了平等派的武装起义。接着克伦威尔派大军镇压爱尔兰起义，在攻破某一个城堡时，下令将三千守军全部用剑刺死。可是克伦威尔独裁政权仍然不能有力地得以巩固，1688年，被革命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上述过程，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进程中的多少政治动荡！独裁政权三次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武装起义，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演进的结果，而残酷地进行镇压则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则反映出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生死拼搏。以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也是与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相伴随。1825年，英国发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激烈，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不断发生。1836—1848年间，英国工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全国几百万工人都发动起来，成立了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即宪章派全国协会，1844年它拥有400多个地方组织。资产阶级统治者在全国建立起警察制度，对付宪章运动。南威尔士的工人曾举行武装起义，不畏强暴，同反动军警进行激战。宪章运动说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多么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20世纪以来，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面临着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的打击。1926年5月，英国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人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0万，全国铁路和伦敦地下铁道99%的工人参加了罢工。罢工使全国的重要企业全部处于瘫痪状态，全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几乎完全停刊。上述事实说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从1649年建立到20世纪，一直面临着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不断地受到冲击。

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历史更是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如果以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界定为法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那么

此后它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不断，政权不断地更迭。1793年6月雅各宾派上台，实行革命专政，将他们的政敌推上断头台。一年以后，雅各宾派的领导人被捕，被他们的政敌推上了断头台，政权转到热月党人手中。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1814年拿破仑帝国瓦解，被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1830年波旁王朝再次被革命推翻，建立了所谓“七月王朝”。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但是不久波拿巴将第二共和国演变为第二帝国。1870年随着普法战争的失败，第二帝国倾覆。这一系列的政权更迭，证明法国历史演进中发生着一连串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动荡，证明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不同政治派别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挣扎着。不仅如此，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不断地面临着工人运动的打击，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动荡的冲击。1848年6月，巴黎的工人发动了六月起义。资产阶级统治者血腥镇压了工人的起义，有11000多名工人被屠杀，25000多名工人被监禁和流放。1871年，巴黎的工人又举行了巴黎公社革命。资产阶级统治者打回巴黎以后，进行了大屠杀和大逮捕，使巴黎血流成河，几万名优秀的工人惨遭杀害。资产阶级血腥地屠杀工人，证明当时的社会矛盾、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何等深刻！他们血腥镇压的行为又会何等程度地加深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英法两国向来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被视为民主和自由的典范，可是将它们的历史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相比较，不能不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更具有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取向，即它更具有达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功能和作用。道理十分简单：其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像英法那样不断发生政权更迭的事件，即不像英法那样不断地发生统治阶级中的某个派别将当权者推向断头台从而自己掌握政权的事件。其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像英法那样不断地引发工人群众反对政权的斗争以及统治者血腥镇压工人群众的行为。

如果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与当代俄罗斯制度作一比较，则更是发人深省。1991年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俄罗斯作为它的承接体，转到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轨道上。此后，俄罗斯陷入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之中。1992—1993年，俄罗斯经历了总统派与议会派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时任总统的叶利钦命令军队向议会派所在地进行炮击，以武力摧垮了议会派。这一事件在世界现代政治史上绝无仅有，它反映当时的俄罗斯处于极

端的政治危机和政治动荡之中。1994年，俄罗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矛盾激化，俄政府派大批军队进入车臣，与反对派武装展开激战。虽然1996年3月俄政府决定分阶段从车臣撤军，但是围绕着车臣问题的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2002年10月23日，几十名绑匪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劫持了800多名人质，并威胁如果俄罗斯不结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就炸毁大楼。俄罗斯特种部队10月26日向楼内施放催眠气体后解救了人质。当时的报道说，118名人质在这次劫持事件中丧生。2004年9月1日，一些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闯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1000多名学生、学生家长 and 教师劫为人质，最终造成300多人死亡的惨剧。而且，近年来俄罗斯还发生了多起飞机爆炸和地铁站爆炸事件。人们有理由说这是恐怖事件，但是它确凿地显示出俄罗斯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在当前的俄罗斯，黑社会势力和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加剧了社会动荡。据俄罗斯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内约有200个比较大的黑社会集团，它们控制着35%的商业银行和200多家国有企业，控制着新开商业网点的60%。它们用大量的金钱介入国家政治，或间接或直接地参加竞选，使自己的人进入国家机关之中。有关资料还显示，目前俄罗斯国内还活动着16个被极端主义分子所操纵的右翼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俄罗斯“光头党”。它们公开出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煽动排外情绪，杀害在俄罗斯的外国人^①。凡此种种，使俄罗斯的工农群众苦不堪言。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固然有种种弊端，可是同已经转向西方经济政治发展轨道的当代俄罗斯相比，无可辩驳地具有“稳定”的取向，因为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国内这一派炮击那一派的事件，没有发生过如此多的人质事件和爆炸事件，没有产生过黑社会势力如此猖獗的境况。

^① 周新城、关雪凌等著：《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320页。

第五章 毛泽东的东方理论

一、概 论

(一) 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出发论述东方观点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极为严峻和复杂，提出科学的、正确的理论以指导党的实践，是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着眼于东方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着眼于东方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他的东方观点。这一理论大体有下述内容：

第一，高度评价苏共和苏联的事业，主张加强中国与苏联两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十月革命以后，苏共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12月，即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到苏联首都莫斯科访问。他在抵达莫斯科机场时的书面演说中指出，苏联政府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废除了沙俄时代对于中国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并且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对此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①在这次访问过程中，他在有关文件中论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时指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益处。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②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在有关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并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①“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②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第二，充分肯定东方其他国家人民革命斗争的意义，主张加强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中国政府组成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打击美帝国主义者。1951年1月，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到底。”^③毛泽东一贯主张中国加强同印度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印度国民大会曾派遣援华医疗队来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其成员之一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当时毛泽东致信印度国民大会，向印度人民致敬和表达谢意，并说：“我们希望印、华两大民族团结得更加坚固，以便与其他一切反法西斯国家配合作战，借以达到打倒法西斯，解放一切被法西斯压迫的人民，同时即借以解放印、华两大民族，获得两大民族的独立。”^④1954年，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有过几次谈话。他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⑤他还说：“印度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南部的人民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把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都利用了，这有点像我们成都附近的情况。印度的每一个好消息都使我们高兴，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① 1959年，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中再次提出，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还操纵建立了所谓“东南亚条约组织”，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中国，所以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东南亚的某三国参加了上述所谓“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是中国人民不把它们作为敌人看待，印度没有参加这个条约，它更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②

第三，深刻认识东西方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历史的发展过程总会有一些转折点，如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也是一个转折点，即德国法西斯走向失败和苏联红军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由此他说：“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③接着，他以10个证据，论证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1）美英求助于苏联的力量打败法西斯。美国和英国为了求得苏联的帮助打击德国法西斯，忍痛将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划为红军的进攻区，使这一大片地区脱离了它们的体系。它们因为“吃不下日本”，又请苏联帮助，在许多问题上又作了忍痛让步。（2）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当1949年国民党遭到军事上的惨败时，美国不能也不敢出兵相助，坐视蒋介石逃到台湾，说明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3）朝鲜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这场战争差不多打了3年，美国的飞机像黄蜂一样，中朝军队在第一线连一架飞机也没有，但是美帝国主义还是失败了。在板门店谈判过程中，美国不甘心失败，不愿意签字，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向南突破了21公里的防线，美国军事当局十分害怕，马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37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上签字。(4) 法国在越南战争中遭到失败。二战结束后，法国军队侵入越南。越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击，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将大半个越南划归越南民主共和国。(5) 由于苏联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反对，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遭挫折。(6) 美帝国主义企图进攻叙利亚，由于苏联的抵制，不得不放弃计划。(7) 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而此时美国“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8) 英国侵略者从亚洲、非洲许多国家退走。(9) 荷兰侵略者从印尼退走。(10) 法国侵略者从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退走，在阿尔及利亚陷入困境。在做上述论证之后，他再次提出：“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被抛到后面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①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及思想，是着眼于政治力量对比而提出的结论。

(二) 从中国及东方的社会实际出发论述东方观点

毛泽东一生的理论与实践，主要的是围绕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展开的。由于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具有东方国家的主要特点，所以可以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主要的是围绕着东方的社会实际而展开的。他从中国及东方的社会实际出发，阐述了东方观点。其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过程决不是短暂的，它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也许比西方国家要晚些。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作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这一点。1930 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我国革命的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7 页。

主义革命的任务。”^① 1937年，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做两篇文章，民主革命是上篇，社会主义革命是下篇，只有做好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还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② 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讲话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已经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前发展，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是，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民主革命的过程不是短暂的，它向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较长的过程。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③ 这里，毛泽东表达的思想，即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决不是短暂过程的思想，体现出空前的务实性和哲理性。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④

第二，东方国家搞建设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东方国家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搞建设时可以而且应该吸收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化科学成果。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1944年他同外国某记者谈话谈及必须吸收中国的文化遗产时说：“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① 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更明确地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②在他看来,对外国文化、科学、技术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同对此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960年,他在会见东方某国客人时再次说:“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③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十分科学的和难能可贵的。当时东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帝国主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包围、孤立和封锁,力图颠覆中国的人民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必然主张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自己并使自己尽快强大起来,另一方面必然要求抵制西方所有的对我们不利的东西。

第三,东方国家搞经济建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新中国建立时,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经济十分落后,所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认识这一点。1958年,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④在讲话中,他回顾社会主义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国家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1921年春以后曾经提出发展商业,因为当时苏俄的经济陷入困境,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和经济交流近乎中断。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毛泽东要求省委、地委级干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3页。

部认真地研究斯大林的书，掌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当时，党内有的人怕商品生产，主要的是怕发展了资本主义。毛泽东就此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①他还说，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表示那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同斯大林有关的思想一样，存在着许多缺陷，如认为国家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商品交换主要地表现为国家与人民公社之间的交换等等。但他提出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提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是十分正确的，对于中国以及东方其他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1938年，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比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的情况。他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候，基本条件是国内没有封建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没有来自外部的民族压迫，有的只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西方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并且以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鼓动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他说：“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他还举例说，由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1924—1927年领导和推动了反对军阀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1927—1936年领导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人民进行了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它又领导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由此出发，他郑重提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①斯大林过去曾经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②。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来说，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来说，还是对于抗日战争来说，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人民。“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③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既是针对中国提出的，也是针对东方一些同中国国情大体一致的国家而提出的。1956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外宾提问，《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文章谈武装斗争，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而说的，还是指所有的国家？毛泽东回答说：“那不单是说中国问题，也包括外国。”^④外宾再问，现在是不是还那样说，要不要修改？毛泽东回答：“现在也还是那样说。”^⑤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外国，主要是东方那些同中国国情大体一致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还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它们还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

第五，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的著作中，深刻地论述了此问题。他提出，中国国情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若干个近代式的工商业都市和停滞不前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的所谓中央军和各省军阀的杂牌军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和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以及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红军的敌人是国民党及其军队。它的人数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武器和军事物资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②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这个特点同上一个特点形成尖锐的对比。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因为进行土地革命，共产党和红军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威力，能够同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造成很大的困难。他说：“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①这里的思想，简单地讲就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点，红军可以生存和发展下去，但是它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红军及其武装斗争需要长久地坚持下去。他的这个思想，正确地反映中国国情的特点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既有有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发生出来的。”^②他认为，根据以上的思想和规律，在武装斗争中，进攻时要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要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要反对逃跑主义；既要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又要反对游击主义，既要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又要反对阵地战和承认运动战；既要反对击溃战和承认歼灭战，又要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和承认一个拳头主义；既要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和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又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组织和宣传者。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不仅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指导的意义，而且对于东方类似于中国国情的一些国家进行革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六，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搞经济建设不能剥夺农民。在旧中国，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他们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具有革命的要求和愿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讲话中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③他提出，作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共产党人，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多了，但是不能忘记农民，如果忘记了农民，就是读一百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因为没有力量。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以后，仍有一个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国家不能剥夺农民，而应该通过商品生产来团结农民。他说：“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5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①意思是说，国家必须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产品，这样的政策才能为农民所接受，才能起到团结农民的作用。

上述毛泽东的有些观点，是明确地针对东方问题而言的，如关于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的观点，关于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既针对中国也针对外国的观点。他的有些观点似乎是针对中国而言的。即使是针对中国而言的观点，也具有东方的意义。因为中国的国情和条件同东方许多国家类似。如同毛泽东1954年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②这里所谓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包含东方国家共同的发展条件、共同的命运以及可能的共同道路。这说明，在毛泽东意识中，由于中国和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针对中国而发的理论观点，必然具有东方意义。

（三）对毛泽东东方理论的评论

笔者在有关论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实践的紧密结合。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东方理论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产生了十几个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世界的东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页。

地域上看，东起朝鲜半岛，西到易北河，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 25%。从人口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70%。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个国家相互支持，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说，这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时期。毛泽东的东方理论，如关于加强中国和苏联两个东方国家团结的观点，关于加强中国和东方其他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团结的观点，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关于东方国家搞建设要学习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观点，关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关于搞经济建设不能损害农民利益的观点等，均产生于这个时期（尽管他的若干理论观点在此以前已经产生），所以说他的东方理论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这个提法的含义在于，毛泽东的东方理论反映了当时东方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特点和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正确地把握了当时世界政治形势的主流。二战后不久，以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东方社会主义和民主进步力量的“冷战”，并且“冷战”不断升级。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讲话，号召所有讲英语的国家实现联盟，反对和制止“俄国人的侵略”。1947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深刻体现“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决定立即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紧急援助，扶持那里的反革命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同年6月，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主张美国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从而使美国在经济上控制西欧国家并联合它们同东方社会主义势力展开较量。此计划马上付诸了实施。1949年4月，以美国、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签署协议，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一个以反对和攻击东方社会主义势力为目的的军事组织。“冷战”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展开了直接的战争。1950年6月，美国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起军事攻击，并且美国海空军直接投入朝鲜战争，“掩护和支持”李承晚集团的军事行动。随后，美国纠集十五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投入朝鲜战场。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帝国主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它除了在中国的东部边境朝鲜发动战争以外，还命令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以武力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1954年，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由美国帮助国民党发展武装部队，美国可以在台湾、澎湖以及周边地区部署陆、海、空

军。同年，在美国的策动下，美国、英国和东南亚的若干国家在马尼拉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从而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77年该组织解散）。该条约表明，建立该组织的目的是以共同的力量反对“共产党的侵略”。可见，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集团。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未能也不可能得逞。在当时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十分巩固，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日益强大。各社会主义国家针对帝国主义的“冷战”以及各种军事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结果是，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处处碰壁，它在国内的统治力和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控制力大大削弱。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点，提出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对当时世界政治形势主流的正确判断和说明。它有利于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增强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更有力地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第二，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对各国共产党人的要求。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冷战”和各种挑衅，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加强团结，特别是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团结，协调行动，一致反帝。正是基于这一点，1957年11月，在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隆重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全世界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代表团，齐聚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在此期间，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举行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分别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提出，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与挑衅，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促进无产阶级解放的最基本的保证。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加强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思想，提出了加强中国与正在革命斗争中的东方国家之间团结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世界政治形势对各国共产党人的要求。

第三，它探索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很快转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1946—1950年，苏联提前完成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苏联执行并完成了第五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1953—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

五年计划。在中国“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9.2%，粮食产量完全达到五年计划的指标，全国职工的工资平均增长 36.8%，农民的收入平均增长 24.3%。与此同时，东欧和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探索和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以利于实践的进展。所以，斯大林这一时期发表了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步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进一步探索。1956 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深入总结和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代表作。正是在此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东方人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中，他提出了东方国家搞经济建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提出了搞经济建设不能剥夺农民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

二、关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思想

（一）关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

毛泽东就根据地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下述重要的思想。

第一，发展经济有利于克服经济困难和保证供给。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加之陕北、华北等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将发展经济的任务提到了重要的日程。1939 年 1 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也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部队的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

斗力。”^①

同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从事生产，展开生产运动。同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在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中专门论及生产运动。他写道：“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部队机关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② 他特别强调，必须总结以往的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1942年12月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总结往年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同时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1944年底，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论及1945年的工作任务时写道：“1945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发展经济，保障自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③ 可见，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根据地发展经济与克服困难、保证供给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发展经济有利于满足人民的利益。由于严酷的抗日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经济上的封锁，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在陕甘宁边区，1940年后连续几年遭受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1940年受灾面积达42万多亩，损失粮食2.3万石，受灾人口51万人；1942年，受灾面积85万亩，损失粮食7.9万石，受灾人口35万人。其中1940年的灾情特别严重，以致1941年春夏青黄不接时，群众啼饥号寒。边区政府为救济灾民，在机关、团体、学校开展节省一两米运动，并令各县政府组织赈灾委员会，选派得力干部深入灾区，调查情况，拨出粮款，赈济灾民。显然，发展经济

^①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241页。

和开展生产运动具有改善人民生活和满足人民利益的意义。1942年底，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写道：“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利益，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①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自己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向边区政府纳税，以供养军队和党政工作人员。有些党政工作人员还主张增加税收，加大人民的负担。毛泽东批评说，这些人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竭泽而渔，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他提出：“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②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人民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和改善生活，只知道向群众收取救国公粮，不知道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而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去解决公粮的问题，那就是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将发展经济和生产与满足人民的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

第三，通过发展经济可以使共产党人学习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是党政军各方面人员、各级领导干部都参与其中的大规模的运动。当时，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同时，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共产党人在发展经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895页。

济的过程中学习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除了消极的坏的一面以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决心自己动手解决供给的问题，“而其结果则是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还说：“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① 这里，毛泽东肯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而且阐述了学会经营经济事业的重要意义。

（二）关于发展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

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很重视国营经济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开始，创建以军用为主的国营工厂，先后恢复和创建了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农具厂，以及制灯、制肥皂、制面粉等工厂。到1944年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共有国营工厂101家，职工2.6万人。

毛泽东重视国营经济的发展。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分析说，根据地的全部国营事业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和商业，二是军队经营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三是党政机关经营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他指出：“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1942年的计算及1943年的预算看，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国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② 在上述文章中，他分析了党和政府重视国营经济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原因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批国营工商业，同时为了补助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曾发动机关学校种菜和养猪。由此，自己动手和自给自足成为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一个光荣传统。从现实原因看，从1938年开始，根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根据地军队的经费严重不足，不得不让一部分部队从事生产活动。1939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学校机关也增多了，财政供给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①毛泽东认为，从根据地公营经济发展的过程看，1938—1940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发展了农业，根据地政府则发展了工业。1941—1942年底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除一部分部队、机关和学校继续坚持发展农业以外，其他方面都发展了工业和手工业，也发展了商业。1943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②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与根据地经济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是相适应的。1943年7月，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时再次提出：“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③

毛泽东重视发展私营经济。在抗日根据地，私营经济的发展也受到政府的重视。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有私营纺织厂6家，年产粗布3690匹。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余万斤。私营纸厂39户，还有私营皮坊10处、染坊3处、木匠铺13处、裁缝铺5处、银匠铺5处、铜匠铺5处，私人盐池多处。到1941年，私营纺织厂发展到了30多家。商业方面，1936年延安有私营商店168家，1937年增加了36家，1938年与1939年各增加了29家，到1940年全市私营商店达到297家。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持支持的态度。1941年5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④1943年7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安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①在这里，他主张支持私人企业或民营生产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毛泽东主张在个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合作社，其具体组织形式有“变工队”、“扎工队”等等。所谓“变工”，即换工，或者说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如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参加了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力或畜力，轮流给本队其他人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者补给工钱。“扎工队”主要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受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在陕甘宁边区，参加“变工队”、“扎工队”的劳动力达3万余人，占全部劳动力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肯定这种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形式。1943年，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由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②他认为，在中国，几千年以来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成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农民处于贫穷的境地。“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③当然，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合作社，是以农民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合作社，而不是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当时他明确地说：“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④他的这一思想也是同根据地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然而，他认识到即便是组织这样的合作社，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变革，如果不进行这种变革，则不能使生产力有所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①他还说，这种办法体现了生产制度的革命，将来可以推广到全国，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

（三）关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当时毛泽东就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阐述了下述重要的思想。

第一，实行团结大多数人的政策和路线。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领导下，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根据这一制度，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人士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表明，共产党人力求团结大多数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一起进行抗日战争。在实践中，毛泽东还就如何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多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见。1940年9月6日，他给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写信，就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问题发表意见。他提出，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压迫的、与外国资本联系少、主张抗日的阶级；同时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区别开来，后者是主张抗日并支持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人士^②。同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根据地经济政策的文件中提出：“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到钱。”“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③1941年，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说，党内有的人在经济政策上思想过“左”，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实际上是主张不让地主吃饭并从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②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肉体上消灭地主。他指出：“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列宁主义。”^① 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不给他们劳动和吃饭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逼着地主拿着武器同民主政权拼命，给富农分坏田，必然使一部分富农降到贫农的地位，使一部分贫农也反对民主政权，“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以上论述足以证明，毛泽东主张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团结大多数人的政策和路线。

第二，实行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依赖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1938年8月，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就根据地的货币政策阐述了重要的思想。他提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需要的数量，可是应该估计到边区有扩大和缩小的可能；边区工业品主要来源于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需要^②。由此认识出发，他提出以下建议：“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③ 1941年8月6日，他在给有关同志的信中，就根据地的财经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边区的财经问题，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就发展经济而言，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等各行业的私人经济与公营经济。就平衡出入口而言，需要输出3000万元以上的产品于境外，交换3000万元的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平衡或争取一定量的出超。他提出，1941年边区政府以800万元投资公营事业，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对公营事业的投资，重视对私营经济投资，即发放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繁荣商业之目的。他说：“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食，则收二十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②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① 他还说：“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元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②

第三，加强经济管理。如前所述，根据地建立了公营企业。这些公营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依赖于有效和有利的管理工作。毛泽东就此阐述了重要的思想。1942年12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了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的思想。其具体内容是：每一工厂应有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其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每一工厂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消除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现象；依照各厂的具体情况，有些可以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完成生产计划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③ 当时，根据地的许多工厂存在着机关化的现象，如组织结构上非常不合理，管理人员众多，管理组织庞大，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根据地的小工厂上面。毛泽东针对此提出：“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④ 在根据地的企业内，分配领域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毛泽东说：“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⑤ 他认为，企业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则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在根据地的许多企业内，党的机关、行政机关和工会之间工作上不协调，不配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合，各干各的事。毛泽东针对此说：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节省成本，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①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根据地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②他还说：“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③当时，由于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采取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仿效，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搞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甚至不愿嫁给经济工作者，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毛泽东说：“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④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第四，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非常重视发展自然科学。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开始了自然科学的研究。1940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郊建立了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场，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同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向其他根据地发出了推进自然科学研究的倡议。晋察冀边区响应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倡议，1942年夏在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灵寿县成立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该研究会下设工学会、农学会、医学会和电学会。1942年6月《自然科学界》在根据地创刊。毛泽东在当时的实践中就发展自然科学形成了重要的思想。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自然科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①这是对自然科学的作用和地位的正确说明。他说，资本主义旧制度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以要改变旧制度。“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②他要求共产党人重视自然科学和研究自然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作为革命者必须重视和研究自然科学，否则就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算是一个好的革命者。毛泽东还指出，根据地发展自然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将改善人们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从而促进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三、关于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的同时，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包括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在此方面展开了多方面实践，形成了重要的思想。

（一）关于文化的意义和方向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文化和人民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陕甘宁根据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卫生学校等等，促进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毛泽东在实践中，深刻地论述了根据地文化的意义。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发表意见时指出：“文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立不起来。”^①他还说：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文化，如果没有文化它也无法建立起来，“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②他举例：过去北伐时期，新军队比旧军队有战斗力，同建立黄埔军校有关系。当时黄埔军校的学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有知识，有文化，有热情，由于他们加入到新军队，所以新军队有斗争力，其他的军队比不上。由此他进一步提出：“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么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③在此会议上，毛泽东还就陕甘宁边区如何开展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议：在以后的五年间，使陕甘宁边区的140万老百姓和10万党政军人员统统将文盲消灭掉，把边区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

抗日战争过程中以及在此前的土地革命战争过程中，许多工农分子参加了革命，成为根据地党政军等方面的领导者。可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不会随着他们政治觉悟和职务的升高而提高，而他们的文化水平不提高则妨碍他们顺利地开展工作。毛泽东重视这部分工农干部学文化的问题。他在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提出：“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还说：“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④在这里，毛泽东从工农干部能不能学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根据地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

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是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文化建设尤其是这样。所以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1938年3月3日，陕北公学举行学生毕业典礼，毛泽东出席该项活动并发表讲话说，陕北公学的方向是打倒日本帝国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主义，建立新中国，这个方向我们要坚持下去，谁违反这个方向谁就是违反陕公的宗旨，同学之间要相互帮助和监督。他还对陕公的学生们说：“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①同年4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抗大应当学习什么？“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②1939年5月，他在纪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按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1949年1月，毛泽东在《吴玉章寿辰祝词》中写道：吴玉章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③他号召人们学习吴玉章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品格。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他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④毛泽东认为，做好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必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文化建设尤其应该这样。他在上述文章中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材料。”^①意思是说，既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指导教育工作，又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学生学习的内容贯穿在教学工作中。随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针对党校学员的学习任务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②这一时期，在党中央关于理论学习的一次会议的会场上，散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之一是关于列宁做宣传工作的内容。1894年，列宁邀请彼得堡工人巴布石金参加，写成了一份鼓动传单和告罢工工人书。由于邀请了工人参加此项工作，所以传单里将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工人穷困的生活、他们过度沉重的劳动、他们毫无权利等揭露无余，而且详尽地阐述了工人的要求和他们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认为，列宁在写传单时要同熟悉情况的工人商量，邀请工人参与工作，这种文风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说：“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去做。”^③他这里所强调的是文风，意思是要求人们按照列宁的方法去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要求文化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专门讲到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说：“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④当时，有的作家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懂得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人们的思想感情，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主张抽象的“爱”、抽象的“自由”、抽象的“人性”等等。毛泽东说：“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晌。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⑤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其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日军侵占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占领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人民遭到深重的灾难。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日军逐渐停止了在正面战场上的战略性进攻，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所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来说，团结和动员一切可以团结和动员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更严峻地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毛泽东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确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文化和文艺有一个政治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①这里他说这是一个政治标准，即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或者政治方向的问题。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必须服从这个工作目标。还说：“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就是打倒日本，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学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②这一时期，历史学家何干之准备出版两部重要的著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自己对于研究民族史的态度。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③这说明，毛泽东主张在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宣扬民族抵抗精神，古为今用，激励人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毛泽东的这封回信体现了他关于文化建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其三，文化工作为人民服务。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一切事业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一切事业的发展也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文化建设当然不例外。1944年，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文艺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并说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列宁早已经解决了，因为列宁早在1905年就已经提出文艺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同时他说，当前有的同志却没有从思想上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郑重提出：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②这里，毛泽东虽然是针对文艺而言的，可是因为文艺同文化的有机联系，所以可以看成是他就整个文化建设而提出的思想。

（二）关于文化建设的方法和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方法和措施，阐述了重要的思想。

第一，努力办好各类学校。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而且面临抗战的严峻形势，但是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办好各类学校，促进文化建设。毛泽东在实践中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延安当时的小学分普小和完小。1944年3月21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延安市完小办得好的消息。毛泽东看后说：“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传播到全国去。”^③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到，在边区有的地方，一个乡办一所小学，可是这个乡有25个自然村，学生读书要走几十里路，很不方便，可见在乡村里，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个村办一个小学是比较方便的。边区有的小学，采取一年三学期制，农忙时放假，学生帮助家中耕作。毛泽东认为这里有经验可以总结。小学当时由民办，毛泽东肯定这是好的办法。由政府办的高级中学和师范学校，当时边区有6所，毛泽东肯定“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情，是在共产党的时代才发展的”^①。对于教学方法，毛泽东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小学要教会学生打算盘、写信、记账、写路条，大学特别是党校和干部学校要教会学员如何当乡长，如何当支部书记。他说：“从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一直到每一个村小学，都要做到这一点。”^②办学需要有教材，毛泽东提出：“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③1942年，在有关机关的组织领导下，几位同志编写出了一本《文化课本》。毛泽东为此书写序，其中写道：“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④

边区以往曾经开展过“识字组”的活动，力图通过这种方式使广大群众摆脱文盲，可是失败了。1944年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组织识字组，从前所以失败我看是因为没有具体领导，也因为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发展。现在情况不同了，群众有了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有了进步，我们来一个号召，就可以逐步推广。”^⑤他还提出了一个大体的计划和设想：边区35万户，140万人，每人一天识一个字，一年识365个字，十年识3650个字；实际上如果能够识2000个字，就接近消灭文盲了。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以有雄心著名的，在十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看《解放日报》。”^⑥对于识字组的教学工作，他认为，可以由老百姓教老百姓，认识10个字的可以当组长，认识100个字的可以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第二，开展学习运动。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特别是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壮大了。可是在党内，许多干部的文化水平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115页。

低，并且由此而难以提高理论水平，难以提高工作能力。所以1939年党中央做出决定，在根据地展开一次旨在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学习运动。这年5月，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开展学习运动的意义说：“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和建设大党。”^①学习运动展开以后，党中央建立了干部教育部，以加强对学习运动的领导。毛泽东提出：“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必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中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②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分析了展开学习运动面临的问题，认为一个问题是有些干部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干部看不懂学习资料。针对前一个问题，他说，工作忙不能成为不学习的理由，“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③他举例说，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可能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向木头里钉钉子，钉子挤进去了，就可以挂衣裳。针对后一个问题，即有些干部看不懂学习资料的问题，他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④关于学习的基本内容，毛泽东认为，应有党的建设，联共（布）党史，还应有时事和政策。他强调说，中央已经就时事编写了一个专门材料，有利于学习；党的政策要经常地研究和学习，不研究和学习党的政策，单学习理论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会同实际脱节。

在学习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及时进行工作总结，肯定成绩。如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由于开展学习运动，延安已经产生了哲学学习小组、读书小组等等，从前不懂哲学和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已经渐渐入门了，进步了。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这一时期，毛泽东就党的干部在学习活动过程中端正文风的问题发表了意见。1942年，他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中提出，在党的干部中，许多人形成了写“八股”文的习惯，即所谓“党八股”。它的错误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三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四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五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六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七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八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他说：“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①

第三，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包括在文化工作中，必须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就文化工作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②关于文化工作中统一战线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根据地不但要有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非正规的村学、读报组、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村塾并对其加以改造；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还要利用旧戏班；不但要有新医药，还要利用旧医生和旧兽医。他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要联合一切可用的旧艺人、旧医生、旧教师，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③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于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文化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关心。1939年12月，他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的决议。其中写道：“在长期的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他提出，党组织和党的军队，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队的工作、学校教育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使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改造，并且将一部分具备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一部分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要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提高认识，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性；同时要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实现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再次提出吸收知识分子工作的问题。他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的态度。”^②

第四，做好报纸、艺术和卫生等方面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办有《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等。这些报纸对于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领导干部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不好展开工作，如果报纸来了，饭也来了，许多同志都是先看报，再吃饭。他还说：“《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③当时，边区的许多地方，如关中、绥德、陇东等地的地委机关，也办有自己的报纸。这些地方性报纸，可以更直接、更快地反映本地的情况，达到宣传群众和促进工作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这个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④过去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是开会，通过会议研究工作和布置工作。毛泽东认为，现在有了报纸，许多问题可以拿到报纸上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讨论，领导机关的许多指示可以通过报纸来发布。有些机关的墙报反映本单位的先进人物及事迹，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能够吸引许多人阅读。毛泽东认为，墙报也是报，有关单位的领导一定要把墙报作为自己开展工作、教育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鉴于有些单位的墙报办得不好，毛泽东建议在陕甘宁边区举行一次如何办好墙报的会议，各单位派一名首长和一名编辑来出席会议，推广经验，克服缺点，一定把此项工作做得更好。他说：“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墙报才能办得更好。”^①

在陕甘宁边区，秧歌队的活动开展得很好。1944年，这个活动同办冬学、办训练班结合在一起，搞得轰轰烈烈，起到了宣传群众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作用。当时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秧歌队的活动，认为它体现了群众的新面貌。毛泽东就此说，周扬的文章很值得一看，演秧歌的活动需要得到发展，可以多组织一些秧歌队，一个区可以组织三个、四个，或者更多一些，不加限制。毛泽东认识到，通过演秧歌，干部和群众加强了联系，加深了感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增长了干部的工作本领。由此他说：“今年冬天，延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都下去，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演秧歌、办冬学、办训练班……做三个月工作，真正学习本领。”^②春节挂春联，也是一项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陕甘宁边区有35万户人家，如果每家都挂出一副新春联，则可展示边区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面貌。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要求党的宣传机关研究和指导此项工作。他说：“写春联就要编几个本子，要搞新的春联。新春联是群众的识字课本和政治课本。三十五万副春联，内容大体相同，文字可以不同，这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③毛泽东还提出，可以编写三五首有意义的新歌子，教群众唱，使边区的群众都会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这也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一种办法。

毛泽东十分关心根据地的群众卫生工作。在陕甘宁边区，随着文化工作的开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改变。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办法战胜疾病、死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①他分析说，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可是党政军机关人员有3万多，老百姓有1.4万多，真正能够获得医疗卫生条件的人很少，边区其他地方的130多万人，则更无医疗卫生条件。他提出要求：现在必须把卫生工作大力推进一下，训练一批医药卫生人才，各地可以派人来延安学习，或者延安派人到各地去训练，通过这些人才改善卫生工作。他着重指出：“这件事情，各个地委、各个专员公署、各个分区都可以订一个计划，在五年到十年内，做到每个区有一个医务所，能够诊治普通的疾病。”^②当时边区的药品少，不解决这个问题则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毛泽东提出，边区应该发展医疗药品工业，普通的药品尽量自己制造，不能制造的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只要经济发展了，只要是为了群众的福利，可以到边区以外的地方购买药品。在毛泽东看来，老百姓信神和迷信，是因为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③。所以他要求将文化教育工作以及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列入根据地党和政府的工作日程，切实做好，使其和根据地的其他事业齐头并进。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第六章 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

一、20 世纪东方发展的三大规律

这里所说的东方，指世界的亚洲、东欧等地区。20 世纪以来，这里的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因而发展中体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规律。探讨东方发展中的规律，有利于总结它们以前发展的经验，预见它们以后的发展。

（一）以社会主义方式或者企图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

20 世纪东方发展的第一个规律，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内容的具体的发展。西欧的中世纪，封建主义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制度。这一时期西欧的发展，是以封建主义为方式的发展。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这些国家的发展则是以资本主义为方式的发展。20 世纪的东方，以社会主义方式或者企图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规律。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东方的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或者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前进了几十年，或者直到目前仍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前进，或者打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旗帜前进。

东欧的俄罗斯和原属于苏联的乌克兰、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等国，以及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曾经有几十年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的历史。

俄罗斯和原属于苏联的乌克兰、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等国，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已经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1903 年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党。1917 年，该党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

家，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了政治前提。1928年以后，该党领导苏联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了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成分取得了伟大胜利。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产生阶级的根源已经消灭，因而剥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苏联社会只剩下新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鉴于此，1936年苏联通过的新宪法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苏联的政治基础是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全部政治属于城乡劳动者^①。至此，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苏联打败了法西斯德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战后，苏联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力量空前增强，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领导的改革由于偏离正确方向，导致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失败。但是到此为止，苏联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前进了70余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产生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1945—1948年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实行了土地改革，有力地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在这个时期以至1952年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实行了剥夺敌伪财产的政策和工矿企业国有化的政策，结束了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此时起，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到80年代末这些国家发生政局演变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已经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运行了40余年。

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等国，从上个世纪中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来，一直坚持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

中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前进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领导人民进行了28年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1953年，党提出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毛泽东在

^① 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6页。

有关文件中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到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加上原有国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发生了曲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中国展开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郑重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任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目的在于迅速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发出“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号召，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第二次飞跃”，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等等。1992年党的十四大发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号召，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任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任务，都是力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现代化的建设。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改革路线和方针，所以中国一直健康地前进在社会主义轨道上。

1945年9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越南人民展开了抗法战争。在抗法战争中，它们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把军事工业收归国有，鼓励发展合作社企业，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加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1958—1960年，是越南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到1960年，越南北方已经建立41000个农业合作社，入社者占农户总数的85.6%，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同时，97.2%的私营资本主义工商户转变成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也已完成。手工业初级合作化运动进展顺利，80%的手工业者已经被组织起来。这说明，越南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80年代以后，越南展开了经济体制的革新。1986年12月，越南共产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革新管理体制，吹响了革新的号角。苏东剧变以后，面临着重大的压力，越共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人民决不接受社会主义道路以外的任何道路。”^①“在我国条件下，没有建立多元政治、多党对立机制的客观需要。”^②这一时期，越共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在刊物和书籍中大量地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论证了它的正确性，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糊涂认识，批评了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看法。同时越南对农业、工业、金融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革新。革新的最大成就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991—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5%。在亚洲，朝鲜、老挝等国，也一直前进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亚洲的另一些颇具影响的国家如印度、伊拉克、叙利亚等等，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谋求发展。印度是亚洲的大国之一。多年来，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谋求发展。在印度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其中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印度国内诸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国大党的社会主义，也称尼赫鲁社会主义，主要创始人是曾长期担任该党主席职务的尼赫鲁。1929年12月，尼赫鲁在首次当选国大党主席职务时的致词中宣称：“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分子。”^③“我相信，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在于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我找不到结束印度人民的贫困、大量失业、堕落和被统治的任何方式。”^④1955年1月，印度国大党年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1956年，印度开始实施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尼赫鲁去世后，他的女儿英·甘地执政，继续宣传和实践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英·甘地遇刺后，她的长子

① 《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真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② 《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真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③ 转引自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页。

④ 转引自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页。

拉·甘地继任国大党主席和印度政府总理。1984年11月，他在施政演说中宣布：“我重申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和计划工作。没有计划工作，我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的目标是为实现现代化、提高生产率和迅速推进社会主义。”^①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实践。它的内容一是以民族主义为基本目的，以社会主义为动员方式，推动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二是建设一个以议会民主为特点的社会主义国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四是实行计划管理和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这种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可是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而且几十年不变地坚持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能不承认它同社会主义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于，它企图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

西亚和北非的一些国家信奉“阿拉伯社会主义”，其中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最具影响。1944年，叙利亚的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共同写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一书，首次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了“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祖国。1947年4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建立。1963年2—3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先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将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付诸实施。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强调阿拉伯的统一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他们说：“从我们意识到阿拉伯必须统一的时候起，我们就不认为阿拉伯的统一能和社会主义分开。在社会道德标准方面，阿拉伯的统一高于社会主义。”还说：“我们所讲的统一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正如躯体与灵魂的关系，社会主义是躯体，而统一则是它的灵魂。”^②该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是他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该党《党章》明确规定：要把实行国有化和农村土地改革以及集体化作为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措施^③。根据这种理论，叙利亚60年代中期大搞国有化，把工业生产的75%转到政府手中。伊拉克从70年代初起，对石油、银行、水电、邮政、海运、航空、铁路运输等部门，也全部实行了国有化。

^① 转引自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页。

^② 转引自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2页。

^③ 转引自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页。

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地处世界的东方。20世纪以来，它们在东方，乃至在全世界，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或者曾经几十年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自己的发展，或者几十年以来直到目前仍然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自己的发展，或者打着社会主义旗帜（企图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自己的发展。由此看，以社会主义方式或者企图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是东方发展的一个规律。

（二）在同西方强烈的抗争和反击中实现发展

从15—16世纪起，西方的文明走在了东方的前面。西方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或者以商品为武器，或者以真正的武器即坚船利炮，向东方征战。东方国家和东方人民成为西方统治者宰割的对象，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对于西方的征战，东方人民进行了抗争和反击。20世纪以来，东方对西方的抗争和反击愈益强烈，以致成为东方发展的第二个规律。

20世纪的东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对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了强烈的抗争和反击。西方对东方的征战，有时是以反对共产党政权和反对社会主义为内容而进行的。这样，它们必然地遭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抗争和反击。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允许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1918年3月，英国干涉军和法国干涉军从俄国北方城市摩尔曼斯克登陆，首先发动了对俄国的侵略战争。4月，英美干涉军从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从东线对苏维埃政权夹击过来。据统计，当时有14个帝国主义国家派军队进入俄国，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西方反动势力还对俄国境内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提供各种援助，支持他们发动叛乱，建立反革命政权。苏维埃政权对西方的武力干涉和侵略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抗争和反击。他们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动员国内一切力量，打击西方武力干涉者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1919年6月，红军在东线取得了战争胜利。同年11月，红军在南线取得了战争胜利。1920年10月，红军在西线取得了战争胜利。至此，俄国苏维埃政权对西方反动势力的抗争和反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使苏维

埃政权得到了巩固，使十月革命开创的事业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上述事实也许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把这一事实看成为 20 世纪东方对西方的抗争和反击从而实现自身发展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新认识。

1950 年至 1953 年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也具有上述性质和意义。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后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下达命令，美国的海空军直接参加对朝鲜的战争，对南朝鲜的李承晚伪军提供“掩护和支持”。几天后他再次下达命令，美国的陆军投入朝鲜战争。同时，美国还纠集了有 15 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军”，投入朝鲜战争，打击朝鲜的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朝鲜人民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不屈不挠，英勇反击。中国人民本着维护和支持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目的，派出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在朝中两国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者损失惨重，于 1953 年 7 月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抗争和反击以胜利而结束。这以后，朝鲜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1946 年 12 月至 1954 年 7 月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战争，1960 年 12 月至 1975 年 5 月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也属于东方对西方进行抗争和反击的重大事件。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些事件。

对应西方的“冷战”，是东方社会主义力量对西方的抗争和反击。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的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宣称东欧和西欧之间拉下了一条从北到南“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俄国人对基督教文明构成了“严重的挑衅和危险”，唯有讲英语民族的联盟才能制止俄国人的侵略。这个演说的发表，意味着西方对东方“冷战”的开始。从 1947 年到 1949 年，冷战逐步升级，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出笼，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出现，就是其表现。东方社会主义力量对西方的冷战进行了反击。丘吉尔在富尔敦演说发表后，斯大林对《真理报》发表谈话，谴责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在盟国中间散布纠纷的种子，使他们难以合作。马歇尔计划出笼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拒绝了这个计划。并且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加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经济上的联系，粉碎了西方国家在东欧经济上的封锁。1955 年 5 月，苏联与东欧国家在华沙举行会议，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用以同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1949 年 9 月，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对打破美国和西方的核垄断和核威胁起了重要的作用。上述东方社会主义力量对西方冷战的反击，维护了世界和平，特别是保证东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东方的发展。

穆斯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打击，也是东方对西方的抗争和反击。穆斯林国家包括西亚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还包括其他许多国家，这里只是用一些国家作例子说明），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从意识形态上看，这些国家的人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而且他们主张中东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此持反对和抵触的态度。从政治制度上看，穆斯林国家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其他原因，政治制度同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相去甚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向来以自己的政治制度模式为标准，衡量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凡不符合他们标准的轻则从舆论上进行丑化和攻击，重则实施所谓“经济制裁”。从经济上看，西方国家在中东穆斯林国家有他们的利益，他们希望穆斯林国家顺从西方的意愿，随时满足西方的利益要求，可是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不能令他们感到满意。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东穆斯林国家大打出手。如1991年和2003年两次借故对伊拉克发动战争，颠覆了伊拉克的合法政权。并且他们对叙利亚和伊朗实施军事威胁，咒骂其为“无赖国家”和“流氓国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行为，遭到穆斯林国家的反击。许多穆斯林国家人民在强敌面前无所畏惧，奋起战斗，保卫自己民族的尊严。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东方社会主义力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对西方的侵略行为进行了反击，他们对西方的冷战进行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抗争。东方穆斯林国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进行了多年的、多手段的抗争和反击。可以看出，20世纪东方的历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东方对西方的强烈抗争和反击。所以说，在同西方强烈的抗争和反击中实现发展，是20世纪东方发展的规律之一。

（三）主动融入全球化以图发展

全球化缘起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化的过程愈益迅速，内容愈益广泛。毋庸讳言，西方国家向东方输出商品和资

本，向东方传播西方的宗教和文化，属于全球化的内容之一。如果说 19 世纪东方国家的人民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必然抵制西方东西的话，那么 20 世纪以来东方人民则能够接受本国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而且东方国家能够主动地同西方国家作经济上、文化上的交流，利用这个途径以图自己的发展，也就是所谓他们能够主动地融入全球化以图发展。笔者以为，这是 20 世纪东方发展的第三个规律。

从经济发展上看，前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均能够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苏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已经同西方发展了贸易及其他经济关系，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列宁针对此说过：“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这样的境地：它们敲诈我们，逼我们付出高价，但不管怎样还是在帮助我们的经济。……结果，它们在经济上同我们分不开了。”^①“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②这是列宁对苏维埃国家参与世界经济交往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肯定。在斯大林时期，在 30 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上的联系。1931 年，苏联从西方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设备出口额的三分之一。苏联用高薪聘请大批西方国家的专家和技工，参与工业化建设，1932 年在苏联工作的西方技术人员达 2 万人。苏联还派遣许多人到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从西方国家订阅大量的科学技术书刊。苏联的三个大型钢铁厂，即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扎波罗钢铁厂，是在美国和德国的帮助下建成的。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也是在美国几家公司的联合帮助下建立的。这些事实是苏联当时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例证。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有更多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是无需证明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了一句名言，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党和政府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力推行对外开放。1989—2001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从 1117 亿美元增加到 5098 亿美元，年均增长 13.5%；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37 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 3814 亿美元；引进技术和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2 页。

关键设备 42000 项，总金额 1283 亿美元；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累计金额 908 亿美元，完成国外经济合作项目累计金额 961 亿美元；批准在境外投资企业 6610 家，遍及 160 个国家和地区^①。这些材料证明，我国坚定不移地采取了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方针和政策，并且已经有了事业上的重大成就。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经历了十五年的风雨曲折之后，终于成为现实。这为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80 年代越南走向革新道路以来，也主动地将自己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它重视吸引外资，外商在越南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增长 48%，占越南国内总投资的 27%^②。1995 年 7 月，越南加入了东南亚联盟。这是越南融入国际社会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1967 年 8 月，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举行五国外长会议，宣告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此组织的功能之一，是对内协调经济发展和对外展开经济交流。1976 年 2 月，东盟五国在印尼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要求东盟国家同印度支那三国建立经济、贸易上的联系和外交关系。同时要求东盟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合作。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次年东盟内部就 71 种商品实行特惠，互免关税 10%~30%，1978 年又将这类商品增加到 755 种。1977 年 8 月，东盟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就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共同体的经济联系作出了决定。会议结束时，邀请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首脑来吉隆坡，随即举行了八国首脑会议，就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形成了基本统一的意见。这是当时东盟国家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举动。1992 年，东盟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对内和对外即对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经济联系完成这一计划。当前，东盟已经扩大为 10 国，它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更多、更密切了。

印度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且提出要加大力度。从 1991 年到 2001 年，印度引进外资 236 亿美元。印度工业界有关人士提出，必须改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制定新的投资政策，使外资流入量每年至少达到 100 亿美元。1997 年 11 月，巴基斯坦政府公布了吸引外资的新政策，包括向外资开

^① 转引自张德江：《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3 页。

^② 周新城主编：《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7 页。

放除个别特殊行业以外的所有领域，向外商提供减免税收的优惠。如外商投资第一产业，在投资的第一年内可减免税收 90%。外商投资制造业，第一年内可减免税收 50%。通过这些政策，力争每年吸引外资 50 亿美元。巴基斯坦政府还计划发展国家混合工业区、自由工业区、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等等。伊朗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颇多。90 年代中期它每天生产 360 万桶原油，其中 260 万桶销往美国、日本和韩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也是伊朗的贸易伙伴。1994 年伊朗和英国的贸易总额为 6.75 亿美元。1995 年美国以伊朗支持恐怖活动为由宣布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断绝同伊朗的一切贸易关系和投资，并且号召其他国家支持和响应，可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呼吁反应冷淡，特别是德国和英国明确表示拒绝同美国一起制裁伊朗。从文化发展上看，东方国家以积极的态度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图自己的发展。列宁在苏俄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曾经提出，要学习和仿效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以便有效地管理苏维埃国家的经济。要学习和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以便提高苏俄的劳动生产率。他逝世前夕在论及改革国家机关时还提出，要选派一些人到西方去学习和访问，掌握西方行政管理的理论和经验，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编写出苏维埃国家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教材，以满足苏俄人民学习管理学知识的需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贯彻和执行了上述列宁的思想，如苏联同西方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涉及教育、科学和文化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同西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更丰富。如教育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尝试，借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教育资源，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十年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十分迅速。截至 2002 年底，经中央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达 712 个，遍及 2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办学层次包括幼儿园、普通中学、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高等学校以及其他非学历教育。科学技术方面，中国选派大量的人员到西方国家进修或留学，并且为他们学成以后回国发展创造好的条件。1998 年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作出决定，聘请 13 位外籍科学家为两院院士。这 13 人中，法国的比·缔奥莱教授曾 20 多次来华讲学，同我国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医学研究单位保持密切的联系，为我国研究乙型肝炎病毒作出了高水平的贡献。美国的伯奇费尔教授把中国青藏高原的形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为中国培养了 20 多名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英国的迈克·盖尔教授、奥地

利的莫里茨教授，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为中国培养了多名科学工作者。东方那些国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演变后的东欧国家，同西方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东方国家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以积极的态度同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以图自己的发展。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这样，东南亚国家是这样，西南亚许多国家也是这样。这足以说明，主动融入全球化以图发展，是20世纪以来东方发展的一个规律。

二、从经济落后性看俄、中等国社会主义先于西方胜利的必然性及其发展中的曲折性

20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是：俄国、中国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些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以后，其发展道路是异常曲折的。由此，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这样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且未实现社会主义，这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有无必然性？应如何认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

（一）经济相对落后性决定了这些国家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俄国、中国等国在革命胜利以前是经济落后国家。所谓经济落后，是指经济制度的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这些国家可以逾越或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问题近几年来曾有人撰文作过论证，这里不再赘述了。笔者试图论证的观点是：这些国家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正是由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落后性所决定的。

这种经济相对落后性所决定的必然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这些国家里，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易于发生革命。历史事实证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易于发生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国内的经济政治

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在国内实行“糖饼”政策，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随着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缓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方式和特点是：参加议会选举，争取形成议会中的多数，进行议会斗争，向统治阶级施加压力，争取实施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此后，这些国家便难以发生革命了。列宁在世时，曾明确地指出过这一问题，说：“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欧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引者）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①在这些国家，革命已经难以爆发了。

相比之下，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则显得容易发生革命。20世纪以来，俄国接连发生了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等重大的革命斗争。中国无产阶级成长起来后，于1919年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20多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事实证明上述观点，也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指出的：“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②“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③。

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易于发生革命，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落后性所决定的。这些国家经济上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落后的封建主义经济严重的存在，说明了这些国家经济制度的落后性。同这种落后性相联系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严重贫乏。在这些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社会上滚动着革命的岩浆，一遇契机，就会火山爆发。如1900—1903年，俄国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

发生了工业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恶化，各城市不断爆发工人罢工的斗争，同时农村不断发生歉收和饥荒，大批农民在地主的压榨下陷入绝境，农民的斗争也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1905年1月9日，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罢工为契机，爆发了1905年革命。在这些国家，同经济落后相联系的，是政治制度极为反动。在这里，人民没有合法地进行斗争的权利。他们不能像西方国家的人民那样，通过议会的途径，合法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在他们的面前，只有一条道路，即通过革命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解放。这也是这些国家比西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原因之一。

第二，在这些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积极支持和参加革命，革命的攻击力量异常强大。历史事实证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相比较，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革命力量显得异常强大。在西方国家，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农民由于受到旧的生产方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少支持无产阶级的斗争。西方国家的其他小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革命斗争，但他们往往在斗争中形成机会主义的派别与思潮，如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等，不能在行动中与无产阶级谐调一致，不能与无产阶级共同组成反对资本主义的强大革命阵营。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忠实同盟者。他们能够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同无产阶级一起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同旧社会作斗争。在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等，也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因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支持和参加革命，所以中国革命的攻击力量异常强大。

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在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农民支持和响应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俄国农民在各地发动起义，建立农民苏维埃，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列宁高度地评价了这一时期俄国农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农民起义已蔓延全国。十分明显，立宪民主党人及其走狗在百般诋毁农民起义，说它是‘暴行’，是‘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各起义中心已经开始把土地转交给农民，这种谎言就不攻自破，因为‘暴行’和

‘无政府状态’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辉煌的政治成果。”^①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由于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所以它显示出了异常强大的攻击力量，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革命攻击力量异常强大，也是由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性所决定的。在这些国家，除了有一定数量的、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以外，由于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在俄国，19世纪中期总人口有6800万，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以后，虽然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地增加了，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小农经济仍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中国更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虽然近代中国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有所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但是农民一直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

这些国家的农民，不仅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具有众多性，而且同西方国家的农民相比较，他们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农民在革命中没有支持无产阶级的斗争，表现出了较浓厚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其所以这样，原因在于：在英、法等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得到了“小块土地”，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他们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力图保护“小块土地”，维持自给自足的现状，反对社会发展与进步。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②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农民，则没有这样的保守性。在这些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资本主义力量未得到充分发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发生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农民没有获得过西方农民那样的“小块土地”。俄国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时，地主阶级将五分之一的土地占为己有，其余的则强迫农民高价赎买。俄国农民在被“解放”以后，为了获得和保持土地，向地主阶级交了半个多世纪的赎金。即使这样，俄国农民仍不能靠赎买的土地维持生计，因为土地太少。他们还需要租种地主的土地，遭受封建残余势力的剥削。在中国等国家，贫苦农民拥有的土地更少，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无地的农民更多，他们受到的封建剥削更为严重。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农民，由于没有“小块土地”，不留恋过去，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希望推翻旧制度。他们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使革命的攻击力量异常强大。

第三，在俄、中等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成了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们领导人民夺取了革命的胜利，领导人民走向了社会主义。毋庸置疑，俄国、中国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革命，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在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这时，资产阶级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因此他们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在俄国、中国等国家，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步晚，资产阶级革命来得也晚。在这些国家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成了革命的领导者。

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胜利，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如建立政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等等。这是这些国家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战争，国内的矛盾空前激化。革命形势高度成熟。

俄国革命胜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时，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国内矛盾激化，城市里的工人革命形成了高潮。在农村，农民的斗争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俄国无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革命胜利并掌握政权的。

中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国内矛盾激化，在长时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农民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工农两支革命力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终于取得了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

这些国家革命胜利的特殊条件和特殊原因，也是同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些国家才有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才具有较强的革命性。这样，这些国家的革命才有可能形成工人革命和农民战争相结合的态势。如同列宁所说的：“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①而且，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力薄弱，这些国家才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从而才产生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才有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广泛的发动。俄国虽然不是被侵略国家，但它之所以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之中，之所以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无疑也是与俄国发展的相对落后分不开的。俄国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并取得胜利的。

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必然地要把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国家的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其必然性也深深植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落后性之中。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近代中国，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先行者，如孙中山等人，曾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实行资本主义，力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但没有成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落后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条件决定了中国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事实说明，中国由于落后，才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殖民利益。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它们还会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所不能允许的。与落后相联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缓慢地生长。其规模小，技术落后，而且以轻工业为主，缺乏重工业基础，不能构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造必然失败，决定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必然要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必然性，也可以在俄国的经济落后性中探源。如前所述，在欧洲，俄国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起步较晚。正因为这一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着市场狭窄的严重困难。恩格斯晚年在研究俄国的社会问题时，已深刻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说：市场狭窄会使资本主义的发展陷入“无出路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①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它造成了极其强烈的社会动荡。恩格斯曾指出：“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它地方强烈得多。”^①这种强烈的动荡表现为：俄国农民的遭遇同西方农民不同，他们不是遭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打击，而是遭受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猛烈打击；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俄国无林化、江河淤浅、地力耗损等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其所以会产生这一系列问题，原因就在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步晚，基础差。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它必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猛烈地跑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个世纪所走的路程。俄国人民受尽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他们的出路就在于结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样，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必然地要把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些国家，也是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等原因，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建立了联盟关系，这就有利于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如同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②

（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性根源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相对落后性

俄国、中国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发生过许多的曲折。人们在思考：这些曲折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克服和纠正这些曲折？

笔者认为，这些国家发展中的曲折性根源于它们经济上的落后性。

在这些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冒进”造成了发展中的曲折。20年代，俄国经过了艰苦的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以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20年代末，苏联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一系列急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领导人虽然对其政策作了某些调整，但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中还是坚持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无疑，我国过去的实践中也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这样的情况。“冒进”违反了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如浪费了国家资源，破坏了生产发展的有序性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影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

其所以产生“冒进”，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性。由于落后，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中要急于改变落后的状况，所以才有“冒进”。20年代苏联开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国家的经济状况处在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经济水平上，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比较，显得十分落后。直到1929年，苏联的生铁产量仅为400万吨，为当时美国产量的1/10，德国的1/3，法国和英国的1/2，钢产量也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苏联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包围之中。1925年，德国同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签订了洛卡诺协定，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准备结成反苏联盟的一个严重的步骤。1927年，英国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指使特务分子在苏联从事暴力破坏活动。面临着这样的国际环境，苏联必须迅速地发展经济、军事力量，否则就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包围、颠覆和军事进攻。如同斯大林指出的：“人们有时间：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①“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②“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③苏联20—30年代的“冒进”就是因为不愿意“被人打倒”而产生的。显然，它是同苏联当时的落后性有联系的。50年代，东方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改变落后的面貌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是各国的首要任务。这时苏联必须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因为只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它才有力量支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搞好经济建设，才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较强的凝聚力，才能有力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正是因为面临着这样的任务，苏共才提出“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在二十年内建成共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3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

产主义”。我国产生“冒进”，也同我国的经济落后有关。5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颠覆、侵略的危险。我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很弱，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颠覆与侵略，必须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以增强国力。所以，当时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旧社会饱受痛苦的人民盼望新社会能够带来幸福。由于中国的经济落后，不以非常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愿望就难以早日实现，所以，当时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并产生了“穷过渡”的作法。

在这些国家，与经济建设速度上的“冒进”相联系，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往往搞平均主义。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初期，有的集体农庄实行按人口分配生活资料的办法，这是典型的平均主义。我国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大办公共食堂及后来的评工计分，也是搞平均主义。搞平均主义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导致了经济建设事业的停滞。可见，搞平均主义加深或加重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

平均主义是同落后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相联系的一种落后的思想意识。毛泽东曾说过：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①。在封建社会，人们反对人剥削人的现象，希望实现人人平等，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平均主义。在18世纪的法国，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学说中强调平均主义。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都喊出了“均贫富”等平均主义的口号。这些都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和社会物质生活资料不充裕有关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有平均主义，除了旧的观念和思想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和眼界尚不能冲破这一社会现实的限制。

在这些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也造成了国家发展中的曲折。这一曲折也根源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落后性。个人崇拜是封建社会的“愚忠”意识和“皇权”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在封建社会，皇帝即“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皇帝和效忠于皇帝。另一方面，农民在一定的時候，具有浓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的“愚忠”意识。有些农民，当他们拥有少许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的时候，当他们的家境有所好转和有上升的希望的时候，他们盼望有一个好皇帝，盼望得到皇帝的恩泽。如同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些农民群众像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马铃薯一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在俄国、中国等国家，封建社会的过程很长，封建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这说明了这些国家革命前的落后性。不言而喻，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产生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这些国家过去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

这些国家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直接的原因是个人专断、法制不健全或遭破坏和权力被滥用。然而，个人专断、无法制、滥用权力等是同这些国家过去的社会落后性即社会的封建主义性质有关系的。在这些国家的封建社会里，有这样的“传统”：君要臣死，臣不死为不忠，一人“有罪”，株连九族。这充分地说明了这些国家革命前的社会落后性。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从其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无疑，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个人专断、无法制、滥用权力等等，来源于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如同邓小平所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②“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③就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情况而言，由于过去的基础差，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不可能很快改变。在其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受到了限制。这也是这些国家发生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总之，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曲折，是同这些国家革命前的社会落后性和现实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有关系的。

在这些国家，出现的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有官僚主义、家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制作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搞特权、裙带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加深曲折性），都同这些国家革命前的社会落后性即社会的封建主义性质有关系。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过这一问题，说：“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①“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③“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多。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⑤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国过去落后的封建主义传统和封建主义观念，是上述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的根源。由于这些国家发展中的曲折根源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落后性，所以在寻求克服和纠正曲折的手段时，其思路也应该紧紧地扣住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相对落后性。总结这些国家几十年以来有关的经验教训，应该提出和肯定以下几点：

其一，这些国家应该正视本国当前经济落后的事实。我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以后，终于能够正视这一事实了。邓小平 1978 年指出，现在世界上我们是贫困的国家，是在第三世界，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他 1979 年又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⑥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再次慎重地指出：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基于我国的经济相对落后性而得出的正确的结论。

其二，这些国家应该从经济相对落后的事实出发，确定其经济发展战略。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端正了思想路线，纠正了过去经济建设中“冒进”的错误，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确定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同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能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9—330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1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2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5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3 页。

力相符合的,是切实可行的。在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曾从国家经济落后的实际出发,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成需要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他说:“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更加成熟一些,也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①“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②这种战略设想也是科学的和值得肯定的。

其三,这些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政策和措施必须适合本国国情。所谓政策和措施适合国情,就是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要考虑到本国的经济相对落后性,制定出同落后的国情相适应的政策和措施。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鉴于俄国经济落后的事实,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业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④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找到了这样的特殊的办法,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看来,这些办法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是绝对不可少的,是必须较长时间地坚持下去的。在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我党终于认清了国情,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能防止发生新的曲折,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达到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目的。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三、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比较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正确地解决这些认识问题，有利于消释长期以来困扰人们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和低潮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曲折。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冒进”，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大损失，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是经济建设中的曲折。如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等。把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使许多无辜的人受到迫害，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遭到破坏，是政治生活中的曲折。如苏联 30 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中国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最严重的曲折，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由于这个曲折，这些国家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了执政的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改变了颜色，甚至连列宁缔造的党和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也瓦解了。由于这个曲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东欧地区的左翼力量面临严峻的政治考验，各国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遭受到沉重的政治和思想压力。

可是，当人们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时，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伴有无数的曲折。经济危机的发生，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出现了曲折。1825 年英国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每隔十年左右，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中的一个国家或若干个国家均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1847—1848 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最深刻、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40% 以上。1932 年的工业产值与 1929 年相比较，美国为 53%，德国为 59%，法国为 69%，意大利为 66%。危机沉重地打击了重工业部门，使它的生产倒退了 20 年以上。1932 年德国的钢产量倒退了 35 年，美国倒退了

31年，英国倒退了23年。在生产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大批企业破产和倒闭。在美国，先后有13.5万家工商企业和1万多家银行倒闭。由于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大增。各国失业总人数达到5000万人，失业率达到30%~50%。在危机期间，各国的阶级矛盾激化，工人罢工斗争风起云涌。法国1930年发生了1700次工人罢工，约有85万人参加。美国1933年有146万工人参加罢工。英国除有工人罢工外，还发生了水兵暴动^①。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产物的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活，甚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也构成了威胁，所以不可否认，它的发生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出现了曲折。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曲折。1870年的普法战争，意味着法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政治统治过程中的严重曲折。当时，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法国统治集团企图通过对普鲁士的战争来阻止德国的统一，并且占领原本属于普鲁士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发动了普法战争。战争爆发后，法军接连失利，普军很快转入进攻，并占领了法国的大片领土。普军包围巴黎，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崩溃，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政府。新政府执行民族投降政策，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资产阶级统治者血腥镇压巴黎工人的革命斗争，被枪杀、监禁、流放的革命者达10万之多。最后，法国向普鲁士支付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将自己的领土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普鲁士。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的统治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欧洲难以抬起头来。这种严重的政治后果，是法国资产阶级统治者自己的政策造成的，意味着他们政治统治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

再看德国，20世纪30年代，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把政权交给了法西斯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希特勒，造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史上的最严重的曲折。这一曲折的后果表现为：德国除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包括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改良主义的政党，统统被取缔，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疯狂地扩军备战，继而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60多个国家、20多亿人口转入战争之中；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灭亡，900多万德国士兵死于战争之中，德国无数的城市、村庄化为灰烬。这说明，德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

^① 参见《世界现代史》（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321页。

都遭到了法西斯战争的涂炭。这不能不是德国资产阶级统治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在资产阶级尚处于上升的、进步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的政治统治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使革命形势落入低潮的例子也不少。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799年11月由拿破仑建立起坚强有力的大资产阶级政权。在上述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统治者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平等、自由的政治权利以及占有财产的权利，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无条件地废除了一切封建义务，并且组成强大的革命军队，粉碎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击败了反法联军的入侵。这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处于高潮过程中。可是，1814年3月，反法联军战败法国军队，拿破仑被迫退位，已被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在法国复辟了。与此同时，欧洲几个封建国家的君主和大臣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力图重新瓜分欧洲，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正统”秩序，勾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样，1815年后，欧洲进入了封建反动统治极盛的黑暗年代。从这时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落入了低潮。

上述事实说明，出现曲折和落入低潮，并非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特有的现象。资产阶级在其政治统治过程中也有曲折，也会使革命形势落入低潮。这个事实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即一切事物包括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曲折前进的。希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绝对地一帆风顺，完全没有矛盾，没有曲折，那是不现实的。

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发展中的曲折作对比，不难发现，它们有下述几点区别：

第一，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程度比较轻，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曲折程度比较重。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曲折。在这些曲折中，一些无辜的群众受到了打击和迫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是不可否认的。可是，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曲折相比较，它的程度比较轻。如前所述，在普法战争中，法国的皇帝、几十名将军、几十万士兵当了敌国的俘虏，而且在国内造成阶级矛盾激化，统治者血腥地镇压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使10万革命者受到杀戮、监禁和流放，战后又向敌国割地赔款。由于这场战争，法国在半个多世纪里一蹶不振。再如前所述，由于法西斯希特勒的上台，世界上60多个国家卷入战争之中，德国资产阶级统治者以及全德国人民遭到灭顶之灾。

由此可看清，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已达到何等深重的程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与之相比较，程度比较轻，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容易纠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曲折纠正十分困难。1958年我党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继而“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又在国内兴起。由此，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出现曲折。但是，党中央很快认识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党中央连续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八届七中全会、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左”的错误，使曲折的趋势很快得到了遏制。从1966年开始，我国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再次出现曲折。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进而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启动改革开放，纠正了前进中的曲折。苏联30年代全盘农业集体化和肃反扩大化过程中的错误，也是联共（布）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可以由工人阶级执政党自身来纠正，所以纠正曲折的过程比较顺利，达到目的比较容易。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许多曲折，则不是造成曲折的统治当局自身可以纠正的。纠正这种曲折，需要经过一个灭顶之灾的过程，需要借助国外的力量。如上述普法战争造成的曲折和法西斯上台造成的曲折，均造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灭顶之灾；如果说这种曲折最后已得以纠正的话，那么它是外力干预的结果。所以说，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曲折纠正起来十分困难。

（二）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速度

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即标志着无产阶级民主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此后，随着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的展开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随之得到了发展。先后产生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均以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不断的扩展而不断修改宪法，巩固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攻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内一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也攻击社会主义民主，散布了种种谬论。笔者以为，这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决定的，当不屑一顾。值得重视的是，在共产党

内，一部分人也对社会主义民主不满意，认为它发展的速度不够快，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这种看法则必须认真地加以商榷。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速度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速度相比较，迅速许多倍。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人们包括工人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享受宪法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由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对资产阶级民主赞赏有加。可是认真地想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前所达到的民主水平，是300多年历史发展的结果。纵观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的速度十分缓慢。1649年3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经历了两次国内战争，前国王已经被判处死刑，国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资产阶级民主已经产生。可是此后，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过程并不顺利，速度十分缓慢。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无权的地位。180多年以后，即到1832年，英国进行了一次议会改革。这次改革的成果，是使缴纳高额所得税的大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仍然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大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政治上的权利以后，马上向无产阶级公开挑战。他们利用刚刚取得的议会权力，颁布法令，把失业者集中到“劳动院”去，让他们遭受非人的悲惨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1836年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即工人群众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12年之久，先后有数百万工人参加，形成了三次高潮。但是最终被资产阶级政府于1848年5月镇压。1867年，由于工人群众再一次掀起改革议会的运动，统治当局不得不通过新的选举法，略微降低了对选民的财产要求，把选民由100万人扩大到250万人，使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中生活有保障的一部分人得到了选举权。1884年，即又过了17年后，英国统治者迫于人民群众斗争的压力，进行第三次议会改革，规定乡村地区的工人、房客和小佃户拥有选举权。而英国妇女只有到1928年才获得选举权^①。上述事实说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下层人民群众得到选举权，经历了200多年的漫长的过程。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告成立美利坚合众国，标志着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1787年美国通过了资产阶级宪法。这部宪法只是把资产阶级和奴隶

^① 参见高放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7页。

主的利益固定下来，既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也没有禁止奴隶贸易。宪法原本没有关于保障人权的条款，经广大人民的要求，才补充了所谓“十条修正案”，使宪法蒙上了一层民主的遮羞布。但是由于各州有权规定选举条件和选举程序，结果黑人、印第安人、妇女以及不符合财产要求的广大群众统统被剥夺了民主权利。在全国 300 万人口中，只有 12 万人拥有选举权。1861 年 4 月至 1865 年 4 月，美国进行了南北战争。这是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随着战争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他们背叛了南北战争中的革命原则，继续对黑人实行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除此外，长期以来，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是一种政治欺骗。1947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反劳工法》，限制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的集体谈判，工会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禁止工会将会费用于政治目的，企业主有权对工会提出诉讼，要求工会赔偿因“非法”罢工而造成的损失，禁止工会中容纳共产党员。在这样法案下，工人还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同年美国政府还颁布了《联邦忠诚法令》，规定对所有的公务人员是否对美国政府持忠诚的态度进行调查，要求公务人员、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宣誓效忠政府。在这样法令之下，还有什么公民的民主权利可言！这些事实说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丑恶的历史。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速度则十分迅速。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18 年 1 月中旬，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即属于人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关，以切实的措施保障人民群众掌握政权和防止剥削者政权的复辟，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这个《宣言》宣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等于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宣布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等于宣布给予人民平等参加工作的权利、平等获取生活资料的权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于 1949 年 9 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国新政权的权力属于已经从政治上站起来的全体劳动人民。此后不久，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进一步规定了人民管理国家的各种民主权利。相比之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人民获得各种民主权利，来得多么迅速！与资产阶级国家下层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实现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相比，要快许多倍。尽管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

民主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才 50 年的时间。试比较，资产阶级民主在它产生后的 50 年里，是否那么如人意呢？！（对此上文已作论述）况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之一，已经载入我党的许多文件之中。我党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党内的民主制度建设。近几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成果，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过程相比较，平稳得多。资产阶级民主在它发展的几百年里，由于下层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猛烈冲击，像大海中的小船在风浪中颠簸。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爆发了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平等派”和“掘地派”的革命运动，统治当局不得不派军队残酷镇压他们的斗争。以后，英国发生了关于议会改革的三次运动，特别是爆发了工人群众要求选举权的“宪章运动”。这些运动或者以统治者的让步而结束，或者由于他们的血腥镇压而平息。但它带来社会的猛烈动荡，使统治当局的“民主政治”受到震撼。在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此类冲击频频发生。1848 年 6 月，法国工人举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武装起义。1871 年，巴黎的工人又举行震惊世界的公社革命，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统治者又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对革命进行了血腥镇压。巴黎工人的这些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动的虚伪的本质，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冲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进程仍然坎坷不平。1947 年 1 月，法国各地的工人因反对马赛当局枪杀游行群众举行大罢工，参加者达 300 多万人，造成国内政治危机，拉马迪埃政府在罢工浪潮中垮台。1953 年 8 月，法国 400 万工人和职员为反对政府颁布有损工人利益的《紧急法》而举行大罢工，造成国内铁路运输停顿，邮电通讯、煤气和电力供应中断。60 年代中后期，法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又形成高潮，1968 年出现了震动西方世界的“五月风暴”。这些斗争是对当代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严重挑战。

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进程也不平坦。1909 年 3 月 8 日，美国芝加哥的女工为争取平等自由权利，举行大规模罢工和游行示威，得到美国各地妇女的广泛响应，形成更大规模的斗争风潮。1947 年和 1948 年，美国共发生了 7100 多次工人罢工，参加者达到 423 万人。美国黑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多少年来，他们为争取平等和自由，反对种族歧视同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964年1月25日，亚特兰大市的黑人发起反对三K党暴行的示威。2月3日，纽约市800多所大中学校的黑人师生举行罢课和示威。8月，洛杉矶的黑人举行抗暴行动。反动当局派出数万兵力进行了残酷镇压。在这场斗争中，有28名黑人被打死，1032名黑人被打伤，4000多名黑人被捕。1968年4月，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当局暗杀。此后一个月内，美国172座城市爆发了202起黑人抗暴的斗争。上述这些事实，就是美国民主制度创下的业绩。它一方面说明这种民主制度是丑恶的，另一方面说明它的发展轨迹是坎坷不平的。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则前进在宽阔的道路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将新建立的政府命名为“人民委员会”，称政府各部为“人民委员部”，称各部部长为“人民委员”，以充分表明这个政府的人民性。苏维埃政权为了有利于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在工会组织中建立了工人检查院，吸收大批工人参加该机构，使其有充分的权力检查和监督人民委员会各个部门的工作。列宁逝世前夕，工人检查院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合并，组成工农检查院。列宁还提出，应该使工农检查院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借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地位和威信，提高两个监督机构的工作效率，以便于切实有效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样，苏维埃民主制度以及其他各项经济政治制度，深受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道路顺畅无阻。

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共产党就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总要先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这样，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都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和要求上达中央决策层，反映在国家的政策和方针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健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制度，使人民群众能够把自己信任的人选作人民代表，由他们代表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我国的工会组织，也参与对国家事务以及各个单位事务的监督和管理，这也是人民参与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道路也是顺畅无阻的。固然，社会主义民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过如个人迷信、个人专权、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等障碍；可是，同上述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坎

坷相比较，不仅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问题的程度轻，频率低，时间短，造成的社会震动小，易于克服。总的看来，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道路具有平稳而顺畅的特点。

第三，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速度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相适应。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建立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水平的高低，对社会主义民主水平的高低起决定性作用。当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中国只能而且必须实行当前这种形式和这种水平的民主，即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下的民主。我国的经济建设只能一步步地发展，民主的建设也只能一步步地发展。民主建设如果发展太快，则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危险。譬如：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的大多数还在农村，一部分农村地区还只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城市人口中，一部分人由于下岗或者处于待业过程中，生活也比较困难。由此，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发展生产和发展经济，尽快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以此为前提。如果离开这个前提，只顾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其结果一是脱离了人民群众的需要，不为人民所接受，二是会导致政治民主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反而会产生副作用，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三) 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当旧的社会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时，才会发生革命性变革，产生新社会制度。所以，评价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时，首先要看这种制度是否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它的优越性的首要依据。当前，有些人总觉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认为社会主义缺乏优越性。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

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作比较，不难发现，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几个历史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改变的原因。

其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长。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 300 多年。在 300 多年的时间里，它

或者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的途径，或者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改善经济环境的方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所以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确实很高。然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不足一百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只有 50 余年。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许多优越性，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不能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 50 余年的时间里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高的生产力水平。

其二，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残暴地掠夺殖民地。资本主义是靠掠夺海外财富起家的。早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以前，西方一些人就进行航海探宝，来到美洲、非洲和亚洲，掠夺那里的黄金、白银和资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后，它们通过侵略战争的手段在世界各地霸占殖民地，掠夺那里的财富。如中国就曾长期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从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掠夺来的财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掠夺别的国家和地区，只能依靠自身的条件进行经济建设。而且由于它具有国际主义义务，必须从物质财富上支援别的国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这样，人们不能够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达到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高的生产力水平。

有的人可能会说，就某一个历史阶段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未必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快。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试作以下分析：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快慢，具体地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苏美两国作比较，1955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 3990 亿美元，苏联当时只有 1530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1/3 强。到 1965 年，美国为 6880 亿美元，苏联为 3290 亿美元，已将近美国的一半，1970 年上升到美国的 52.5%，1976 年又上升到美国的 55.4%，1979 年已达到美国的 67%，相当于美国的 2/3^①。在钢铁生产方面，1960 年到 1979 年，苏联由年产 6500 万吨增加到年产 1.5 亿吨，增长 2.3 倍。美国由年产 9210 万吨增加到 1.26 亿吨，增长 1.4 倍。在石油生产方面，苏联由年产 1.479 亿吨增加到

^① 《世界经济年鉴》(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 页。

5.86亿吨，增长4倍。美国由年产3.48亿吨增加到4.5亿吨，增长1.3倍^①。这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生产发展速度比美国快。以中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1949年至198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4%。而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美国分别为3.3%、3.9%、3.1%，联邦德国分别为7.7%、4.9%、2.8%，法国分别为4.8%、5.5%、3.6%，英国分别为2.8%、2.7%、1.9%^②。这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近几年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8.0%左右。这也说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快。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说明它的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快。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快，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要看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速度。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短，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长，所以不能就当前某一时段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相比较，而只能比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速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即使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也已产生近30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遭受水深火热的煎熬，生活极为痛苦。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巴黎开办所谓“国家工场”，收容10万多名失业工人来此做工。几个月以后，临时政府宣布解散“国家工场”，规定工场里凡25岁以上者一律送往外省做苦工，18—25岁的单身工人则一律编入军队。可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150多年后的法国，广大工人群众未能分享革命胜利的成果，他们在这个制度下如同牛马一样。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200多年。根据当时的官方统计，1855年英国有贫民（快要饿死的人）851369人，而1865年则达到971433人。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日益增加，使生产中的事故越来越多。从1851年至1870年，仅仅英国煤井中就发生爆炸事件1437起，有近5000名工人罹难。农业工人特

^① 参见高放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9页。

^② 《世界经济年鉴》（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别困苦，1863年官方调查证明，他们的饭食比监狱中囚犯的饭食还差许多^①。1933年的美国，工人失业大军已经达到1700万人，100万户农民遭到破产。失业者和破产者饥寒交迫，流落街头，以破铁皮和木板搭成的“胡佛小屋”鳞次栉比。时任总统胡佛被称为“饥饿总统”，他1929年上台时所谓“让每家工人锅里有一只鸡”的诺言已经化为泡影。上述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这种制度不是美好的、优越的制度。

相比之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则得以迅速改善。1921年春列宁和俄共（布）鉴于工农群众经过7年的战争后生活十分困苦，决定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促进生产发展，迅速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当时，国家以粮食税制代替了原来的余粮收集制，使农民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纳税后的粮食），改善自己的生活。国家允许自由贸易，使农民能够通过交换的途径用粮食换取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国家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以便迅速生产出农民和城市工人生活所需的产品，满足消费的需要。国家还实行租让制，即将一部分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把资金和技术带到俄国来，迅速恢复企业生产，产出大量产品，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从这时起到1926年，大工业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个季度都有增加。1926年第四季度的实际工资同1922年第一季度的实际工资相比，增加了3倍。由于工人有社会保险，以及他们的房租比战前低许多，所以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超过了战前水平。1925年，每个成年工人每月消费小麦11.9公斤、肉6.4公斤、糖1.35公斤，而1922年相应的数字则为2.8公斤、1.3公斤、0.31公斤。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很大改善。1919年，农村每个成年人消费粮食181公斤、肉16.5公斤、糖0.5公斤。1925年，这个消费量提高到：粮食229公斤、肉38.7公斤、糖4.6公斤^②。十月革命后几年里，苏俄工农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快得以改善的事实，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条件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日益改善。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看作社会主义的根

^① 《英法德俄历史》（1830—1917），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34—135页。

^② 《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学习杂志社1955年版，第295—296页。

本任务，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为判定政策和方针是否正确标准。这充分地证明，我党理论与实践的着眼点之一，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确有很大改善。例如，1989年至1990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5%。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1989年末城乡储蓄额达到5147亿元，比1988年增长35.4%。1990年为7034亿元，比上年增长36.7%。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新的改善。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由1988年的6.3平方米增加到1989年的6.6平方米，1990年又增加到7.1平方米。而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则由1988年的16.6平方米增加到1989年的17.2平方米，1990年又增加到17.8平方米^①。现在，我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20世纪最后20年里经济发展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群众的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在城市，电脑、大彩电、大空调、移动电话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些都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全球化的性质与社会主义问题

当前，全球化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受到国内外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常常看到有关著作出版，有关论文发表。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全球化的性质，却很少引起研究工作者的重视。笔者以为，搞清楚这个问题，是研究全球化其他一些问题的前提。所以，笔者就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以下意见。

（一）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的过程

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发展过程，开始于工业革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成熟，它也日益发展，表现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明朗。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它的发展迅猛异常，全方位地向世界各个角落、各个领域里渗透。可是，发展过程中的这个事物应该同所有发展过程中的事物一样，有它的性质，或者说有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

^① 《世界经济年鉴》（19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物的本质属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年 5 月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①德国有关报刊发表文章说：“全球化的概念描述的是一种使世界经济接近于完全的市场这一理论上的理想的发展。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值得向往的结果是效率的提高、商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要。”^②美国有关报刊发表文章表示：“全球化是一场革命，它使企业家能够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在他所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③国内有的著作则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它意味着跨越民族国家政治疆界的经济活动的扩展，以及世界经济中各国的经济开放度增加，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它强调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步以至最终完全消除国家之间各种壁垒，使其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并不断加深，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而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全球化恰恰或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或是经济全球化的手段。”^④

上述这些论断，或者是对全球化的界定，或者是对全球化内容的描述，有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因为它们正确地描述了全球化的一些表面现象或许许多表面现象。可是，这些论断没有从深层次上说明什么是全球化，即没有说明全球化的性质。要正确地说明全球化的性质，必须正确地反映全球化活动中的人、阶级以及与阶级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

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人创造的。社会上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有人在其中活动并发生重要的作用。如果避开人的活动和人的作用来谈事物，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而且不符合资产阶级学者所提倡的人本主义。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是划分为阶级的，相同阶级的人以阶级的整体力量出现，创造了各个社会形态下的各种事物，创造了人类历史。所以，在讨论事物的发展过程时，在认识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时，必须运用

① 迈克尔·曼德尔：《因特网经济：世界发展的新引擎》，《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

② 刘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11—12期，第32页。

③ 郎沃斯：《经济革命的痛苦代价》，《芝加哥论坛报》1996年10月6日。

④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阶级分析的方法，发现和肯定一定的阶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活动和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的阶级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一定的阶级创造的。一定的阶级利用它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并利用这种制度使本阶级获得最大的最好的发展空间。各个社会形态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同有关的社会制度相联系，是一定的阶级利用一定的社会制度创造出来的。所以，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不能避开社会制度的问题。

用上述思想方法看问题，必然得出结论：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的过程。这个结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求证：

第一，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一直起主导性作用。所谓西方资产阶级起主导性作用，指主要的由于这个阶级的作用，全球化过程才得以展开并不断地延伸。早期资产阶级对于全球化的开端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述。他们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①他们还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肯定资产阶级使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实际上是对早期资产阶级在全球化过程中作用的充分肯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就当代全球化的状况而言，西方国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主导性作用。跨国公司对外的大规模投资，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95年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为27301亿美元，其中美国为7055亿美元，占1/4强；美、英、德、法、日等5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量的65%；如果加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比例将更高^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的直接投资，主要的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如有的著作中提出：“一批数目有限的帝国主义康采恩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地球的新形象。20家世界最大的公司企业——的总营业额超过80个最贫穷国家经济产值的总和。”^②“全世界前300家跨国公司大约控制着世界1/4的生产资金，有5万亿美元之多。”^③“跨国公司从西欧、北美、日本延伸出去，经营范围遍布全球。”^④不言而喻，这些跨国公司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财产归私人占有，即归资产者所有。这个事实说明，所谓西方发达国家在当前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或者说这些国家跨国公司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当前全球化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可是当前理论界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回避的态度，有的人在著作中涉及到这个问题时支支吾吾、闪烁其词，不愿意面对现实和承认现实。如有的著作提出，当前全球化的动力，从主观因素上看，是“经济人”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纵观全球化的各种表现，无论是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还是生产全球化，无一不是经济主体的‘人’为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而推动的。”^⑤该著作里说，“经济人”包括个人、企业、政府、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经济组织等等。既然这里提到个人，那么这种“个人”只能是资产者（且不说企业、政府、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经济组织背后都站着资产者）。由此理应得出结论，西方资产阶级推动着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可是人们偏偏不愿意或者不好意思说穿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主义，还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像《共产党宣言》里那样，直截了当地承认西方资产阶级在全球化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

① 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②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③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④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⑤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第二，迄今为止，全球化的结果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各地得到推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学艺术、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等。19世纪上叶，世界上只有英国、法国、美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欧洲的许多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俄国等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先后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也先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以后，无一例外地进行“西化”，把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搬过来。上述资本主义制度由西欧向世界各地扩展的事实，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人们无法否认，这正是全球化的结果。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化”。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在中国的人们，不是也严重地感到“西化”的压力。党和人民不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进行了几次重大的斗争吗？难道这些事实不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难道同全球化过程没有关系？

国内书刊上的某篇文章指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二战后又有60多个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苏联东欧剧变后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和其他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主张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现在世界上8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市场经济之下。该文还指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向全球强制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使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化也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其思想文化战略提供了便利条件^①。该文写道：“由于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实质和阶级实质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因而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②“经济全球化趋势，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质阶段的综合结果和外在表现。经济全球化趋势把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重现资

^① 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② 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痼疾。”^①上述观点，笔者完全赞同。

综上所述，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起主导性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各地得以推广，那么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的过程。这就是近代以来全球化的性质。

(二)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

社会主义具有世界的性质。所谓社会主义具有世界的性质，指社会主义事业要求世界各国各个地区一起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形成了东方经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个设想的真实内容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并取得胜利，它成为西方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激发西方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西方各国人民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为俄国人民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对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帮助；俄国在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由于西方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的极大吸引力，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落后国家相继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恩格斯晚年在有关文章中论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俄罗斯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只要存在着俄罗斯帝国，西方的一切革命都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更是这样，一旦俄国革命爆发，将对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增强西方无产阶级胜利的信心，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所以，“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②“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③“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

^① 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6 页。

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恩格斯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①“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②即适用于东方经济落后的其他国家。

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难以建成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从1928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37年前后他们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亚洲产生若干新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经过几年的建设，也建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较，有很大的差距。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开始消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得到改善，政治民主化的进展也不够快。这说明，无论是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相比较，还是同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相比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不够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肯定，当时苏联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二战后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也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为什么未能建成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呢？笔者认为，除了他们国内的原因即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以外，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不好。这些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仅未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有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2页。

度作样板，得到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而且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危险。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着眼点不能不放在如何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如何增强国防力量和摆脱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威胁的层面上，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等问题摆在了次要的位置。由于这样，难以建成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东方、西方的许多国家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就不会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会有来自国外的种种干扰，所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理想得多。

历史事实还证明，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十分困难。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国内外敌人都想颠覆它。在1918年夏以后的国内战争时期，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把军队开进俄国，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苏俄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极大的牺牲，才取得战争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在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都不忘记巩固政权和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重大任务，不断地为此作出努力。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改革开始时，领导改革的人的主观意图也不是毁坏国家政权和毁坏社会主义事业。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为巩固政权和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可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权最终还是丧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最终还是丧失了。苏联和东欧剧变固然有许多原因，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渗透和推动。换句话说，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好。如果东方、西方许多国家都走向了社会主义，西方国家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遭到资本主义渗透，这些国家就不会发生向资本主义的演变。

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一起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为什么没有变为现实？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笔者以为，原因就在于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来源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分析，建立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太狭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之上。而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太狭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事实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①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表现得不是那么深刻，不是那么频繁，原因就是全球化。西方国家国内的市场本来狭小，但是它们把国内的市场延伸到国外，延伸到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这样它们的市场就增大了，增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市场增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意味着它们生产关系的框框增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意味着它们的生命力增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国内有的著作反映：经济全球化首当其冲表现为贸易全球化，1950年的世界进出口贸易额仅610亿美元，1997年猛增到67000万亿美元，增长100多倍。从世界贸易的地区分布来看，发达工业国家出口额的比重连年上升，1997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72%^②。生产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全球化生产的体系中，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逐年上升，1996年增加到37%。“正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这种产业结构大调整，实现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换，从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势头。”^③也就是说，当前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与发达国家把落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密切关系。从资本全球化的情况看，1990年全球流向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只有444亿美元，1996年增加到3360亿美元，虽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1998年还是增加到3700亿美元^④。“亚洲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②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③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④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额最多，成为最大的资本流入地区。这样，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利用货币媒介和资本纽带，就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与企业、银行与银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以金融维系的命运共同体。”^①

正是上文所说的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把市场延伸到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获取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时，虽然已经看到并论述了全球化的一些现象，但是他们未预见到全球化以后时期的强劲发展和巨大规模以及延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灭亡的作用。

是不是因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可以永世长存？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正是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可以沿着两条思路来看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

第一条思路：全球化达到很高的某种程度，世界各国各个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都得到高度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得到高度的发展，这时资本主义不可能把市场延伸到别的什么星球上去，不可能从别的什么星球获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力量。这时，从全球范围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框太狭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丧钟就敲响。马克思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曾经说过：“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②这一论断，是笔者所说第一条思路的理论指南。由于全球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发展空间，甚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新的危机和新的革命不可能马上到来。可以十分符合逻辑地得出结论：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如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空间已经用尽时，新的危机和新的革命必定会到来。

第二条思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消除其弊端，使之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社会

^①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0—471 页。

的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这样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通过十月革命那样的方式实现，有可能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由量变到质变的方式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表现得不十分深刻，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改善生产关系有关。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改善生产关系，其结果是这种生产关系得到进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使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照顾。所以国外有的学者说，当今的资本主义不完全是资本主义。也许会有这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不断地改善生产关系，出现某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事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不断地改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事物越来越多。几百年以后，由量变到质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了。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 21 世纪。今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任重道远。由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正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以必须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出发确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针和政策。

第一，必须把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和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摆在重要的位置。党领导人民经过 28 年的武装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随后经过艰难而曲折的实践，把中国引向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巩固已经取得的这些成就和成果，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如前所述，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的过程。既然这样，应该看到，在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等现象的后面，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向全球扩展。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正在向全球扩展，而且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也正在向全球扩展，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样正在向全球各国和各个地区渗透。如果我们对巩固政权和巩固社会主义成果掉以轻心，则会造成发展过程中的严重曲折。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西方社会政治思潮对我国的影响，反对照搬西方制度特别是反对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

目的在于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教育好，培养好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接班人，也是为了上述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要求党的干部讲政治，认为讲政治就是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复杂的斗争中不迷失方向。要求全党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民思想的影响，正确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要求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深刻认识“三个代表”，认真坚持“三个代表”等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加强党的建设的角度出发，力求增强党的力量，从而增强我们国内抵御外来渗透的力量，巩固我国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

第二，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史上重要的经验之一。列宁晚年领导苏维埃国家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国内资本主义因素成长和发展，通过租让制的形式让外国资本家为苏俄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企业服务，为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树立了榜样。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的作用。如他领导创建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等等，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由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和正确领导，我国已经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如同江泽民所指出的：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①

同时江泽民也强调，加入世贸组织，对我们是一个严峻考验。考验来自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作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以种种方式对我国进行渗透，施加它们的影响，达到这片地域资本主义化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以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达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由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和挑战，虽然不像军事战争那样腥风血雨，但也充满了艰险与威胁，中国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需要巧妙周旋，灵活应对，保护自己，维护权益^①。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和有益的。

第三，中国要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的曲折，可是世界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在世界的东方，还有中国等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左翼力量正在认真总结经验，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途径，宣传和组织群众，力图取得斗争的胜利。西方国家的学术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前热情，近年来连续举行几次国际马克思大会，起到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作为高扬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应该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把国内的建设搞好，通过改革不断地完善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地体现出优越性，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好的社会主义样板，这就是我国对世界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候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江泽民曾经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低潮孕育着高潮，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低潮将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预示着社会主义的新胜利。”^③他还提出，社会主义低潮对我们是压力，也是动力，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振奋精神，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守住中国这块社会主义阵地，“在十一亿人口的中国，我们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①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6页。

^③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主义建设搞好了，就是我们的贡献。”^①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作出不懈的努力，作出新的贡献。为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努力和贡献，最重要的是必须建设好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用这种制度去影响世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五、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东方社会主义历史的印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社会生产的进行，生产会不断地、不可阻止地向前发展。人们只有认识到这一规律，适应和运用这一规律，才能进行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近年来，我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强调“三个代表”，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强调我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既是对我党现实情况的正确说明，也是对我党执政以来的历史以及对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的正确说明。20世纪以来，先后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力地推动了各国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

（一）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工人阶级政党上台执政，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在俄国、中国等国，在旧的社会制度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与发展着的生产力之间形成尖锐矛盾。于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正因为这样，共产党成为新国家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先后上台执政的工人阶级执政党，无一例外地立即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俄共（布）对一部分私有企业实行计算和监督，对另一部分私有企业进行国有化，意义在于变革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我党领导人民先后进行土地改革，建立互助组、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等等，意义也在于变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东欧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原工人阶级执政党，在建立新国家和新社会制度的过程中，都采取了变革生产关系的措施，力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执政党十分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克服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发展生产力。1918年夏至1920年底，苏俄因为国内战争的形势和支援战争的需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对于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同当时苏俄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1921年春，苏俄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和列宁认真的分析了这些问题及其原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于是他们举行俄共（布）十大，作出决定，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实施社会主义史上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当时，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就在于调整和改变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如他说：在国内战争时期，党和政府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采取了过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①“我们已经开始对经济政策作必要的改变。”^②国内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③现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④由于列宁和俄共（布）调整了经济关系，实行新经济政策，苏俄的生产力迅速得以提高。例如，1922年一年里，棉织品工业的产量增加了144.2%，亚麻工业的产量增加了173.1%，毛皮和制革工业的产量增加了40.2%，橡胶工业的产量增加了146.6%。重工业的发展也很迅速，1925年的产值同1921年相比，增加了283%^⑤。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实施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⑤ 参见《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学习杂志社1955年版，第160页。

了许多不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如限制农民家庭副业的生产，限制集市贸易，名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造成出工不出力、生产无效率的严重情况；所有工作无专人负责，造成对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也不追究责任等等。这样一些政策和措施，不利于搞好工作，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后，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经济生活和生产中的问题，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任务，如下放权力，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以经济管理得好坏和经济效益如何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工作成绩大小的重要依据之一；实行责任制，使各项工作有专人负责，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生活先好起来，形成示范力量，带动其他地区的人们向他们学习等等。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生产力有了大大的发展。1979—198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6%，超过1953—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大大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每年平均增长2%~4%的速度^②。“八五”期间，我国铁路新增8千公里，民航里程增长2.2倍，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达到3400公里，港口吞吐量增长1倍，长话和交换机容量分别增长21.8倍和5.8倍，原煤产量增长26%，发电量增长62.1%，钢产量增长43.7%，水泥产量增长1.27倍^③。

（二）采取有力措施发展生产力

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注重采取有力措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② 参见《国情教育教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③ 参见《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发展生产力。它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生产工具的革新。发展科学技术，可以达到革新生产工具的目的。所以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1920年1月，列宁在《真理报》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工业电气化的任务》的文章，对其内容大为赞赏，并且提出了制定全俄电气化计划的任务。同年2月，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该委员会集中了200多名科学技术专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于年底编制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电气化计划》，并由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该计划规定，除恢复和改建现有的电站以外，在10—15年以内新建30个区域电站，包括20个火电站和10个水电站。列宁在领导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提出，苏俄只有发展科学技术，实现全国电气化，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经济实力，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颠覆。如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①他在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再次提出，苏维埃俄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它能不能避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冲突呢？能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呢？在他看来，出路就在于发展俄国的科学技术，从而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建成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他说，只有这样，俄国才能“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②。显然，这里也是强调必须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列宁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发展电气化的计划较好地得到了实现。1925年苏联的发电量为29亿2500万千瓦小时，是1921年发电量的5倍，大大超过了战前1913年的发电量^③。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作用。1978年3月，邓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③ 参见《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学习杂志社1955年版，第257页。

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劳动产品，这充分证明了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88年9月，他在有关谈话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说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在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指导下，党和政府采取许多措施，发展了科学技术。一是开拓技术市场，1987年登记成交技术合同12万项，成交总金额为30.5亿元；1989年成交技术合同26.2万项，成交金额达81.5亿元。二是实施“星火计划”，截至1987年底，“星火计划”共集资53亿元，全国共有36万名科技工作者参与这一计划的实施。三是实施“火炬计划”，1988年以后的几年里，我国20多个城市建立了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实施“火炬计划”的基地。这些开发区的1500个新技术企业在1988年至1999年上半年里销售收入达41亿元。四是实行“科学基金制”，1987年批准“自由申请项目”2713项，资助总金额7980.31万元。同年还资助了39个重大项目，资助金额达5894.4万元^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倍加重视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和国家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而使经济得到了增长，综合国力得到了增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2. 对外开放，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先后产生的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执政党认识到，对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② 参见《国情教育教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254页。

^③ 《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开放，吸引国外先进技术，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领导实施了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苏维埃国家根据一定的条件，将一些自己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由他们到俄国来经营，使他们把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带来俄国，以促进俄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谈到租让制的意义时说：“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还说：“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①。列宁关于租让制的思想在若干生产领域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产生了好些效果。如当时苏联国内生产拖拉机的能力差，大量从国外输入拖拉机。1925年至1926年度国内仅仅生产732台拖拉机，而这一段时间从国外输入拖拉机12368台^②。当时，通过从国外引进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苏联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

在我国新时期，邓小平主张对外开放，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邓小平就在有关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③在1992年南方谈话过程中，他再一次提出，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就可以带动一批产业发展，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有一席之地，为此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征程中，坚持了对外开放和吸引国外先进技术的政策。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④改革开放前十年，我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② 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④ 《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国引进技术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批准的技术引进合同共 3530 项，金额为 205.5 亿美元，其中软件部分占 20%。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92 年以后，随着外商投资项目成倍增加和项目规模扩大，引进的技术设备也大大增加，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也随之大大提高。

3.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进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因此，有可能和有必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进生产，发展生产力。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努力地做到了这一点。1918 年 4 月，当苏维埃国家巩固政权的斗争告一段落而党准备把工作重心转向管理俄国和发展经济时，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组织竞赛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真正组织生产劳动竞赛开辟了途径，工人阶级执政党应该通过树立榜样的办法，并且利用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的作用，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掀起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竞赛。此后，苏联在完成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运动，特别是从 1935 年 8 月起展开了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人人以煤矿工人斯达汉诺夫为榜样，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争相创造新的生产成果记录。斯大林高度地评价了这一运动。他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典范，“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够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① 还说：“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② 这一时期，苏联由于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竞赛运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飞速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大企业 1500 多个，工业产值是 1913 年的 2.7 倍，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又有 4500 多个企业投入生产，工业产量翻了一番。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生产建设受到很大的破坏和影响，但是广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5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6 页。

大工农群众自觉的生产积极性，以及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战天斗地的英勇气概，是值得肯定的。进入新时期后，人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邓小平一再地强调，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在1989年事件结束后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①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了这一原则精神。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发出号召：“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表率，带领群众同腐败现象作斗争。”^②他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③这说明，在新时期，我党把事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全体党员干部以及全体人民献身事业的精神和积极性上。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生产力得到发展，依靠的是这种精神和积极性。今后改革开放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需要依靠这种精神和积极性，而且只有依靠这种精神和积极性。

（三）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关于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意义的认识

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领导人民开展了发展生产力的实践。在实践中，它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加深。

1918年春，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准备将工作重心转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这时，列宁从实现社会主义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的文章中，他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国家，小生产在经济上占优势，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发展生产力，即必须变小生产为大生产，变落后生产为先进生产。他说：“觉悟的工人知道：社会主义的起点是在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生产的地方”，“只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这些物质条件，即大机器工业、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①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和基础，需要向资本主义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列宁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②他提出，俄国要向德国学习，因为德国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组织。

1921年春，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以后，列宁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出发，进一步地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内容包括实行粮食税，允许自由贸易，发展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租让制、租赁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行这些政策的直接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调动和利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特别是恢复和发展大工业生产。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曾经明确地指出，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生产力。1921年5月，列宁在起草有关文件时，在论及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提出：苏维埃共和国实行这些政策，“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运输业。”^③同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国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和商业，目的就在于完成提高生产力和恢复大工业的任务，并且说：“我们既已提出提高生产力和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的任务，我们就应当努力做到正确地对待这一任务，并且务必完成这一任务。”^④列宁面向实践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任务，意味着作为党的领袖的他以及俄国的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深化了上述列宁的认识。1984年6月，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最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①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此后，他在实践中反复强调并不断丰富了这一理论观点的内容。在1992年南方谈话过程中，他一是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强调判断政策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认为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理论观点，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认为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消灭贫穷，认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发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2000年以来，江泽民不断强调坚持“三个代表”，其中首要的一条是我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一是指我党如同先进的生产力一样，是一种永远趋向前方的进步力量；二是指我党主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有决心和信心不断地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三是指我党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和问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对此充满信心。当前，学习和坚持“三个代表”的活动正在全国广泛开展，全体党员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日渐深入，我党将更有力、更切实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有效措施，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六、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东方社会主义历史的印证

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先后产生了俄国、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十分重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留下了可供总结的宝贵经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验。2000年春江泽民说我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是对我党执政以来加强文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何谓“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的含义有几种，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包括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宗教哲学等等；三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等等。本文所论及的“文化”，显然是作为第二种含义的文化。这种“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如当代中国，文化体系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上，而且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或者说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社会主义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可以作以下几种理解：

第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规定和引导的方向。一定的文化体系的各个方面，如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等，都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规定其前进方向和引导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文化，规定其方向和引导其前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是不断前进的。可是它的前进有一个方向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说明思想理论的前进坚持了正确的方向。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由于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思想理论的发展走向了邪路，出现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错误的思潮。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的前进，也有一个方向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错误地估计了事业发展的形势，错误地规划了事业发展的途径和方向，使文学艺术和科学教育遭到了毁灭性损失。改革开放以来，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文学艺术和科学教育事业，这些事业摆正了前进方向，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今后，先进文化的前进，仍有一个方

向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为了保证前进方向的正确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简单地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坚持向前看的方法等等。

第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指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为出发点的方向。先进的文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文化的立足点，或者说是它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落后的文化。文化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等，都是为沙皇专制制度服务的，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维埃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日益先进的文化。在旧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落后文化。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先进文化，即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文化。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先进文化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上，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为其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离开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就没有先进文化。今后文化的前进，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为出发点，或者说，它应该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应该保持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相同的前进方向。

第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指广大人民群众所肯定、所欢迎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文化，根本任务之一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所以，它的前进和发展，必须为人民群众所肯定和欢迎。如在苏维埃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理论，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深受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欢迎。在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并有力指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戏剧、著作和文章，均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欢迎。今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把是否受到人民群众肯定和欢迎作为评判它的方向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采取正确的措施和途径推进先进文化

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基本的要求之一是党采取正确的措施和途径推进先进文化。纵观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为推进先进文化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下述几种：

第一，坚持对文化工作进行政治指导的原则。十月革命后，针对俄国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列宁于1918年底代表俄共（布）中央作出指示，迅速编写一套工农通俗读物。对于这套读物的内容，他提出了专门的要求。如要求讲清楚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国家、工厂国有化、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政教分离等等^①。由此看来，这一套读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列宁和俄共（布）的这一实践说明，他们坚持了对文化工作进行政治指导的原则。

1919年2月，俄共（布）发布了由列宁起草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党的八大上对原有的党纲进行修改。列宁在此党纲草案中提出：“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②。这一条文反映在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纲中，成为苏维埃国家改造和创办学校的指导性意见。在此时期，列宁还强调了学校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的观点。1920年11月，他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有一种伪善的说法占统治地位，即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应该公开地声明，搞好教育工作“关键在于教育同我们的政治的联系问题。……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③这一观点也成为当时党和国家政权办好学校教育的重要的指导意见。显然，列宁和俄共（布）关于把学校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观点，关于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的观点，体现了以政治指导文化教育工作的原则。1922年3月，列宁发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就党怎样对待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阐述了正确的观点。他提出，党除了要同所有没有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因为这些人倾向于唯物主义。他认为，自然科学面临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侵袭和挑战，所以自然科学家必须以唯物主义者的身份去同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这就是他所说的：“为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9—400页。

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当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①这一论断说明，列宁和俄共（布）主张在科学工作中坚持政治指导的原则。

在中国，早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即已提出，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党员文艺工作者要站在党性的立场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进行文艺创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他还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其中之一是“政治标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一直按照上述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个思想深刻体现了对文化工作进行政治指导的原则。在 1957 年以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我国的文化工作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原则，成果辉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工作中继续坚持了政治指导的原则。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②他还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③这些论断，是当时党中央和邓小平对全体文化工作者的政治要求。20 世纪 80 年代初，理论界有些同志对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缺乏兴趣，表示要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免得犯错误。有的人热衷于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谈论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于批评资本主义而在于批评社会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一些演员到处“走穴”，用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上述现象，并且提出：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3 页。

“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在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①这些论断，体现了他关于文化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思想，或者说坚持政治指导的思想。

我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扬了文化工作坚持政治指导的传统。1996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出发，向文化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政治要求。此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政策。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②这一论断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而强调和坚持了文化工作中的政治方向，或者说强调和坚持了文化工作中的政治指导原则。

第二，将文化建设中的科学和教育置于各项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1918年1月，列宁和俄共（布）即委派代表同原科学院谈判，力图发挥其作用，促进俄国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年4月，列宁起草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就科学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提出，苏维埃国家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全力支持科学院的工作，以便建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尽快制定俄国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包括使俄国的工业布局合理，使企业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对原料加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② 《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页。

过程中的劳动消耗；按照大工业生产的要求，把生产合理地合并和集中于少数最大的企业；特别注意发展工业和运输业中的电气化，以及电力在农村的运用等等^①。此后，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和俄共（布）仍十分关注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实现电气化的问题。1920年2月成立了苏维埃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吸收200多名科学家到该委员会工作，并于同年底制定出全俄电气化计划。按照这个计划，10—15年内全国建成30个区域电站，年发电量达到88亿度。列宁要求大力宣传和努力工作，尽快实现全俄电气化计划。同一时期，他在《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中，对广大青年团员说：“你们面临的任务是振兴全国的经济，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②上述事实说明，列宁和俄共（布）何等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他们对于教育的发展也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和重视。列宁在1919年2月公布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在1920年底起草的《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意见中，均论及了各个层次的学校教育以及发展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发展教育，需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资。1922年政府有关部门讨论预算时，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指导思想有偏差，主张缩减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对此，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鲁普斯卡娅表示反对，并写出了书面反对意见。列宁非常重视这件事，把克鲁普斯卡娅的书面意见批转给人民委员会两位副主席，让他们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支持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不得缩减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由于列宁的支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批准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预算。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里，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奋斗，忠心报国，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取得了“两弹一星”试制成功的伟大胜利。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和党中央把教育和科学置于我国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重点地位。1978年3月，我国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同年4月又举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关于教育和科学的各种错误观点，在发展教育和科学的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为新时期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1982年9月，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有三个，教育和科学是其中之一。他说：“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①此后，邓小平在实践中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指示，国家进行了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经费投入，使教育和科学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关注 and 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才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②报告还提出，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

第三，大胆吸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优秀文化成果。列宁在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成果。1918年春，他主张利用旧社会过来的经济技术专家，发展生产，促进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他说：“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③这一时期，他还主张苏俄向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学习，主张借鉴美国的“泰罗制”等等。以后，在《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中，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同其他社会制度下文化的关系。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④他要求青年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了解 and 掌握以前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② 《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④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共产主义者。”^①当时列宁和俄共（布）正是以这种精神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

中国共产党也主张吸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就此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正是在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教育、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和交流，引进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还选派大批学生出国留学，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③近几年来，在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指引下，我国这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三）抵制和批评错误的文化倾向

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进先进文化，必须抵制和批评错误的文化倾向。列宁和俄共（布）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1918年，莫斯科出版了某教授的一本论述宗教问题的小册子。其作者虽然叙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但是回避了宗教神学的偏见和骗局，而且表示了一种可笑而反动的奢望，即企图使自己的观点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对立的哲学理论之上。列宁批评指出，该书的作者“暴露出他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奴隶”，是宗教神学的思想奴隶，他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苏俄的《经济学家》杂志1922年第1期，刊登了某学者题为《论战争的影响》的论文。该文以科学研究的姿态出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丑化苏俄的婚姻状况，攻击苏俄的社会制度。列宁批评指出，这篇以科学姿态出现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 《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的论文，是一个典型的伪科学，“当今的伪科学实际上是最鄙陋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①他认为，刊登这篇论文的杂志是披着科学、民主的外衣的“当代奴隶主的刊物”，这篇论文的作者是有“教养的农奴主”，即有文化知识但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列宁认识到，这样的人可能不止一个，他们有的可能在苏维埃国家机关里工作，有的甚至担任教育青少年的职务，事实说明，他们不配担任这样的职务，必须把他们从苏维埃机关中清除出去。列宁逝世前夕，看到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刚刚出版的著作《革命札记》。该著作提出，俄国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不应该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识到，这种论调对于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大。他批评尼·苏汉诺夫之流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②在列宁看来，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虽然不高，但是特殊的环境激化了俄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增强了工农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趁势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代表和推进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也抵制和批评错误的文化倾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有个作家写成名为《苦恋》的小说，有人将此小说拍成电影《太阳和人》。这部小说和电影，给读者和观众的印象是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针对此，邓小平批评指出：“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③当时，《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批评。邓小平肯定地说，批评是应该的，《文艺报》也要组织高质量的文章进行批评，《人民日报》可以对有关文章进行转载。这一时期，有个青年诗人到北京师范大学作演讲，在演讲中散布了否定社会主义的观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联筹备组一个负责人，也在有关场合发表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邓小平主张对其进行批评。他说：“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①如前所述，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对于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个别同志对于西方的某些不健康的哲学观点、经济学观点、社会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不分析、不鉴别、不批评，盲目推崇，一窝蜂地引进，以至连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也输入不少。对此，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②近年来，邪教组织“法轮功”活动猖狂，这是一种腐朽反动的文化现象。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量事实证明，工人阶级执政党对错误文化倾向的抵制和批评，净化了文化环境，培育和发展的本国先进文化。

七、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东方社会主义历史的印证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即工人阶级执政党。从此工人阶级执政党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领导者，担负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先后掌握政权的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创造了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历史也证明，在社会主义进程中，工人阶级执政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一）采取有力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具体的、首要的表现是关心人民的生活，采取有力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由于经历了7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年战争的严重灾祸，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城乡居民普遍得不到面包、牛奶，得不到生活必需的工业品。由此，国内出现了社会不稳定的严重情况。特别是由于敌对势力的煽动，在喀琅施塔得发生了水兵叛乱事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认真分析了人民生活困难的原因，在党的十大上作出决定，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迅速改善人民的生活。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由于七年战争和经济破坏，国家已处于贫困不堪的境地，最近三年半的极度紧张的生活更使俄国工人阶级精疲力竭，对于这种情况，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紧急的措施。”“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要求全党，要求所有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并且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竭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减轻他们的困苦。”^①

根据列宁的指示和党的决定，国家改变了征收粮食的政策，由过去的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使个体农民能够支配纳税之后剩下的粮食，以利于他们改善生活。国家改变了战争时期封闭市场的做法，允许自由贸易，以积极的态度发展商业，促进城乡之间的商业交换和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使农民能够用粮食和其他产品去换取自己消费必需的工业品，使城市居民能够获取粮食。国家允许私人经营小型工业企业，支持私人企业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以便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国家实行租让制，即根据一定条件把一部分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把资金和技术带到俄国，帮助这些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生产出人民生活所需的产品。可以看出，当时党和国家政权各项政策的着眼点，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通过采取上述政策，人民的生活状况很快得以改善。到1926年，大工业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个季度都有增加。1926年第四季度的实际工资同1922年第一季度的实际工资相比，增加了3倍。由于工人有社会保险，以及他们的房租比战前低许多，所以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超过了战前水平。1925年，每个成年工人每月消费小麦11.9公斤、肉6.4公斤、糖1.35公斤，而1922年相应的数字则为2.8公斤、1.3公斤、0.31公斤。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很大改善。1919年，农村每个成年人消费粮食181公斤、肉16.5公斤、糖0.5公斤。1925年，这类物品的消费量提高到：粮食229公斤、肉38.7公斤、糖4.6公斤。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也有提高。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1925年，初级和中级学校的学生为1020万人，高等学校的学生为16.2万人，而1914年初级和中级学校的学生只有790万人，高等学校的学生只有11.2万人^①。

苏俄人民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生活条件很快得以改善，根本的原因在于列宁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人民的利益，把改善人民生活置于重要的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达到了既定目标。

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国民经济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城市工人的工资长期未有增加，许许多多的工人无住房或少住房，三代人同住一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情况数不胜数。消费资料极为匮乏，人们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布匹、肉类、水产品、鸡蛋，甚至连火柴，也要凭证供应，而且供应量极少。农民的生活更为困苦。山区和“老、少、边”区的农民远远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人民生活的困难，决定实施改革开放，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迅速改善人民的生活。

邓小平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同时他指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个方面给以帮助，特别是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②这一论断，一是充满了改革的精神，二是体现了工人阶级执政党重视人民利益和关心群众生活的精神。根据这种精神，党和政府高度肯定农民群众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大力推广。这项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中形成的“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生产无效益的状况，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

^① 参见《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学习出版社1955年版，第294—29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在 1984 年把改革由农村引向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在工业生产领域进行了加强责任制和实行承包制的改革，在流通领域进行了价格体制改革，并且改革逐渐深入到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上述改革，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据有关资料反映，1952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 76 元，其中农民为 62 元，非农居民为 148 元；1988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至 639 元，其中农民为 479 元，非农居民为 1281 元。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计算，从 1952 年到 1988 年，用于吃的消费比重由 56.5% 降为 54.2%，用于穿的比重由 19.3% 降为 17%，日用品消费的比重则由 20.9% 上升为 26.2%。主要耐用消费品从无到有，开始在城乡普及。1988 年每百人拥有手表 47 只，自行车 30.4 辆，电风扇 13.4 台，电视机 13.2 台，录音机 8.3 台，照相机 1.7 架。城乡储蓄存款明显增加，1952 年全国储蓄存款额为 8.6 亿元人民币，1989 年则增至 5135 亿元人民币。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医疗服务设施也日益改善。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由 1957 年的 4.6 张增加到 1988 年的 23 张，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同期内由 8.4 人增至 14.9 人^①。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的生活能够很快得以改善，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工人阶级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关心人民的利益，高度重视改善人民的生活，通过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从而达到了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二）兴办社会保险和福利事业以增进人民的利益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共（布）即本着增进人民利益的目的，开始建立和健全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1917 年 11 月，俄共（布）领导苏维埃政府对旧的保险制度作了重大改造。如把生产中不幸事故的抚恤金额增加了 1 倍，将社会保险的对象扩大到派往企业工作的士兵，并责成有关企业主免费将医疗机构转交给疾病保险社，或者拨给疾病保险社必要的资金来充实医疗机构的设备。为了监督工人享用抚恤金与津贴的情况，任命一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到保险社工作，克服保险社一些管理者怠工的现象，逐步把管理

^① 《国情教育材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0—131 页。

工作掌握到苏维埃手中。1918年10月3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劳动人民社会保障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包括：1. 对贫困人员提供各种医疗、药品等帮助；2. 对那些由于丧失劳动能力而无法生活者提供生活保障；3. 对不是由于劳动者本身的过错而遭到失业的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这项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意味着对旧的保险制度的根本性的改造^①。

1922年11月29日，苏维埃政权通过了保障劳动人民权利和利益的《劳动法典》。该法典宣布：生产中 and 辅助工作中标准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16岁至18岁的少年，从事脑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者，从事繁重工作的地底下工作者，其工作日不得超过6小时；对于一切劳动者，每周均给予一次不少于42小时之连续休息时间（约等于连续休息2天）；对一切职工，一年均给予一次不少于两周之例假；对于年未滿18岁者和从事繁重工作者，一年给予1个月的休假，禁止使用16岁以下的童工劳动，女工和未滿18周岁的劳动者受到特殊保护。该法典规定，由劳动检查机关负责监察该法典执行的一切情况^②。上述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条例和法典，增强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强度，扩大了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对象，增进了人民的利益，深刻地说明苏俄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和人民政府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在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颁布的第一个社会保障法诞生于1948年12月27日。这一天，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时劳动保险条例》。次年4月此条例在东北地区的铁路、矿山、军工、军需、电气、纺织等7个行业中试行，同年7月扩大到东北的所有公营企业。1950年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同年10月予以公布，组织全体职工讨论，1951年2月26日正式颁布实施。开始，这一条例在百人以上的企业，包括国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企业实施，但参与实施的企业限于在工厂、矿场、铁路、航运、邮电等部门。1956年，继而扩大到商业、外贸、粮食、供销合作、金融、民航、石油、地质、水产、国营农场、造林等产业和部门。上述这些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工人阶级执政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增进人民利益的最初尝试。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中国历史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122页。

^② 《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学习出版社1955年版，第295页。

时期，尽管中国的物质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好，但是中国共产党仍十分关注保障人民的利益，推进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从1978—1985年，中国城市社会福利院由577所增加到952所，农村敬老院由7175所增加到23622所，许多伤残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在社会福利院或敬老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于劳动保险和社会福利的费用不断增多。1979年用于劳动保险的费用为72.7亿元，1983年则为150亿元，增长106.3%；1979年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为65.5亿元，1983年则为8751亿元，增长33.0%；1979年我国用于优抚的费用为3.5亿元，1983年则为53亿元，增长51.4%^①。上述事业的发展，速度虽不算快，但同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体现了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对人民的利益的重视和关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制度。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把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制度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努力推进这项工作。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要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城镇国有、集体、外商投资、私营等各类企业及其职工都要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决定》还提出，要确保养老金的按时足额支付，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增强基金调剂能力。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社会保险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险资金。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一部分下岗职工的生活比较困难。对此，党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搞好这三条保障线的相互衔接，把保障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心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每年都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举行党的工作会议，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明确的要求，强调党的纪律，要求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密切关注农村一部分人脱贫和解决温饱的问

^① 《中国老百姓的前途》，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题。1996年10月，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要求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的问题。《决定》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措施，如增加投入，在集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安排大型开发项目，严格管理各项扶贫资金，对贫困地区实行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组织沿海发达省、直辖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自治区等等。上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各项《决定》正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的已初见成效。它深刻地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利益的高度关心、关怀和重视。

（三）同损害人民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和俄共（布）同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以及贪污受贿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本来，十月革命胜利时，列宁和俄共（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遣散了旧机关人员，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国家机关。可是在随后不久的国内战争期间，由于进行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府又将旧机关人员接纳入国家机关，使其帮助工作。这样国内战争结束时，国家机关庞大，而且官僚主义现象和贪污受贿行为滋生并严重起来，这些现象和行为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把贪污受贿行为视为当时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面前的三个敌人之一，认为有这种行为就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他要求坚决消灭这个敌人。1922年3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了党和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现象，认为它表现为一些机关工作者找借口开会，并且没完没了地开会，不关心节省每一个戈比，而毫无理由地制定开支数十亿卢布的计划。他提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必须清除这种敌人。

列宁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了工作实践中。1921年11月，莫斯科自来水管厂的工程师奥登博格自杀。调查的结果表明，他是一名精通业务并且高度忠于职守的科技工作者，其死因是有关党员干部对他采取了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不断迫害的行为。列宁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起草了关于这一案件的决定草案。他提出：“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特别用心、妥善和声势浩大地审理这个案件”，“把自来水管厂整个党支部交付法庭审判”，“指示《消息报》和

《真理报》：发表一批有分量的文章，评论这个令人气愤的案件”^①。列宁起草的决议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22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进行了很大声势的审判，判处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党员干部谢杰尔尼科夫监禁1年，对其他4名有责任的、有悔改表现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并剥夺了他们3年的担任苏维埃负责干部的权利。在同一时期，苏维埃国家中央房产局负责人伙同莫斯科公用事业局党员局长索韦特尼科夫，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列宁得到这一情况后，亲自布置了对这一案件的调查，掌握了真实的情况。他认为，这一案件实质上是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犯罪，必须本着严格治党的精神，对犯罪者严厉惩处。他指示：“通告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消职务”^②。根据他的指示，苏维埃法庭认真而严肃地审理和判处了当事人。

执政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也坚决地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建国初期，由于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采取正确的方针，国内市场一片繁荣。可是这时，一部分资本家利欲熏心，贪得无厌，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抗拒国有经济的领导，并通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不法资本家还以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糜烂生活方式，腐蚀公方代表和国家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党和国家干部中的一部分人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有的甚至被糖衣炮弹所打中。显然，这时资本家的“五毒”活动以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党中央洞察一切，立即在全国上下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发出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③“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并取得胜利，深刻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非常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败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列举了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③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页。

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如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从而造成工作中的失误，危害人民的利益。他分析了产生官僚主义的历史原因和制度上的原因，要求进行领导制度的改革，彻底消除官僚主义现象。邓小平主张进行反腐败的斗争。他不断地提出，要抓大案要案，办案时透明度要高，处理要快，以便造成声势，产生威慑力，形成影响力，使人民相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这就说明，邓小平是着眼于维护人民利益进行反官僚主义和反腐败斗争的。

在跨世纪的过程中，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把反对腐败和反对其他一切丑恶现象摆在重要的日程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①他还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应体现于勇于开拓，积极进取，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根据这种精神，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挖出了一个大大案要案，如胡长清贪污案，成克杰受贿贪污案等等。在改革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如持枪抢劫、坑蒙拐骗、卖淫嫖娼等屡禁不绝，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针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每年都要展开若干次严打斗争，把那些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些事实，也体现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

（四）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关于代表人民利益重要性的认识

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关于代表人民利益重要性的认识，得到了不断提高。列宁和俄共（布）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这个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将拥有一个苏维埃政府，一个绝无资产阶级

^① 《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参加的我们自己的政府机关。被压迫的群众将亲自建立政权。”^①这说明，列宁看来，十月革命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苏维埃政权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持了修改党纲的工作。他在新党纲草案中提出，苏维埃国家要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管理；在经济上要逐步地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消灭剥削，使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接近城市无产阶级；在教育工作中应该把学校办成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原则的工具，应该对未满 16 周岁的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民族工作中应该使各民族在发展中相互接近并打成一片，认真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自由，使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各民族自愿结成的最紧密的联盟。列宁的这些主张，体现了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思想。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认识到，新经济政府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是满足人民利益的政策，党只有实行这个政策，才能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推进国家各个方面事业的发展。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列宁指出：“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②意思是说，执政党和它的党员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团结起千百万人民群众，共同贯彻和执行新经济政策。

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革命胜利以前，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即已提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既是对人民军队性质的说明，也是对党的性质的说明。党在执政以后，明确地要求党的组织和党员为人民服务，并且将此作为党的宗旨，作为做党员的基本条件之一，载入了党纲和党章。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许多党员根据党纲和党章的规定要求自己，自觉地为为人民服务，成为人人称颂的英雄模范，如雷锋、王杰、焦裕禄等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在改革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党代表人民的利益。改革刚刚起步时，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前进中可能遇到困难时说：“只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6 页。

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①“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②他的思想是，作为代表群众利益的党，既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又要依靠群众去克服困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判断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标准中的一个，就是看方针政策“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邓小平把党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当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2000年春天，江泽民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三个代表”。“三个代表”的内容之一，就是共产党始终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此后，一个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的活动，在全党上下展开。它同“三讲”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面地促进了党的建设。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后 记

这部《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是我参与主持的 200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研究（04MZD024）的成果之一（此项目的首席专家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学东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学校社科处的领导和同志们帮助和支持了此项研究工作。南京师范大学学科建设与“211 工程”办公室将此课题列为学校重点研究课题，资助了此著作的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重视此项研究成果，将其列入出版计划，认真地做了编辑出版工作。该社的龙润霞编审，为此著作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著作出版之际，谨向上述各个方面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限于我的水平和能力，著作中难免谬误之处，请理论界朋友批评指正。

作 者

2006 年 6 月